安悱 ⊙ 编

阅读的危险

大师的读书经验



江西教育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阅读的危险：大师的读书经验

安悱 / 编

安徽大学图书馆
* 藏 书 *
www.lib.ahu.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的危险：大师的读书经验 / 安悱编.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92-6463-9

Ⅰ. ①阅… Ⅱ. ①安… Ⅲ. ①读书方法 Ⅳ.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8488号

众流汇海

阅读的危险：大师的读书经验

YUEDU DE WEIXIAN: DASHI DE DUSHU JINGYAN

安悱 / 编

出品人：傅伟中
策　划：涂　华
组稿编辑：万　哲
责任编辑：万　哲
特约编辑：黍　离
装帧设计：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1
字数：363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ISBN 978-7-5392-6463-9
定价：39.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2－3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

冯友兰曾说："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本书精选现当代人文领域的35位大师——会读书的人——谈读书经验的文章。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有时甚至针锋相对，也就是说把书读活的方法不止一种。也许读书与读书人的关系就像食材与病人的关系，某书在某时对某人大有裨益，但换个时间和人却是一味毒药。这是本书书名"阅读的危险"的来由。

本书除了可以就读书的问题得到大师的指点外，更有意思的是可以在篇幅与篇幅之间品味大师们的众生相。一个好题目，由经历过人生的人来回答，所包含的内容就不仅是这个题目所涵盖的范围了。

本书以每位大师为独立单元（篇幅），共计35篇（以姓氏拼音为序）。每个单元含有以下四个内容：一、大师所写谈读书经验的文章；二、大师生平简介；三、有关大师的往事与追忆（由大师的同辈或后辈所写的回忆文章组成，有若干篇幅选用大师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四、有关大师的深度阅读书目。编者在每个单元之间插入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的作品《没有字的故事》一至两幅，共计60幅，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曲折的爱情故事。

读书人与书的故事就像爱情故事一样，没有完全相同的，但又大同小异，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得。明代魏学伊在一封信（《答康宜之》）中说"弟子好书，如世人好色，暂时割绝，到时又被缠绵，今古文字，无一不足以贪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本书讨论的虽然是读书的方法，讲述的却是大师们的苦乐哀愁，表达的是编者对他们的敬意。

——编者





目录

蔡元培篇 I 3

3 | 蔡元培谈读书：我的读书经验
4 | 大师简介
5 | 往事与追忆：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8 | 深度阅读

曹聚仁篇 I 11

11 | 曹聚仁谈读书：我的读书经验
14 | 大师简介
14 | 往事与追忆：书生报国——湮没于历史中的历史见证人
16 | 深度阅读

陈从周篇 I 19

19 | 陈从周谈读书：读书的回忆
23 | 大师简介
23 | 往事与追忆：学问如家常
24 | 深度阅读

丰子恺篇 I 27

27 | 丰子恺谈读书：读书
29 | 大师简介
29 | 往事与追忆：怀念丰先生
33 | 深度阅读

冯亦代篇 I 35

35 | 冯亦代谈读书：漫话读书
36 | 大师简介
37 | 往事与追忆：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
40 | 深度阅读

冯友兰篇 I 43

43 | 冯友兰谈读书：我的读书经验
46 | 大师简介
47 | 往事与追忆：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48 | 深度阅读

冯至篇 I 51

51 | 冯至谈读书：书和读书
55 | 大师简介
56 | 往事与追忆：“我不懂里尔克”
57 | 深度阅读

顾颉刚篇 I 59

59 | 顾颉刚谈读书：怎样读书 \ 初进学问界
63 | 大师简介
64 | 往事与追忆：顾颉刚二三事
66 | 深度阅读

何其芳篇 I 69

69 | 何其芳谈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
70 | 大师简介
70 | 往事与追忆：诗人的另一面
71 | 深度阅读

胡适篇 I 73

73 | 胡适谈读书：读书 \ 为什么要读书
85 | 大师简介
86 | 往事与追忆：回忆胡适之先生 \ 忆胡适之
89 | 深度阅读

黄永玉篇 | 91

91 | 黄永玉谈读书：书和回忆
94 | 大师简介
95 | 往事与追忆：趣记黄永玉
97 | 深度阅读

蒋孔阳篇 | 99

99 | 蒋孔阳谈读书：读书人的追求是觉醒
105 | 大师简介
105 | 往事与追忆：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107 | 深度阅读

金克木篇 | 109

109 | 金克木谈读书：读书 \ 九方皋读书 \ 书读完了 \ 谈读书和“格式塔”
122 | 大师简介
123 | 往事与追忆：自学成才的金克木
125 | 深度阅读

老舍篇 | 127

127 | 老舍谈读书：读书
129 | 大师简介
130 | 往事与追忆：怀念老舍先生
131 | 深度阅读

李霁野篇 | 133

133 | 李霁野谈读书：读书与生活
138 | 大师简介
138 | 往事与追忆：对于李霁野先生的点滴回忆
139 | 深度阅读

梁启超篇 | 141

141 | 梁启超谈读书：学问之趣味
144 | 大师简介
144 | 往事与追忆：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145 | 深度阅读

梁实秋篇 | 147

147 | 梁实秋谈读书：读书苦？读书乐？ \ 漫谈读书 \ 书
158 | 大师简介
159 | 往事与追忆：“滑竿教授”
160 | 深度阅读

林语堂篇 | 163

163 | 林语堂谈读书：读书的艺术 \ 读书与风趣 \ 论读书
177 | 大师简介
177 | 往事与追忆：林语堂的梦想
179 | 深度阅读

钱歌川篇 | 181

181 | 钱歌川谈读书：读书的习惯
183 | 大师简介
184 | 往事与追忆：请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太太
185 | 深度阅读

钱穆篇 | 187

187 | 钱穆谈读书：读书漫谈
190 | 大师简介
191 | 往事与追忆：国民必知
191 | 深度阅读

施蛰存篇 | 195

195 | 施蛰存谈读书：我的爱读书
197 | 大师简介
197 | 往事与追忆：回忆施先生
199 | 深度阅读

唐君毅篇 | 201

201 | 唐君毅谈读书：说读书之重要
204 | 大师简介
204 | 往事与追忆：新亚书院
207 | 深度阅读

王力篇 | 209

209 | 王力谈读书：谈谈怎样读书
213 | 大师简介
213 | 往事与追忆：忆王力教授二三事
215 | 深度阅读

萧乾篇 | 219

219 | 萧乾谈读书：关于书
224 | 大师简介
225 | 往事与追忆：浪迹天涯
226 | 深度阅读

许地山篇 | 229

229 | 许地山谈读书：牛津的书虫
231 | 大师简介
232 | 往事与追忆：落花生
233 | 深度阅读

杨绛篇 | 235

235 | 杨绛谈读书：读书苦乐
237 | 大师简介
237 | 往事与追忆：斯是陋室
239 | 深度阅读

叶灵凤篇 | 241

241 | 叶灵凤谈读书：我的读书
242 | 大师简介
243 | 往事与追忆：记叶灵凤
244 | 深度阅读

俞平伯篇 | 247

247 | 俞平伯谈读书：读书的意义
249 | 大师简介
250 | 往事与追忆：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251 | 深度阅读

郁达夫篇 | 253

253 | 郁达夫谈读书：人与书 \ 说开卷有益
254 | 大师简介
254 | 往事与追忆：不成文天祥，也要做伯夷
255 | 深度阅读

臧克家篇 | 257

257 | 臧克家谈读书：读书学习的零星感想
259 | 大师简介
260 | 往事与追忆：请主席打个电话
261 | 深度阅读

张岱年篇 | 263

263 | 张岱年谈读书：漫谈读书
266 | 大师简介
267 | 往事与追忆：几句真话
269 | 深度阅读

钟敬文篇 | 271

271 | 钟敬文谈读书：谈读书
275 | 大师简介
276 | 往事与追忆：钟敬文为什么放弃文学
277 | 深度阅读

周作人篇 | 279

279 | 周作人谈读书：读书的经验
281 | 大师简介
282 | 往事与追忆：再谈周作人的几件史实
284 | 深度阅读

朱光潜篇 | 287

287 | 朱光潜谈读书：谈读书
291 | 大师简介
292 | 往事与追忆：偶遇
293 | 深度阅读

宗白华篇 | 295

295 | 宗白华谈读书：读书与自动地研究
297 | 大师简介
298 | 往事与追忆：时髦的创作与古董的做派
299 | 深度阅读

附录 | 301

303 | 胡适：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305 | 梁启超：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307 | 顾颉刚：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
309 | 朱自清：经典常谈（书目）
311 | 汪辟疆：十部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
313 | 鲁迅：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
315 | 钱穆：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317 | 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
321 | 北京大学学生应读\选读书目





我的读书经验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也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为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辞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训诂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辞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地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动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

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它，我正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作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虽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自然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曾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动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大师简介】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孑农，浙江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

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

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荣誉学位。在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往事与追忆】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傅斯年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

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一）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1]，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二）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

[1] 出自《大学》。“正心”，指端正心思；“诚意”，指意念真诚。

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已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1]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三）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2]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责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3]"了。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有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只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

---

[1] 语出《论语·述而第七》。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
[2] 现译作苏伊士运河。
[3] 出自《孟子·万章上》。意思是对于君子，可以想方设法以常情捉弄他，却不能用违背道理的手腕蒙骗他。

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路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制约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1]、袁氏遗孽[2]。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1929年

深度阅读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商务印书馆，1926年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商务印书馆，1998年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孑民自述》，蔡元培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蔡元培年谱长编》（共四卷），高平叔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蔡元培书信集》，蔡元培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蔡元培讲演集》，蔡元培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 安福贼徒：指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官僚政客。
[2] 袁氏遗孽：指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余党。





我的读书经验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

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大不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大不同，不知偏向哪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分歧百出，汉、魏、晋、唐各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有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

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1]信古总要上当的。单不庵师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使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的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佑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地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

[1] 戴东原语。

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大师简介】

曹聚仁（1900—1972），浙江兰溪墩头镇蒋畈村（原属浦江）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二十多岁便登上了暨南、复旦等大学的讲坛；30年代初，在上海创办了《涛声》、《芒种》等，鲁迅经常为之投稿；抗战时持笔从戎，成为战地名记者；蒋经国在江西赣南主政时，曾邀其创办《正气日报》；1950年只身赴港从事自由写作。1956年起，开始为两岸和平统一而奔波，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以及蒋介石、蒋经国等国共要人的重视。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时，周恩来总理称他为"爱国人士"，并为其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往事与追忆】

书生报国——湮没于历史中的历史见证人

◎徐淡庐

作者原为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现为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摘自柳哲著《曹聚仁的"三不朽"》，标题为编者所加。

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严守秘密，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一事，我一个字也不敢向外界透漏。现在的形势很好，各界对曹聚仁曾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都很关心。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曹聚仁有着一段特殊的交往。现在我的身体又如此不好，如果不将这段历史向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后人说清楚，我对不住曹聚仁先生，也对不起国家。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宣传，这符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生前对曹聚仁极其重视的历史事实……

曹聚仁在江西赣南时代，与蒋经国很熟，曹聚仁与蒋经国那一批人也很熟。曹聚仁曾对我说，有一位与蒋经国十分亲信的黄寄慈[1]曾来澳门看过他。我们将情况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毛主席就是让曹聚仁做宣传。炮轰金门以后，他听了我们的意见后，曾写了一封信。我去广州以后，听他的汇报。陈老总（陈毅）对我说，他对黄寄慈讲，希望蒋经国派个代表团来，派人来谈判，国共和谈，让徐淡庐去当代表团的理事长，周总理看了笑了笑说他不是徐淡庐，是汪淡庐，王淡庐，不是徐淡庐。当国民党的理事长，说他是胡说，他是有些乱想。毛主席与曹聚仁谈了三十八天，有意识让他透漏过去，我讲第三次国共合作，尽管可以放心，派人来谈。曹聚仁当时确实提出过一个意见，在金门举行国共谈判。我们是准备让蒋经国到金门来。曹聚仁说，北京派人去最好，如果不去，他去金门会见蒋经国。据我当时所知，曹聚仁并未去台湾。蒋介石、蒋经国派人去澳门与曹聚仁见面，我是相信有的。那时候去很方便，没有危险。

---

[1] 曾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曹聚仁都是省立浙江第一师范弘一法师的学生。

【深度阅读】

《听涛室人物谭》，曹聚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书林又话》，曹聚仁著，上海书店，1999年
《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上下册），曹聚仁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聚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鲁迅评传》，曹聚仁著，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万里行记》，曹聚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万里行二记》，曹聚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山水·思想·人物》，曹聚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文坛五十年》，曹聚仁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读书的回忆

《语义学习》杂志的编辑要我谈谈治学之道，惭愧得很。“起舞不辞无气力，爱君吹玉笛。”编辑先生的盛情我何能恳辞呢？说经过也罢，算陈述也罢，“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不过在我将近七十年的逝去年华中，来谈谈我的读书与自学罢了。

我是五岁破蒙，读的是私塾，又名蒙馆，人数不过七八人，从早到晚就是读书背书，中午后习字，隔三天要学造句。没有暑假、寒假、星期天，只有节日是休息的，到年终要背年书，就是将一年所读的书全部背出来方可放年学。当时的生活是枯寂的，塾师对学生的责任感是强的，真是一丝不苟。

家庭教育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八岁丧父，母亲对我这个幼子，既尽慈母爱子之心，又兼负起父责，她要我每晚灯下记账，清晨临帖练习书法，寒暑不辍。

我对老姑丈陈儒英先生是垂老难忘的。父亲去世后，我十岁那年妈妈将我送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插入三年级，但是我家几个弟兄的中文根底，却是老姑丈打下的。他是一位科举出身的老秀才。妈妈将我们几个弟兄托付了他，因此我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星期天加一篇作文，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记得我幼年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千家诗》，至今篇篇都很熟悉，那是

得益于当年的背诵。当时有些篇章也一知半解，但我都背出来，等以后再理解。比如《幼学琼林》这本书，就是我在私塾中由老姑丈亲授的，书中有许多人物传略、历史、地理常识等。那时我虽然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内容，但总觉得音节很美，上口容易，我就天天背诵，长大后就豁然贯通了。想不到就是这本《幼学琼林》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本最概括的索引。要不是我孩提时代背熟了这本书，长大后需要检索类书就十分不方便了。

少年时的博闻与强记，是增加、丰富知识的最好时光。我记得那时旧式人家有门联、厅堂联、书房联、字屏及匾额。写的都是名句、格言等，朝夕相对，自然成诵。有时还了解了这些文人学者的成就及身世。至今老家的许多联屏，我还能背得一字不差。一处乡土有一处的历史，父老们在茶余酒后的清谈，使我得到很多的乡土历史知识，有时我还结合自已的学习，做点小考证。初中时，我已能参考点地方文献，写些传闻掌故之类的文章，开始投稿，赢得老师的好评，今日看来这些文章当然是相当幼稚的。

我中学时所读的语文课本，大多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所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古文、语体文。古文中有经书的片段，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晚明小品以及诗词等。语体文有梁启超的、鲁迅的、胡适的、陈衡哲的、朱自清的、徐志摩的。总之，从篇目中已能看出中国文学史上的缩影。我早年一度做过浅薄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回想起来是得益于中学语文教师的严格训练与教育。他们不但讲解课文深入透彻；而且最重要的方法是要求学生把课文背出来，所以文学史上的一些精彩篇章全在我肚中了。例如《礼记·礼适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梁启超的《志未酬》："但有勤奋不有止，言志未酬便无志。"等佳句就起了指导学生怎样做人的作用。鲁迅的《阿Q正传》，朱自清的《背影》，这两篇文章学了后使我认识到旧社会的可憎，父子之情的伟大。还有名人传记，都教育学生要效法好的榜样。而那些朗朗上口的唐诗宋词，读起来比今天的"流行歌曲"不

知要感人多少倍。那时的老师讲得透，学生背得熟，一辈子受用无穷。

以后在大学学习，也没有废弃背书一节。考试时如果没有背的功夫，也考不上高分。

今天大家学外文的劲头是大了，应该说是好现象。然而对祖国的语文，去背的人相对地差劲一些。我曾向中央反映过，考研究生，语文应是主试内容之一。不论哪种专业，大学一年级还是要读语文的，如果没有祖国文字的表达能力，就是说，怀才无口，终等于零。

如今电脑普及了，但不能使人脑退化。现在的电子计算器使用很方便，资料复印固然好，但中学语文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仍不能放松。学语文，名篇不背，人脑的记忆功能不就退化了？读书人应尽量利用人的记忆功能，尤其是中小学生，学语文不读不背是不行的，作文光写点体会也是不行的。

梅兰芳、马连良等表演艺术家所以能不用扩音器，取得极佳的表演效果，这正是由于艺术大师们长期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那些手握麦克风的歌星们所无法比拟的。

如今，有的教师一上讲台，有些像做大报告，照脚本宣读，学生听听也就罢了。个别教师对教材尚未心领神会，讲起来当然就干巴巴了。说实话做老师的如果不下苦功，不花点力气去研究、熟悉课文，怎么教得好学生呢？我真佩服我们前辈的老师们，他们在十年寒窗中下了多大的苦功啊！

也许我调查得不够全面，有些语文老师不识繁体字，不辨平仄声，不知韵脚，一教韵文，但解文字，不知音节。个别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也还存在这些现象，中小学语文老师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文字，有形、有义、有声，是世界上特殊而俊秀的一种文字，做老师的应该理解它。我是理工科教师，不少日本的大学教师到中国来进修时带了汉诗，这些汉诗当然都是与建筑有关的，他们请教于我，如果我一无所知，怎么办呢？“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倘能边教边学，还算是好的，最怕的是说一声：“嗨，这是些老东西，封建的东西，落后的东西，淘汰的东西，不现代化了，过时了。”把

祖国的文化拒之于门外。

中国的文章重“气”，这是与书画、建筑、园林、戏剧、医学等一样的，要更重“气”。因此文章要朗诵，要背，得其气势。谚语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里说的是重在“熟读”两字。学语文，不读不背不理解，要想作好文章，凭你的语法学得再好，也如缘木求鱼。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可说全不是从语法学习中得到高水平的创作而成名的。语法不是不要学，学是为了检查自己的文章造句，合乎语法规律否，但不能靠语法来写文章。不是我今天讲句很不礼貌的话，很多语法老师语法是专家，可是写起文章来，也许不能令人满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恕我难言了，明理人自然知之。

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学习语文的方法，它培养了无数的文人学士，我们不能轻易地抛弃啊！白话文不等于白话，口语代替不了文章，学语法不是学作文的唯一方法，熟读《描写辞典》，写出来的文章牛头不对马嘴的，工具书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书籍。读书没有捷径，最愚蠢的方法却带来最聪明的结果，事物就是这样在转化。

我是文科出身，自学改了行，做了三十多年建筑系教师。在中学教过语文、史地、图画、生物等，在大专学校教过美术史、教育史、美学、诗选等。在建筑系我教过建筑设计初步、图画、营造法、造园学、建筑史、园林理论等，并且还涉及考古、版本、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可算是个杂家了。解放前，我是为生活所迫，有课就得教，要教就得准备，不然如何面对学生？辛苦当然是辛苦的，然而这又迫使人拼命干，尤其对青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现在有些青年教师要开一堂新课，什么先进修、参观啦，花样太多了。温床培养不出鲜花，游击战士有时比正规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更善于作战，艰苦的环境能锻炼出人才。多方面的知识，是会有助于专业学术水平提高的。

最后，我得申明：上述谬论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落后的，或不明现状的

痴语而已，请读者原谅。我是面对现在青年人语文水平不够理想而发出的呼吁，并无他意。

【大师简介】

陈从周（1918—2000），浙江杭州人，祖籍浙江绍兴，原名郁文，室名梓室，晚年自称梓翁。当代著名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散文家，且工诗词书画。1942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历任圣约翰高级中学、圣约翰大学、苏州美专、之江大学教职，同济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园林学会顾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委员会副主任、美国贝聿铭建筑事务所顾问等。主持设计、建造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明轩、上海豫园东部、云南昆明楠园等；主持修复有上海龙华塔影园、杭州西湖郭庄、绍兴东湖景点等。

【往事与追忆】

学问如家常

◎张昌华

节选自张昌华著《纪念陈从周先生逝世五周年》，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小改动。

作为园林专家的陈从周，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都有人请他去考察本地的古建筑和园林，他洋洋得意得像个孩子般天真："我陈从周出门，看来不用带粮票了。"他看到某地胡乱以杂石驳江岸，讥为"满口金牙"；某著名景点边的盆景园，自称为"万景山庄"，他嘲之"大言不惭"，是"真山下面堆假山，宾馆门口摆粥摊"。一次到扬州一家饭店吃包子、干丝，饭店的食品质量、服务水平都很差，他在意见簿上幽了一默："皮似铁来肉似钢，一碗干丝没有汤（干丝本应有汤）。"在学生面前，他平易随和。他与学生

谈旅游经验时说："旅要快，游要慢，急匆匆走景点，不如行军拉练。"逗得同学们捧腹。

作为土木匠的陈从周，他走出梓室，考察、修建古建筑及园林工程，事必躬亲，足迹遍踏大江南北；作为教书匠的陈从周，授课深入浅出。他在谈到大园林与小园林的区别时说"大园林宜动观，如浏览水墨长卷，小园林宜静观，如把玩扇子和册页"；在论述园林应由艳丽而素雅时说，如女孩子"小时候喜欢红皮鞋，大了喜欢白皮鞋"；在讲授园林造型收头处理的重要性时说"比如旧时相亲，'男看皮鞋，女看头发'"；称赞朴素的空间效果是"贫家勤扫地，贫女勤梳头"；在阐述保护古建筑与营造新建筑两者的关系时，以"土要土到底，洋要洋到家"一言概括。他游刃雅俗之间，而且都与传统文化有关，以至他的众多学生在缅怀先生时都说："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上课的生动情景。"

深度阅读

《上海近代建筑史稿》，陈从周著，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陈从周散文》，陈从周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
《陈从周随笔·梓室余墨》，陈从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书带集》，陈从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说园》（摄影珍藏版），陈从周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园林清议》，陈从周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





读书

《中学生杂志》社出了一个关于“书”的题目来，命我写一篇随笔。倘要随我的笔写出，我新近到杭州去医眼疾，独游西湖，看了西湖上的字略有所感，让我先写些关于字的话罢。

以前到杭州，必伴着一群人，跟着众人的趋向而游西湖。走马看花地巡行，于各处皆不曾久留。这回独自来游，毫无牵累。又是为求医而来，闲玩似属天经地义，不妨于各处从容淹留。我每在一个寻常惯到的地方泡一碗茶，闲坐，闲行，闲看，闲想，便可勾留半日之久。

听了医生的话，身边不带一册书。但不幸而识字，望见眼前有文字的地方，会不期地睁着病眼去辨识。甚至于苦苦地寻认字迹，探索意味。我这回才注意到：西湖上发表着的文字非常之多，皇帝的御笔，名人士夫的联额，或勒石，或刻木冠，冠冕堂皇地、金碧辉煌地，装点在到处的寺院台榭中。这些都是所谓名笔，将与湖山同朽，千古留名的。但寺院台榭内的墙壁上，栋柱上，甚至门窗上，还拥挤着无数游客的题字，也是想留名于湖山的。其文字大意不过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到此”而已，但表现之法各人不同：有的用炭条写，有的用铅笔写，有的带了（或许是借了）毛笔去写，又有的深恐风雨侵蚀她的芳名，特用油漆涂写。或者不是油漆，是画家的油画颜料。画家随身带着永不褪色的法国罗佛郎制的油画颜料，要在这里留名千古，是

很容易的。写的形式，又各人不同：有的字特别大，有的笔画特别粗，皆足以牵惹人目。有的在别人直书的上面故用横行、斜行的文字，更为显著而立异。又有的引用英文、世界语，使在满壁的汉字中别开生面。我每到一处地方，不论碑上的、额上的、壁上的、柱上的，凡是文字，都喜观玩。但有的地方实在汗牛充栋，尽半日淹留之长，到底不能一一读遍所有各家的大作。我想，倘要尽读全西湖上发表着的所有的文字，恐非有积年累月的闲工夫不可。

我这回仅在惯到的几处闲玩二三日。但所看到的文字已经不少。推想别处，也不过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增加分量罢了。每当目瞑意倦的时候，便回想关于所见的、所感的。勒石的御笔和金碧的名人手迹中，佳作固然有，但劣品亦处处皆是。它们全靠占着优胜的地位，施着华美的装潢，故能掩丑于无知者之前。若赤裸裸地品起美术的价值来，不及格的恐怕很多。壁上的炭条文字中，涂鸦固然多，但真率自然之笔亦复不少。有的似出于天真烂漫的儿童之手，有的似出于略识之无的工人之手。然而一种真率简劲的美，为金碧辉煌的作品中所不能见。可惜埋没在到处的暗壁角里，不易受世人的赏识，长使笔者为西湖上无名的作家耳。假如湖山的管领者肯选拔这些文字来，勒在石上，刻在木上，其美术的价值当比御笔的石碑高贵得多呢。

我的感想已经写完，但终于没有写到本题。倘读书与看字有共通的情形，就让读者“闻一以知二”罢。不然，我这篇随笔文不对题，让编辑先生丢在字纸篓里罢。

【大师简介】

丰子恺（1898—1975），出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现代画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影响。五四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早期漫画作品多取自现实题材，带有“温情的讽刺”，后期常作古诗新画，特别喜爱取材儿童题材。他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含蓄。

【往事与追忆】

怀念丰先生

◎巴金

我现在完全说不出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丰先生（我后来就习惯这样地称呼子恺先生），也许不清楚当初见面的情景，可是我还记得在南京念书的时候，是在1924年吧，我就喜欢他那些漫画。看他描写的古诗词的意境，看他描绘的儿童的心灵和幻梦，对我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以后一直是这样。1928年底从法国回来我和索非住在一起，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要在开明书店出版。索非常常谈起丰先生，也不止一次地称赞他“善良、纯朴”。他又是一个辛勤的劳动者，我看到他的一本接一本的译著和画集。他介绍了西方艺术的基本知识，他讲述西方音乐家的故事，他解释西方绘画发展的历史；他鼓吹爱护生物，他探索儿童的精神世界……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丰先生”的形象：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是我敬重他的为人。我不仅喜欢他的漫画，我也爱他的字，1930年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

的《自传》脱稿，曾托索非转请丰先生为这书写了封面题字，我不用多说我得到他的手迹时的喜悦。这部印数很少的初版本《我的自传》就是唯一的把我和那位善良、纯朴的艺术家连在一起的珍贵的纪念品了。

在抗战前我从索非那里经常知道丰先生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细节。后来我读到他自己的文章亲切地描述他在家乡安静的写作生活，然后是战火爆发、侵略军逼近家乡，他同家人仓皇逃难。从此他从浙江，去江西、湖南、广西，再去四川。这期间我也到过不少的地方。我说不出什么原因，我同他不曾有过任何的联系，可是他的脚迹始终未从我的眼前消失。他在各地发表的散文，能找到的我全读了。阅读时我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感到亲切的喜悦。他写得十分朴素、非常真诚，他的悲欢、他的幸和不幸紧紧地抓住我的心。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开明书店遇见过他，谈过几句话，事后才想起这是丰先生。另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到他在沙坪坝的新居去看望他。记不起我们谈了些什么，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保留着很好的印象，他仍然是那样一个人：善良纯朴的心，简单朴素的生活，他始终愉快地、勤奋地从事他的工作。1942年7月我还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店买了一幅他亲笔的漫画，送给我一个堂兄弟，为了激发他（堂兄弟）的高尚的情操。

上海解放后，我几次见到丰先生和一吟同志，听说他要翻译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语》，他开始自学俄文，并表示要学好俄文才去北京。我相信他有毅力做好这两件事。果然他在1959年去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的会议，他的俄语翻译的文学作品也陆续出版[1]。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工作。我们有时一起参加学习，他发言不多。今天我还隐约记得的只是他在1962年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简短的讲话，他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他反对用大剪刀剪冬青树强求一律的办法，他要求让小花、无名的花也好好开放。三个月后他又发表了散文《阿咪》。这位被称为“辛勤的播种者”的老艺术家不过温和地讲了几句心里话，他只是谈谈生活的乐趣，讲讲工作的方法。他做梦

[1] 在“四人帮”下台之前，我就听一位老友讲他正在阅读丰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全部手稿。

也没有想到要“反”什么，要向什么“进攻”。但是不多久台风刮了起来，他的讲话，他的漫画[1]一下子就变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大谈《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我带头“发扬民主”，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当时也有点担心，但料不到风向变得这样快。一方面我暗中抱怨自己不够沉着，信口讲话，我的脑子也跟着风在转向，另一方面我对所谓“引蛇出洞”的说法想不通，有意见。听见有人批评《阿咪》，我起初还不以为然，但是听的次数多了，我也逐渐接受别人的想法，怀疑作者对新社会抱有反感。纵然我不曾写批评文章，也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回想起这一段时期自己思想的变化，我不能不因为没有尽到“作家的责任心”而感到内疚：在私下议论时我不曾替《阿咪》讲过一句公道话。其实我也不能苛求自己，我就从未替我那篇发言讲过一句公道话。那个时候好像有一种强大的压力把我仅有的一点独立思考也摧毁了。

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参加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后回到上海，送走外宾之前我到作家协会分会开会，大厅里就挂着批判我那篇讲话的“兴无灭资”的大字报。那天受批判的是一位不久就被迫跳楼的文学评论家，我被邀请坐在“上座”，抬起眼便看见对面一张揭露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知道，我送走客人后，大祸就临头了。我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里很害怕。我盼望着出现一个奇迹：我得到拯救，我一家人都得到拯救。自己也知道这是妄想。我开始承认自己“有罪”，开始用大字报上的语言代替了自己的思考。朋友们同我划清了界限，其实大多数的熟人都比我早进“牛棚”，用不着我同他们划清界限了。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曾到过他的家，但我知道他住在陕西南路一所西班牙式的小洋房里，我去作协分会开会、学习、上班的时候，要经过他的弄堂口，我向人打听，他早在6月就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折磨了。

我还记得有一天到“牛棚”去上班，在淮海中路陕西路口下车，看见

[1] 《阿咪》的插图——“猫伯伯坐在贵客的后颈上”。

商店旁边墙上贴着批判丰子恺大会的海报，陕西路上也有。看到海报，我有点紧张，心想是不是我的轮值也快到了？……批斗以后我走过陕西路搭电车回家，望见那些西班牙式洋房，我就想起丰先生，心里很不好过：我都受不了，他那样一个纯朴、善良的人怎么办呢？！一天我看见了他。他不柱手杖，腋下挟了一把伞，急急地在我前面走，胡子也没有了，不像我在市政协学习时看见他的那个样子。匆匆的一面，他似乎不曾看见我，我觉得他倒显得年轻些了。看见多一个好人活下来，我很高兴。我以为他可以闯过眼前的这一关了。

但是事情不会是这么简单。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刮来一阵狂风，所谓“批黑画”的运动开始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挥舞大棒做报告随意点名，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的艺术家又无缘无故地给揪出来做靶子，连《满山红叶女郎樵》的旧作也被说成“反对三面红旗”的毒草。《船里看春景》中的水里桃花倒影也给当做“攻击人民公社”的罪证。无情的批斗已经不能说服人了，它只有使我看出：谁有权有势谁就有理。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懂得人们谈论的社会效果是怎么一回事情。我逐渐明白：像棍子一样厉害的批评常常否定了批评本身。棍子下得越多越是暴露了自己。最初我真的相信批斗我是为了挽救我。但是经受了长期批斗之后，我才明白那些以批斗别人为乐的人是踏着别人的尸首青云直上的。眼睛逐渐睁大，背上的包袱也就逐渐减轻。我不再惶恐，不再害怕，不再有有罪的感觉。

我不再替丰先生担心了。人民喜爱的优秀艺术家的形象是损害不了的。我不再相信“四人帮”能长期横行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垮得这样快，更没有想到丰先生会看不到他们的灭亡。在现今的世界上画家多长寿，倘使没有那些人的批斗、侮辱和折磨，丰先生一定会活到今天。但是听说他1975年病死在一家医院的急诊间观察室里。在上海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我都没有参加。第一次在1975年9月，我还不曾得到解放，他也含着冤屈；第二次在1978年6月，我在北京开会，他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没有在他的灵前献一

束鲜花，我始终感到遗憾。优秀的艺术家永远让人怀念。但是我不能不想：与其在死后怀念他，不如在生前爱护他。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吧。

【深度阅读】

《丰子恺散文》，丰子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丰子恺漫画全集》，丰陈宝编，京华出版社，2001年

《丰子恺自述》，丰子恺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

《缘缘堂随笔》，丰子恺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新月如水：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陈星著，中华书局，2006年

《我的父亲丰子恺》，丰一吟著，团结出版社，2006年



漫话读书

或有问我是怎样读书的，容我慢慢道来。

起初我一段时候只能读一本书，特别是读理论书。但长时间只读一本书，不免觉得厌气，只能放下书来不读，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等到重又拿起书时，总觉得有难以为继的迷茫。在读文学作品时，尤其是看长篇小说，读着读着就读到书里去了，甚至废寝忘食，欲罢不能。这样又走到了另一极端。

后来我偶然读到一篇美国大文豪海明威的访问记，他读书是同时读几本的，以后又见到当代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访问记，他也同时读几本书。我当时颇以为奇，心想一个人怎么能那么快速改变他的思绪呢。1980年我去美国访问，在一次招待酒会上遇到梅勒，便抓着这个题目向他请教。他说这习惯可以有意识地养成，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他起初时只是个偶然的行动。有一天他正在书斋里津津有味地读一本书，忽然邮件送来了（其中有一本作者送给他的书），他便放下原来在读的书，而把刚送来的新书翻了开来，这样便读了下去，脑里并不觉得有任何干扰，而且那种因久读一书所生的倦怠，也因接触了新的内容消散殆尽；他感到忽然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以后一本书看得厌烦，就另拿起一本，从同时读两本书，一直到同时读六本书。每换一本，就有新的感觉，而那种读一书的陈旧感也一扫而空。他发现以新的心情吸收新的内容，不但不会打乱他的思绪，而且反而增加脑子吸收

新刺激的效力。我听了他的话，回到旅舍，便有意识地加以试验，以后也就养成了习惯，但只能以同时看三本书为限，多了还是不成，而且理论书也不能两本同时读，否则思绪便搅成一锅粥。

古人每以一目十行称许饱学之士，过去我总以为是夸张，但试试也成。你把那些文章中的虚词形容词都去掉，十行也就剩不多几个字，再加以融会贯通，一目十行也是做得到的。但是我觉得要精读就不成了，精读需要下死功夫。一本书如果先读目录，把内容大致理一理，再读时便可省却许多时间，否则一时读几本要精读细读的书，我的经验是行不通的。可惜当时我没有问梅勒的经验如何。

这种一时读几本书的事，适合于时间不够的人。如果时间充足，那就无须这样赶读了。但作为读书时的休息，一时读几本，倒有极大帮助。因为可以使脑子得到新刺激而忘掉疲倦，也可以说这是心理上的一种移情作用，是不是的确如此，我非心理学家，不能妄作主张；但我总觉得一时读几本书完全可能。

现在我老了，已从繁杂的工作中退了下来，要读书有的是时间；正因为年老时间充足，读书便不能无为而治，要读更多的书。书也有涯，而书也无涯。古时读书五车，那时用木简，五车便了不起，如今是二吨半的大卡车，可以装多少书？我看是无法读完的，这就需要抓时间。我们要善于抓时间，一时读几本书便是个办法。

【大师简介】

冯亦代（1913—2005），浙江杭州人。1936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参加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并任《电影与戏剧》主编。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美国文学及戏剧，参加创办古今出版社。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译介当代外国文学，并在美国文学的评介研究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解放后，曾任国

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任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英文《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1979年筹办《读书》杂志，任主编。

【往事与追忆】

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

◎北岛

节选自北岛《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小节亦为编者所加（原文是五个小节）。

01

1976年10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六十三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02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们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冯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

“冯二哥”，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据说，他仗义疏财，“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埋单”。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

据说到了晚年，冯伯伯卧床不起，黄宗英向他通报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冯伯伯问了问数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划，说：“请客。”

03

“文革”中冯伯伯除了“美蒋特务”、“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还有一条是“二流堂黑干将”。关于“二流堂”，冯伯伯后来回忆道：“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郭沫若戏称的“二流堂”，不过是个文人相聚的沙龙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杯光斛错，一时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讲”的事，为杯中酒留下多少阴影。既然堂中无大哥，这仗义疏财的“冯二哥”自然成了头头，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讲”的事，赶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经历革命逻辑及其所有悖论的考验。他回忆道：“‘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04

1978年12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

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The Moment。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二十七年前的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05

所有病房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冰窖，连护士的动作都变得迟缓，好像也准备一起进入冬眠。一见冯伯伯平躺着的姿势，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摆布的姿势。听说他已中风七次，这是第八次。是什么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黄阿姨抚摸着冯伯伯的额头，亲昵地呼唤：“二哥，我来了。”冯伯伯慢吞吞睁开眼，目光痴呆，渐渐有了一点儿生气，好像从寒冬中苏醒。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头，叫了声“冯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这下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引起中风，慌忙退出他的视野。周围的人纷纷劝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从床单下露出来的赤脚，那么孤立无援。

我们在病房总共待了十分钟，就离开了。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今生今世。在门口，我最后回望了他一眼，默默为他祈祷。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而他对于黑的认识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亲在生下他一个多月后就患产褥热死去。他后来如是说："有母亲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时他们并不稀罕，视为应得；可是作为一个从小死去母亲的人来说，母爱对他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他盼望有母爱，他却得不到；他的幼小心灵，从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06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我此刻又回到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我怀着秘密，一个让我惊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从家出来，在黑暗中（楼里的灯泡都坏了）下楼梯，沿着红砖路和黑黝黝的楼影向前。那夜无风，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尽头，拾阶而上，在黑暗中敲向听风楼的门。

深度阅读

《美国文艺书话》，冯亦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期待的日子·山居杂记》，冯亦代、郑安娜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
《色彩集：回忆与评说》，冯亦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冯亦代自述》，冯亦代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冯亦代著，东方出版社，2003年
《冯亦代散文选集》，冯亦代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海明威文集——第五纵队西班牙大地》，（美）海明威著，冯亦代、董衡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冯亦代、黄宗英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





我的读书经验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一精其选，二解其言，三知其意，四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

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需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人民日报》。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画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做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

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啰唆。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啰唆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啰唆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啰唆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应、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

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大师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七年时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往事与追忆】

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宗璞

节选自宗璞著《冯友兰：蜡炬成灰泪始干》，标题为编者所加。

父亲最后十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渐渐有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对论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30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认为人类的将来必定会“仇必和而解”，都说出了他自己要说的话，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么？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父亲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他成为准盲人后，能完成大书

的一个重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当时，我为这句话大恸不已，现在想来，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而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他最后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就是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

【深度阅读】

《中国现代哲学史》，冯友兰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冯友兰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
《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冯友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冯友兰：云在青天水在瓶》，宗璞著，大象出版社，2002年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中下册），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哲学简史·插图珍藏本》，冯友兰著，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人生哲学》，冯友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一种人生观》，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哲学小史》，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冯友兰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书和读书

读书人与书的关系，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单纯。有人买书成癖，琳琅满架，若是你问他："这些书都读过吗？"他将难以回答，或者说："哪里能读这么多。"或者说："先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与此相反，有人身边只有少量的几本书，你问他："近来读些什么？"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读的就是这几本。"这两种情况我都有过。前者是在当年的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后者是在战争时期的昆明。这正如在一个地方住久了的人，对那里所有的特点失去敏感，经常注意不到，纵使有什么名胜古迹，总觉得随时都能去看，结果往往始终没有去过，倒不如短期来游的旅客，到一个地方便探奇访胜，仔细观察，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一生难忘。我在昆明，仅只有摆在肥皂木箱里的几十本书，联大图书馆里的书也很贫乏，若相信开卷有益，任意浏览，是不可能的。幸而清华大学带来一部分图书，外文书放在外文系的图书室里，都是比较好的版本，我经常借阅，这是我读书的一个主要来源。其次是昆明为数不多的旧书店，里边好书也很少，但我在出卖用过的旧书时，也会偶然发现一两种稀奇或有用的书籍。此外，我在1942年3月，出乎意料在法律系办公室里看到几十本德语文学书，这是法律系教授费青在德国留学时买的，由此可见这位法学家读书兴趣的广泛，也许是因为生活困难，他把这些书卖给学校了。书放在法律系，无人借阅，可能我是唯一的借阅者。

总之，书很有限，而且得来不易，那么，自己带来的书，就翻来覆去地读；借来的书要按期归还，就迅速地读；旧书店里买来的书，就爱不释手地读。这样，我读书就不能随意浏览，而要专心致志了。

前边提到过，我从1941年春起始翻译并注释《歌德年谱》，从外文系图书室借用四十卷本的《歌德全集》。这部《歌德全集》是德国科塔出版社为了纪念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于本世纪初期约请研究歌德的专家们编纂的，虽然有些过时，但还有学术上的权威性。那时我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下课后上山，背包里常装着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上买的菜蔬，一是几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几本，就掉换几本，它们不仅帮助我注释《歌德年谱》，也给我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歌德的作品。实际上也不能全读，有时只查一查与年谱有关的地方，参照我随身带来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选》、《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歌德谈话选》等，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加深了我对于歌德的理解。而且外文系的图书室不只有这部《歌德全集》，还有几部研究歌德的专著，若是没有这些书，我自从1943年以后发表的几篇关于歌德的论文是写不出来的。

至于法律系办公室里的德语文学书，我只看做是一个意外的发现，里边不是没有好书，却不是我当时迫切需要的，我借阅过几次，是些什么书我记不清了。

值得怀念的是青云街的一个旧书店，它并没有什么珍本奇书，但我在那里买了几本书，对我很有意义。1942年3月17日的日记："卖旧书130元，买《圣经辞源》20元。"1943年6月26日的日记："购《清六家诗钞》。"这两种书都是袖珍本，便于携带，至今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圣经辞源》可能人们认为是一种不值一顾的书，在米价一石超过千元的1942年，仅用20元就能买到，几乎等于白送。可是它对我很有用，这是一本《圣经》里人名、地名、重要事件和词汇的索引，并有较为详细的解释，用它查阅中文本《圣经》，非常方便。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使用它。《清六家诗钞》是日本印的清

刘执玉编的清初六诗人宋琬、施闰章、王士祯、赵执信、朱彝尊、查慎行的诗选，线装袖珍四册，几乎每首诗都有日本近藤元粹的眉批，前有近藤的序文，写于明治四十年（1907），序文里声明他并不喜欢清诗，所以他的评语有褒有贬。我对于这六位诗人也不感兴趣，不过看看日本学者怎样评论他们，也不无意义。

在我购买《清六家诗钞》的前两天，我6月24日的日记写道："欲买杜少陵诗已售出，知为丁名楠购去。"25日的日记："丁名楠持来杜少陵诗相让，盛情可感。"这可能是我在24日以前就看到了杜少陵诗，由于袋里的钱不够没有买，再去时书已卖出，当时遇到丁名楠的一位同学，他把丁名楠买去的事告诉了我，又把我没有买到的事告诉丁名楠。在书籍非常缺乏的时期，丁名楠肯把刚买到的书让给我，真是盛情可感，同时我也要感谢那位传递消息的好心人。丁名楠是联大历史系同学，现在是很有成就的历史学者。

这部杜少陵诗是仇兆鳌的《杜少陵诗详注》，合订二册，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不是什么好版本。自从抗战以来，我就喜读杜诗，苦于身边没有杜甫的全集，如今得到这部平时很容易买到的仇注杜诗，我却视如珍宝。我一首一首地反复研读，把诗的主题和人名、地名以及有关杜甫的事迹分门别类记录在"学生选习学程单"的背面，这种"卡片"我积累了数百张。杜甫的诗和他的为人深深地感动我，我起始想给杜甫写一部传记，这时《歌德年谱》的注释工作中断已将及两年了。

歌德的著作与杜甫的诗是我在昆明时期主要的读物，读得比较仔细，比较认真，我之所以能这样，不是由于书多，而是由于书少的缘故。此外，我也以热情和兴趣读我随身带来的陆游的诗、鲁迅的杂文、丹麦思想家基尔克郭尔的日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个别著作、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和书信。**这些读物对于我的写作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写杂文，虽然针对现实，有时也需要从书本里得到一些启发，或是摘引一两句名言警句，给自己的文章增加点分量。**

《十四行集》里有三首诗分别呈献给鲁迅、杜甫和歌德，现在看来，这三首诗未能较好地体现出他们的伟大精神，我只是在当时认识的水平上向他们表达了崇敬的心情。而且这部诗集里有些篇章，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里尔克的影响。

陆游诗中有许多脍炙人口、广泛流传的名句，《示儿》一诗，在抗战时期更为人所称道。但是我最钦佩他《送芮国器司业》一诗："往岁淮边虏未归，诸生合疏论危机。人材衰靡方当虑，士气峥嵘未可非。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还朝此段应先及，岂独遗经赖发挥。"这种政见，忧国忧民的杜甫不曾有过，辅佐魏玛公爵的歌德也不曾有过。又如《西村醉归》里的诗句："一生常耻为身谋"和"剑不虚施细碎仇"，都曾给我以教育。

比较复杂的是基尔克郭尔和尼采。前者生活在欧洲19世纪中叶，后者在19世纪末期。他们在世时非常孤立，死后也是毁誉参半。他们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欺骗和庸俗气，如见肺肝，他们毫不容情的揭露与批判无不入木三分。可是他们目无群众，把人民群众跟资产阶级社会混为一谈，这是他们的致命伤。最后基尔克郭尔在丹麦成为众矢之的，在哥本哈根街上散步时昏倒死去，尼采患神经错乱与世长辞。我读他们笔锋锐利的论战文字，时常想到鲁迅在《坟》的《题记》和《写在〈坟〉后面》里的两段话。鲁迅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他还说："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便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我并不要把基尔克郭尔与尼采跟鲁迅相比，甚至给人以替他们辩解的印象。他们的确给他们那时代的伪善者和乡愿们的"好世界"多留下了一些缺陷，使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服。这是他们值得肯定的积极的方面。我看到社会上光怪陆离难以容忍的种种现象感到苦闷时，读几段他们的名言隽语，如饮甘醇，精神为之振奋。至于他们蔑视群

众、强调个人、自命非凡的方面，往往在我的兴奋中被忽略了。记得在1941年秋，可能是参加一次欢迎老舍的聚会，会后晚了，不能回山，我和闻一多在这天夜里住在靛花巷教员宿舍里。我们过去并不熟识，只因他读了我写的一篇介绍基尔克郭尔《对于时代的批评》的文章，甚为赞许，我们一直谈到深夜。

我在昆明读的书不多，那些书的作者却对我说了些真心话，话的种类不同，有过时的老话，有具有现实意义的新话，有的给我以教育，有的给我以慰藉。如今我怀念和它们的交往，也跟怀念当年与朋友和同学们的交往没有两样。

大师简介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县人，诗人、教育家、德语文学专家、翻译家。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1923年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发表新诗。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记录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哈尔滨教书生活。1930年赴德国留学专攻德国文学，兼修美术史和哲学。1935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交系德语教授、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1980年当选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研究院外籍院士。1981年当选为联邦德国美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通讯院士。1983年获联邦德国歌德学院歌德奖章。1986年获民主德国格林兄弟文学奖金。1986年当选为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1987年获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艺术奖，用其所得一万马克设立了“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

“我不懂里尔克”

◎叶廷芳

节选自叶廷芳著《缅怀冯至先生》。

作为学者和老师，冯至先生生前在我心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发生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当时北大在“要用党校标准办大学”的口号蛊惑下，在西语系掀起了一股“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热潮。各个专业都忙着拟定自己的“重点批判对象”。德语专业的五个年级的一百多位师生集中在民主楼楼上的一间大教室里，大家几乎一致提出要以歌德为重点，因为歌德年轻时就欣然去朝廷做大官，不惜与王宫贵族为伍，而且恩格斯也说他有“渺小”的一面。这时站在讲台上主持会议的冯至先生表现出一种难言的苦衷，但大家都在等待着他回答。最后冯先生不得不以深沉而诚恳的语调说：“同学们，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歌德在德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如果我们批了歌德，会伤害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伤害民族感情”六个字掷地有声，大家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动，会场上久久鸦雀无声！冯先生鼓励大家提别的作家，但个个目瞪口呆。这个由冯先生亲自主持的“大批判动员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

90年代初，我在编一部论文集，邀请多人分别撰写十几位现代主义作家，每篇三四万字。其中里尔克这一篇，我想冯先生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开始他不大肯答应。于是我动员他。我说：“你是以‘学贯中西’著称的学者，国外的您抓了顶尖儿的诗人歌德，国内的您抓了顶尖儿的诗人杜甫，这是您学术战略上的横向平衡。而在德语文学领域，古代的您抓了最大的，现代的您抓的里尔克在德语诗人中也是最大的，这是纵向的协调。只是您关于里尔克写的还不够多，如能通过这篇长文充实一下，这对后辈也是一种

欣慰。”结果他答应了。但截稿时冯先生未能交稿。于是我给他宽限三个月，结果他还是不能交稿。我又往后推三个月。最后我去要稿时，他却抱歉地说：“叶廷芳，我跟你说实话：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我并没有搞懂。”我听了十分震惊，觉得这位老先生真了不起，居然在后辈面前摧毁自己的权威形象。便宽慰他，说：“现代派的作品看不懂是常事，但资料那么多，您参考一下别人的就是了。”他马上反驳说：“诗这东西主要靠理解，别人写的是别人的看法。不知为不知，人云亦云那是问心有愧的！”先生这样执著于严格要求自己，这使我内心深为感动。这是前辈学者对后辈的最有力的言传身教。在尔后的学术生涯中，他的这段话时时都在警策着我。

【深度阅读】

《冯至全集》（共十二卷），冯至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昨日之歌》，冯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十四行集》，冯至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
《歌德诗选》，歌德著，冯至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给青年诗人的信》，里尔克著，冯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绿衣人·伍子胥》，冯至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哈尔次山游记》，海涅著，冯至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



怎样读书

一个普通人走进了图书馆，看见满屋满架的书，觉得眼睛都花了。这是由于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兴趣所致。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参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确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报，有人喜欢看专题新闻，有人喜欢看小说文艺，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

有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但永久只用一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倘使无论哪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生能够读得多少部书呢？但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必须细读的，若只随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读书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别书籍缓急轻重，知道哪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哪几部书是只要翻翻的，哪几部书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动，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这个法子，只有多看书目，研究一点目录学。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

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我们读书的第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的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

再有两件事情，也是应当注意的。其一，不可以有成见。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做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做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唯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学问的范围何等样大，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值得研究，就是我们人类，再研究一万年也还是研究不尽。至于应用的范围却何等样小，方向是根据我们所需要而走的。昨天需要的东西，今天不要了，就丢了。今天需要的东西，明天不要了，也就丢了。若是为了应用的缘故，一意在应用上着力，把大范围忘了，等到时势一变，需要不同，我们岂不是剩了两只手呢！我们不能一味拿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判定学问的好坏；就是某种像是没有用的学问，只要我们有研究的兴趣，也是可以研究下去为我们所用的。

其二，是应该多赏识。无论哪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与它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我们要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对别种学问有些赏识，使得逢到关联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请求这方面的专家解决，或者把这些材料送给这方面的专家。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

我从前的读书虽然并不希望博洽，但确是没有宗旨，脑子里只有一堆

零碎材料，连贯不起来。经过章太炎先生的提示，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我想我的为学，无论治什么东西都可以见出它的地位，不肯随便舍弃，因此对着满眼都是的史料彷徨。但自己近情的学问毕竟还是史学，我就丢了其他勉力做史学。那时我很想做一部中国学术史，名为《学览》。粗粗定了一个目录，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分类标题，预备聚集材料，撰写成丛书，现在看来，这种治学门径是对头的。

初进学问界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的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们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他因为对于所见的东西感到兴味，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不像学术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种种难处，不敢为了立一异议，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正因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炼，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久保留下去。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还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正

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唯其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了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就是为此。固然有人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也有人说，为学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设，有了假设才有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终该选定的，尽不妨碍将来深入之后而弃去。这种话在以前是可以说的，因为那时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学问的基础既不建筑于事实上，研究学问又苦于没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点引路的微光，为寻求一个下手处计，也有选择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菲薄《诗》毛氏学，便当从齐、鲁、韩三家或其中的一家研钻下去；等到自己的学问足以自树了，再脱离家派而独立。但到了现在，学问潮流已经很明白地昭示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了。我们自有古文字学，古文法学，古器物学，古历史学等等直接去整理《诗经》，《毛传》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诗》也是《毛传》的“一丘之貉”，又何尝要得！至于我们为要了解各家派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对于家派有所寻绎，但这是研究，不是服从。我很怕别人看了我表彰郑樵、崔述诸人的文字，就说我做了他们的信徒而来反对毛公、郑玄，所以现在在此附带声明一句：我对于郑樵、崔述诸人决无私爱；倘若他们的荒谬有类于毛公、郑玄，我的攻击他们也要和对于毛公、郑玄一样。希望读者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这等的批判，千万不要说“承你考辨得很精细，我有所遵循了”这一类话！

《老子》说“自知者明”，希腊的哲学家多劝人知道自己。在这一方

面，我“当仁不让”，自认为无愧的。我既不把别人看做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做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他种事务。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惯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自己的凭藉，故不愿抹却他人的功绩；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故不愿徇着一时的意气。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功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所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现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维护。因为我有了以上种种的自觉，所以我以为我现在固然学力浅薄，不足以解决多少问题，但我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是不错的，我的假设虽大胆而绝不是轻举妄动，只要能从此深入，自可驯致于解决之途。

【大师简介】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是我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曾应毛主席、周总理之请，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别》和《二十四史》。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20

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

【往事与追忆】

顾颉刚二三事

◎汪修荣

节选自汪修荣著《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标题为编者所加，小标题亦然。

1

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对此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当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

上课时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这一点他的朋友钱穆也有同感："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唯多写黑板。"虽然顾颉刚不善讲课，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2

1931年9月，钱伟长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历史国文成绩优异，历史更是考了个满分，但物理数学考得很不理想，其中物理只考了18分。受钱穆影响，钱伟长准备读历史。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热血青年钱伟长一改初衷，想转学物理，走科学救国之路。清华物理系一向门槛很高，以他的成绩绝无希望被录取，钱穆也不同意他放弃历史。无奈之中，钱伟长想到了顾颉刚，请他去做叔叔的工作。顾颉刚对钱伟长的想法十分赞成，最终帮他说服了钱穆。当时的情况很有戏剧性，一方面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收这个低分考生，另一方面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则在到处寻找这个历史满分的考生。顾颉刚与钱穆商量，由他去做吴有训的工作，让物理系收钱伟长；钱穆则去做陈寅恪的工作，让他放弃钱伟长。经过这样一番努力，钱伟长终于如愿以偿进了物理系，后来在物理学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晚年钱伟长回忆起当年顾颉刚对他的帮助时，感激地说："今天我之所以能从事科学工作，顾先生是帮了很大的忙的。"（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没有顾颉刚，也许就没有科学家钱伟长。

3

1929年顾颉刚回苏州养病时，偶然读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

大为欣赏，当即对钱穆说：你不合适在中学教书，你应该到大学教历史。随后即推荐钱穆到燕大，并请他为《燕京学报》撰文。不久，钱穆就撰写了一篇名为《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文章，该文章在伪造经书问题上完全与康有为唱反调。虽然顾颉刚是康有为的拥护者，但他接到钱穆的文稿后却毫不以为忤，并且还为文章改了更合适的名字。此文在《燕京学报》一发表，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钱穆也因此一举成名。顾颉刚不久后又力荐钱穆到北大任教，在致胡适的信中，他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这样卖力荐人的，在学术界并不多见。数十年后，钱穆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充满感激之情："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

【深度阅读】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顾颉刚著，中华书局，1996年
《浪口村随笔》，顾颉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中国疆域沿革史》，顾颉刚、史念海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著，北京出版社，2002年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顾颉刚著，中华书局，2002年
《史林杂识初编》，顾颉刚著，中华书局，2002年
《吴歌·吴歌小史》，顾颉刚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年
《尚书校释译论》（1—4册），顾颉刚等著，中华书局，2005年
《古史辨》（1—7册），顾颉刚著，海南出版社，2005年
《顾颉刚自述：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顾颉刚日记》（1—12册），顾颉刚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古史辨自序》，顾颉刚著，中华书局，2006年
《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尽信书，不如无书

书帮助了我们，也害了我们。

这话又怎样讲?

详细一点说，有的书，说了一些真话的书，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推动我们走向人生之正途；而有的书，那些说假话的书，则使我们头脑糊涂，眼睛不亮，做了许多傻事，走了许多冤枉路也。

说来话长。姑举一例以明之。

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拜伦没有好感。其实我并没有好好念过他的诗，而却有了成见，你说怪不怪呢？这完全是法国的有名的传记作家兼资本家安德烈·莫洛亚的《拜伦传》害了我的。莫洛亚先生的文章是蛮轻松的，我读了他的雪莱传（即《爱俪儿》），就又去找他的《拜伦传》来读。那已经是1934年左右的事情了。现在还大约记得的，是他写拜伦与其异母姐姐有恋爱关系，同居关系；而且他不断地和这个女的好又接着和那个女的好；在意大利时，他过着很奢侈的生活，他一出游后面就跟着载鳄鱼、猎犬、女人的车子。总之，把他写得很荒淫的样子。过去关于拜伦的一点知识抵抗不了这种影响，于是在我脑子里他就成了一个单纯的“堂·璜”了。

一直到抗战以后，读了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中讲拜伦的那一章，我脑子里的拜伦才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才活生生地感到他是一个为

自由与民主而战的猛士，一个狂暴地震动了英国当时的统治阶层，因而受到压制、迫害与诽谤的反叛者。而这正是他成为大诗人的主要原因。

爱伦堡有一篇文章，其中说到莫洛亚是个工厂的老板，而他开舞会介绍他的小姐到社交界之奢华铺张，光怪陆离，刚好说明他自己正是一个荒淫者。他之所以讨厌拜伦，并把拜伦写成一个讨厌的人物，岂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夫子这句话有些道理。但是他这句话也不可尽信。问题在看是什么样的书：说假话的书抑或是说真话的书。如何辨别这两类书，与辨别真假都有的第三类书中的真话和假话，除了必要的知识之外，主要还是靠我们读书时有一种思索的批评的态度。

【大师简介】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现代诗人，散文家，文艺评论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往事与追忆】

诗人的另一面

◎杜书瀛

节选自杜书瀛著《痛失良师——回忆何其芳同志》，标题为编者所加。

毛主席曾经谈到其芳同志的两个特点，一个是“书呆子气”，这是他的缺点；一个是“认真”，这是他的优点。这样的评价是很确切，中肯的。

书呆子气，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在其芳同志身上也相当显著。比

如，在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有时不那么敏感。在生活上很马虎。我们的五七干校从罗山迁到息县东岳集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和他住一个房间。他除了劳动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对个人生活，不大会料理。衣、食、住、行，似乎都得有一个保姆跟在身边才好。听说在罗山的时候还闹了这样一个笑话：一天午餐吃鱼，他匆匆忙忙拿漱口杯把鱼打回来，鱼香可口，很快下肚，吃到最后，忽然夹出一块肥皂头，险些放进嘴里。原来，清早洗刷时，肥皂头放在杯内，装鱼时忘记取出。同志们常常拿这件事取笑他，他只是以憨笑答之。

1976年7月，正当"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其芳同志却忙着把他那高度近视的眼睛贴在书籍上，审核《唐诗选》和《唐诗选注》的注释和作家小传。那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不久，他家附近的民房，有的倒塌了，隔壁《北京日报》印刷厂的房子也裂了缝，他自己的住房原有的裂缝也扩大了，一阵一阵的余震使屋顶灰土索索下落，人心惶惶，大都避震于室外。其芳同志却舍不得离开他那堆满了《全唐诗》和各种唐诗选注本的写字台。当同志们和他的爱人硬把他拉到室外，锁上房门的时候，他又在用塑料布搭起来的防震棚中工作起来了。白天，烈日把塑料布晒得烫手，他在棚中翻阅材料，任凭汗流浃背，人声鼎沸；晚上，他或者用手电筒照明，或者坐在长安街的路灯下，通宵达旦地看书，汽车和行人在离他很近的马路上川流不息，嘈嘈杂杂，他全不管。这真如古诗中所谓的"心远地自偏"啊！

【深度阅读】

《何其芳全集》，何其芳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画梦录》，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诗歌欣赏》，何其芳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何其芳散文选集》，何其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贺仲明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胡适谈读书】

读书

“读书”这个题，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却觉得这个题目很不好讲。据我所知，“读书”可以有三种说法：

一、要读何书。关于这个问题，《京报副刊》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但是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二、读书的功用。从前有人作“读书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要说，读书是求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所以我也不必讲。

三、读书的方法。我今天是想根据个人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现在这种书签虽不用，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来说一说。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

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读外国书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port看做pork，把oats看做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

一、字典，辞典，参考书等工具要完备。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当到图书馆去看。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生跟着你，终生享受不尽。

二、要作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识，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构造，方才懂得它的意义。

三、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但看字面。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读者容易上当。

例如turn这字：

作外动字解有十五解，

作内动字解有十三解，

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

共五十四解，而成语不算。

又如strike：

作外动字解有三十一解，

作内动字解有十六解，

作名词解有十八解，

共六十五解。

又如go字最容易了，然而这个字：

作内动字解有二十二解，

作外动字解有三解，

作名词解有九解，

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子。英文字典是完备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这就非比较上下文，或贯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较英文更难，现在举几个例：

祭文中第一句“维某年月日”之“维”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说它是虚字。《诗经》里“维”字有二百多，必须细细比较研究，然后知道这个字有种种意义。

又《诗经》之“于”字，“之子于归”“凤凰于飞”等句，“于”字究作何解？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诗经》中就发

生问题，必须比较，然后知"言"字为联接字。诸如此例甚多，中国古书很难读，古字典又不适用，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懂得呢？

总之，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又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宋儒程颐说："学原于思。"

这样看起来，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例如：

（1）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

（2）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

（3）作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又可分四类：

a. 抄录备忘。

b. 作提要，节要。

c. 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则还塞之矣。"

d. 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作提要，或作说明，或作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

“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识。假使你听了我这句话，不服气，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种书籍，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的札记，列举了：

一、生物学上的证据；

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

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

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

五、考古学上的证据；

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

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论”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其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哪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他前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史，做了许多辨伪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绩早已超过崔述了，更不要说姚际恒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我

们可以说，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

第二要讲什么叫“博”。

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我也主张这个意思，所以说读书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们主张“博”有两个意思：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

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在座的人，大多数是戴眼镜的。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了；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荆公说得最好：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伦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得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

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简单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为做人计。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高四百八十英尺，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以次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

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颢说的好：

>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博学正所以“大其心使开阔”，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口号，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作为读书的目标：

> 为学要如金字塔，
> 要能广大要能高。

为什么要读书

青年会叫我在未离南方赴北方之前在这里谈谈，我很高兴，题目是《为什么要读书》。现在读书运动大会开始，青年会拣定了三个演讲题目。我看第二个题目《怎样读书》很有兴味，第三个题目，《读什么书》更有兴味，第一个题目无法讲，《为什么要读书》，连小孩子都知道，讲起来很难为情，而且也讲不好。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不免要侵犯其余两个题目的范围，不过我仍旧要为其余两位演讲的人留一些余地。现在我就把这个题目来试一下看。我从前也有过一次关于读书的演讲，后来我把那篇演讲录略事修改，编入三集文存里面，那篇文章题目叫做《读书》，其内容性质较近于第二个题目，诸位可以拿来参考。今天我就来试试《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题

目。

从前有一位大哲学家（宋真宗，编者注）作了一篇《读书乐》，说到读书的好处，他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意思就是说，读了书可以做大官，获厚禄，可以不至于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轻的漂亮太太（台下哄笑）。诸位听了笑起来，足见诸位对于这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不十分满意，现在我就讲所以要读书的别的原因。

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我一踏进青年会的大门，就看见许多关于读书的标语。为什么读书大概诸位看了这些标语就都已知道了，现在我就把以上三点更详细地说一说。

第一，因为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知识的遗产，我们接受了这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知识。人类之所以与别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文字，可以把知识传给别人，又传至后人，再加以印刷术的发明，许多书报便印了出来。人的脑很大与猴不同，人能造出语言，后来更进一步而有文字，又能刻木刻字，所以人最大的贡献就是能累积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使后人可以节省很多脑力。非洲野蛮人在山野中遇见鹿，他们就画了一个人和一只鹿以代信，给后面的人叫他们勿追。但是把知识和经验遗给儿孙有什么用处呢？这是有用处的，因为这是前人很好的教训。现在学校里各种教科书，如物理、化学、历史等等，都是根据几千年来进步的知识编纂成书的，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教完一科。自小学，中学，而至大学毕业，这十六年所受的教育，都是代表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得来的知识学问和经验，所谓进化，就是叫人节省劳力。蜜蜂虽能筑巢，能发明，但传下来就只有这一点知识，没有继续去改革改良，以应付环境，没有做格外进一步的工作。人呢，达不到目的，就再去

求进步，而以前人的知识学问和经验做参考。如果每样东西，要个个人从头学起，而不去利用过去的知识，那不是太麻烦了吗？所以人有了这知识的遗产，就可以自己去成家立业，就可以缩短工作，使有余力做别的事。

第二点稍复杂，就是为读书而读书，为求过去的知识而读书。不错，知识可以从书本中得来，但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模糊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近，所以读书要戴眼镜。不读书，学问不能进去，读书没有门径，学问也不能进去。曾子固说过，“经而已不足以致经”，所以他对于本草纲目、内经、小说，无所不读，这样对于经才可以明白一些，所谓“致已知而后读”，读书无非扩充知识而已。我十二岁时，各种小说都看得懂，到了三十年以后，再回头看，很多不懂。讲到诗经，从前以为讲的是男女爱情、文王后妃一类的事，从前是戴了一副黑眼镜去看，现在换了一副眼镜，觉得完全不同。现在才知道诗经和民间歌谣很有关系。对于民间歌谣的研究，近来很有进步，北平有歌谣周刊、歌谣丛书，关于各地歌谣收罗很广。我们如果能把歌谣的文章，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幼稚时代的环境和生活很有趣味，例如诗经里有一段说：“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在从前眼光看来，觉得完全讲不通，现在才知道当时野蛮人社会有一种风俗，就是男子向女子求婚，要打野兽送到女家，若不收，便是不答应。还有诗经里“窈窕淑女”一节，从比较民族学眼光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社会的人，吃饭时可以打鼓弹琴，丝毫没有受礼教的束缚。再从文法方面来观察，像诗经里“之子于归”、“黄鸟于飞”、“凤凰于飞”的“于”字，此外，诗经里又有几百个“维”字，这些都是有作用无意义的虚字，但以前的人却从未注意及此。所以书是越看越有意义，书越多读越能读书。再说在《墨子》一书里，差不多各种学问都有，像光学、力学、逻辑、算学、几何学上的圆和平行线，以及经济学上的购买力和货币，几乎什么都讲到了，但你要懂得光学，才能懂得墨子所说的光，你要懂得各种知识，才

能懂得墨子。总之，读书是为了要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读书，怕书难读。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我们要打倒难读，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若是我们有了基础的科学知识，那么，我们在读书时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说一遍，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越多读书。

第三点，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吃饭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岔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是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困难很多。病有各样的病，发烧，头痛，多得很。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困难弄清。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读书就是出主意，暗示，但主意很多，于是又逢着困难。主意多少要看学问多少。都采用也不行。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么，就换了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个钥匙开不出就换了一个，假定是可以开的，那么，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试验。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五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段。科学家要解决问题，侦探要侦探案件，多经过这五步。第三步主意或暗示很多，若无主意，便无办法，没有主意，便不知道怎样办，这是因为知识不够，学力不足，经验不丰富，从来没有想到，所以到要解决问题时便没有材料。读书是过去知识学问经验的记录，而知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所谓养军千日，用兵一朝。否则，学问一点都没有，遇到困难就要糊涂起来。例如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却想不出什么原则去解决，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地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达尔文研究了这原则，忽然触机，就把这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创了物竞天择的学说。譬如一条鱼可以产生二百万鱼子，这样，太平洋应该占满了，然而大鱼要吃小鱼，更大的鱼要吃大鱼，所以生物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但按照经济学原则，达尔文主义是很没有条理的，而

我们读书就是要解决这个困难。又譬如从前的人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后来天文学家哥白尼却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绕着地球而行。据罗素说，哥白尼所以这样地解说，是因为希腊人已经讲过这句话，哥白尼想到了这句话可以解决这问题，便采用了。假使希腊没有这句话，在六十几年之后恐怕没有人敢说这句话吧。这就是读书的好处。像这样当初逢着困难后来得到解决的事很多，单说我个人就有许多。在我的书房里有一部小说叫做《醒世姻缘》，是西周生所著，自然用的是假名字，这是十七十八世纪间的出品，印好在家藏了六年。这部小说讲到婚姻问题，其内容是这样：有个好老婆，不知何故，后来忽然变坏，作者没有提及解决方法，也没有想到可以离婚，只说是前世作孽，因为在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换样子，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这种前世作孽，起先相爱，后来忽变的故事，我仿佛什么地方看见过，后来在《聊斋》一书中见到一篇和这相类似的笔记，也是说到一个女子，起先怎样爱着她的丈夫，后来怎样变为凶太太。便想到这部小说大约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作的。去年我看到一本杂志，也说是蒲留仙做的，不过没有证据。今年我在北平，才找到了证据。这一件事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点，就是读书是为了要读书而读书，同时也可以解释第三点，就是读书可以供给出主意的来源。当初若是没有主意，到了逢着困难时便要手足无措，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军事、政治、财政、思想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读书的用处。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着洋灯看小说，洋灯装有油，但是不亮，因为灯芯短了。于是他想到《伊索寓言》里有一篇故事，说是一只老鸦要喝瓶中的水，因为瓶太小，得不到水，它就衔石投瓶中，水乃上来。这位朋友是懂得化学的，加水于灯中恐怕不亮，于是投以铜元，油乃碰到灯芯。这是看伊索寓言看小说给他的帮助。读书好像用兵，养兵求其能用，否则即使有十万二十万的大兵也没有用处，有的时候还要兵变呢。

至于《读什么书》，下次陈钟凡先生要讲演。今天我也附带地讲一讲。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读了三十五年的书。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

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书可以说是还没有两三部，至于精心结构之作，两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譬如老子这部书，今天说一句“道可道”，明天又说一句“非常道”，没有一些系统。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诗经》、《礼记》、《易经》也只有一点形式，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知识的帮助的。中国书不够读乐趣，我们要另开生路，辟殖民地。读书要读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起初的确要查阅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能把所读的书的内容句句分析清楚，这样地继续不断做去，那么，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我总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据我过去三十五年读书的经验，给你们一些贡献。

大师简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

回忆胡适之先生

◎唐德刚

节选自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小节为编者所加。

1

就拿胡适之先生来说吧，胡氏在纽约退休之时，精力犹盛，本可凭借北美之资财，整理中华之国故。孰知他的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这一职位，因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笔者后来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实上，它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中，则微不足道。经院官僚，根本不把这部门当做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觉人微言轻，无啥建树之可言。笔者何人？居其位犹不免有倚门弹铗之叹，况胡适博士乎？

后来胡氏在哥大来来去去，哥大当轴对这位“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表面上还算相当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面子的背后，真正的态度又如何，则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当轴一位新进一块儿午餐，他正在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我乘机向他建议请胡适来帮忙。他微笑一下说：“胡适能教些什么呢？”事实上，我也完全了解他这句话是反映了当时美国文教界，对华人学者在美国学府插足的整个态度。那就是只许狗摇尾巴，绝不许尾巴摇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怎能做摇尾之才呢？所以对他只好敬而远之了。

但胡氏真正的可敬可爱的孔门书生的气习，十足地表现在他对他母校关怀的心情之上。他对哥大的爱护绝不亚于他对北大的爱护，其居心之淳朴，真是情见乎辞。

记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陆上出版的新书。我说哥大没有这本书。胡先生惊讶地说："我们哥伦比亚怎能没有这本书？！"

原来哥大当时图书经费的分配是按各科系注册学生人数为标准。那时读汉学的洋学生不过寥寥数人，图书经费因而只摊到二百元。二百元能买多少书呢？胡先生认为"这太不像话"！他约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饭，并把此事"好好地谈一谈"！

我真的和胡先生为此事谈到深夜，但我内心的反应只是一阵阵的辛酸。我认为胡氏找错了"谈一谈"的对象。我这小职员算老几？谈有何益？然使我更觉难过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难找到适当的对象。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2

胡先生另一种难能可贵之处，是他毫无道学气味。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是他从无"程门立雪"的那一派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往往还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这就是胡适之的本事，别人是绝对学不到的！

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这一小遭遇使我想到司马迁形容孔子迷路的故事。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一个人彷徨于东门大街之上。子贡忙着去找他，听到街上人说东门大街上有个怪老头的观光客，"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当子贡找到了孔老师之后，以街上人所说的话据实告之。孔子听了大为高兴说，街上人说他容貌像尧、像皋陶、像

子产……那倒未必，但是说他像“丧家之狗”，倒真是“然哉！然哉！”，原来孔子也是和胡适一样的一位活生生的老教授，可是两千年来却被那些腐儒和政客糟蹋得不成样子。

忆胡适之

◎张爱玲

节选自张爱玲《忆胡适之》

1955年11月，我到纽约不久，就去见适之先生，跟一个锡兰朋友炎樱一同去。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出现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还在香港。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得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他们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她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不大会说了。

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我还没进门就有的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了。我看的《胡适文存》是在我父亲窗下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个时期跟我父亲借书看，后来兄妹闹翻了不来往，我父亲有一次顿倔地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我姑姑也有一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还有一本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德国出版的，她很喜欢那米色的袖珍本，说："他这套书倒是好。"她和我母亲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她看着笑了起来说："适之这样年轻！"

那天我跟炎樱去过以后，炎樱去打听了来，对我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深度阅读

《胡适年谱》，耿云志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年
《胡适评传》，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胡适文集》（1—12册），李敖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胡适语粹》，李敖编著，文汇出版公司，2000年
《胡适留学日记》，胡适著，岳麓书社，2000年
《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胡适的声音》，胡适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白话文学史》，胡适著，团结出版社，2006年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著，团结出版社，2006年



书和回忆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知识，并经常带我们到郊外检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

自然，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孩子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奇的兴趣，性格既幽默且开朗，行为标准认真而对人却极宽容大度，使我们这些在外面混生活的人先天得到一些方便。

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我很快地离开了正式的学校。以后的年月只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说我一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碰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少启发，“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他的意义我那时即使年轻也还是懂得的。他的修养本身就证明不会教人完全不理会中国书本。他曾经说过，“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何况中国书中除了为文的用处之外，还有影响人做坏事、落后的方面与教人通情达理做好事、培养智慧的方面。我还是读了不少翻译家们介绍过来的外国书。

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

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

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二十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做客，一进门，两口子[1]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成果。

一次和他俩夫妇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

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赌咒、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局总跟堂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如堕五里雾中。

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

我喜欢读杂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兴，也不怎么特别专心把它记下来，只是知道它在哪本书里就行。等到有朝一日真正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精读或派点用场。

我不习惯背诵，但有的句子却总是牢牢地跟着我走，用不着害怕跑掉的。比如说昆明大观楼的那对长联，尤其是那几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南翔缟素，北走蜿蜒”；还有什么李清照的“被翻红浪……”柳永描写霓红的句子……读得高兴，便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联想和看法，明知道这是很学究气的东西，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很为它吃了些苦头。

我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朋友，当人们夸奖他们的时候，我也沾了点愉快的光。

[1] 指钱钟书和杨绛，见黄永玉著《比我老的老头》（编者注）。

遇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谈近来读到的好文章和书，或就这个角度诙谐地论起人来。听别人说某个朋友小气，书也不肯借人等等；在我几十年的亲近，却反而觉得这朋友特别大方，肯借书给我。大概是我借人的书终究会还，而他觉得这朋友要人还书就是小气了罢！

还有个喜欢书、酒和聊天的朋友，他曾告诉我一个梦，说在梦中有人逼他还书，走投无路时他只好说：

“……那么，这样罢！我下次梦里一定还你。”

多少年来，我一直欣赏张岱在他失传了的《夜航船集》中幸存下来的序里的一段故事。说一艘夜航船载着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从岸上挤了进来，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道。老和尚问年轻秀才：

“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看是四个字吗？当然是两个人！”年轻秀才回答。

“那么，”老和尚又问：“孔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见是两个字么？怎么会是两个人？当然是一个人！”秀才回答。

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说：

“哎哟！这下子我可以松松腿了！”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年轻秀才那边去了。

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轻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

在鲁迅先生杂文集里，我很欣赏鲁迅先生与当时是青年作家的施蛰存先生之间的一场小小论战。大概是有关于“青年必读书”提到的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引起的吧！

鲁迅先生就是在那篇杂文中说起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的论点的。

施蛰存先生说，既然某某杂志征求的是如何做文章的问题，鲁迅先生

说“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可见，要为文终究还是要读中国书”。（大意）

我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

又是年轻的施蛰存先生，他抓住了鲁迅先生引用《颜氏家训》中叫儿子学外文好去服侍公卿的话是颜之推自己的意思时，鲁迅先生承认手边没现成的书而引用错了。

我也很佩服鲁迅先生治学的求实态度。因为他强大，所以放射着诚实的光芒。

十年动乱，“四人帮”绞尽脑汁想把知识分子斩尽杀绝，但知识分子大部分活过来了。那时候，孩子们到处搜寻书本，断页残篇也视如珍宝，读起书来吮吸有声，简直是悲壮之极。使我想到秦始皇这家伙毕竟是个蠢蛋！

知识，怎么格杀得了呢?

知识，原来就是发展着的生活的纪录。全人类的文化怎么格杀得了呢?

历史上著名的坏蛋，往往埋在自己挖的坑里，生活准则因此比语言准则更具有历史和心理学价值。

【大师简介】

黄永玉（1924—　），生于湖南常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先后任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顾问。1977—1991 在广州举办个人水墨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创作设计金猴邮票。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办个人画展。在意大利罗马举办个人画展。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伯豪森举办个人画展（巡回至波恩、斯图加特展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东方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在香港三联书店举办《永玉三记》画展。在香港三联书店举办《〈水浒〉人物画展》。在台北翰

墨轩举办《〈水浒〉人物画展》。1992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1995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1999年在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流光五十年》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黄永玉》等。

【往事与追忆】

趣记黄永玉

◎李韬

节选自1999年12月8日《中华读书报》

黄氏开场白

一次，黄老做客郑州越秀书院，与中原贤哲进行一场艺术对话。

头顶黑毡帽，身着灰西服，内衬花格小衬衣，嘴里衔个大大的烟斗，一副法国后现代主义绅士派头。先睹黄永玉的外表知其魅力独具，后听黄永玉的谈话知其空灵大方，其幽默源于大智慧，其大智慧又是凤凰（其湖南故乡）、北京、香港三地人文的“配方”。

黄永玉的开场白很特别，他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一见之下，雷从耳出。”别人口中的恭维话，在黄永玉口中却成了毕恭的谦辞。

黄氏逃学记

黄永玉言称，自己小时是出了名的“黄逃学”，以至于后来在同学聚会时，他一下子请来200多人，让人颇觉不可思议。黄永玉笑言：“我留过五次级，每次都有四五十个同学，这样下来不就有200多人了吗？”黄永玉逃学有其充分的“理由”——“学校放假了”。谁知有一次父亲竟跟他较起了

真儿，非让他陪着到学校看个究竟，结果可想而知。黄永玉本想着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谁知回到家后父亲竟拍着膝盖大笑道："你怎么老撒同样的谎呢！"说到此处，黄老大乐，所有的人也都乐不可支。

黄氏艺术观

黄永玉的画不中不西，自成一派，连他自己都说他是个打野食的人，胃口比较好，凡是好的东西他都能加以消化和吸收，但也有好多人说看不懂他的画，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人去问毕加索，"你的画我怎么看不懂呀？"毕加索问："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好听吗？""好听。""你懂吗？"道理就是这样，艺术的欣赏是有层次的，有的画是专画给内行人看的。

当谈起现代抽象画和现代音乐时，有朋友说它们乱七八糟、吵吵闹闹的，不知道要表现什么主题。黄永玉打了一个比方："你一定听过京戏锣鼓吧，那也是很乱、很吵，但人都懂；现代抽象画就是加了色彩的京戏锣鼓，现代音乐就是加了音节的京戏锣鼓。"

黄氏读书观

黄永玉仅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级中学教育，但他的杂文、散文却无不为人所称道。一个"半文盲"却有如此之高的文学造诣，或问：缘何？答曰：读书。黄永玉说："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如果说我没有堕落的话，就是因为我喜欢读书。"喜欢到何种程度，黄永玉有话："我在逃难期间，也不忘背上一捆书，日本鬼子在后面追，实在跑不动了，我就忍痛一本本地把书扔掉。"黄永玉说这话时露出很惋惜的表情。"与一个聪明的人谈话是幸运的。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聪明的人谈话，读一万本书就是和一万个聪明的人谈话，多划算呀。"当然，与一万个聪明的人谈话后，自己自然也会

聪明起来。

黄永玉也写剧本，但他却称自己不会演戏。"'报告司令员，前方又发现敌人'，就这么一句话，我一上台就忘词儿。"

黄永玉读书倡导"不求甚解"法，他说读书先是求乐，然后才是求知。

黄氏人生观

黄永玉说他现在正在写一部回忆录，写到四岁的时候，已经写了三十多万字，至于最终能写多长，他说自己也不知道。

在问起对人生观的看法时，黄永玉引用了表叔沈从文对自己的教导：一是摔倒了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二是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三是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如此三点对后辈亦大有裨益。

黄永玉一手写妙文章，一手画佳山水，这岂不是"鱼和熊掌"兼得了，说到这里，黄永玉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甲乙二信徒都酷爱吸烟，甲问神父："我祈祷时可以吸烟吗？"神父说："那怎么行？"乙问神父："我走路时想上帝、吃饭时想上帝、吸烟时想上帝，可不可以？"神父说："当然可以！"黄永玉就和那个乙信徒一样，衔着烟斗向我们走来了……

深度阅读

《永玉六记》，黄永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李辉著，大象出版社，2000年
《太阳下的风景》，黄永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这些忧郁的碎屑》，黄永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比我老的老头》，黄永玉著，作家出版社，2003年
《黄永玉的柒柒捌捌》，聂玫、石磊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黄永玉自述》，黄永玉著，大象出版社，2004年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黄永玉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
《一路唱回故乡》，黄永玉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



读书人的追求是觉醒

我这一生，读书、教书、编书和写书，处处离不开书，可以说和书结了不解之缘。但真要我谈一点读书的心得和体会，却又茫无头绪，不知从何谈起。

1929年，我七岁的时候，家中送我上小学，我就开始了读书的生涯。以后中学，大学，书读得更多了。大学毕业，分配到银行，暂时告别了书。两年之后，我想方设法，转移到了一家私立图书馆，又回到了书的身边。1951年，我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教学工作，自以为掉进了书的海洋，从此可以全心全意地读书了。但哪里知道，不断的运动，不断的上山下乡，书反而变成了普罗米修斯的苹果，可望而不可即。“文革”十年，人都难保，遑论读书？但天性难改，只要有机会读书，我还是不忘读书。三中全会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读书了。但岁月不饶人，我已垂垂老矣。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还有一个可以读书的晚年！

为什么我要那么念念不忘读书？读书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读书，当然可以给人带来好处，但我读书却没有想到有任何好处。现实生活中的好处，是与读书无缘的。我之所以喜欢读书，正像我喜欢游山玩水一样，只是我的一种爱好，一种乐趣。我这个人，不善言谈，不善交际，不善孙武的谋

略，不善陶朱的贸易，我躲进书和山水里面，只求自得和自乐！

但不管怎样，我读过很多书。有的泛泛而读，翻翻就算了；有的读了又读，引起深思。有的读了，收益很大，不仅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而且精神境界和思想面貌，也有所提高；有的则不然，读了毫无收获，只觉白白浪费了时间。其间的错综复杂，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难尽。这里，我不想多谈，只想谈一点个人读书的失误和教训，以便对后来的年轻读者，起一点鉴戒的作用。

首先，读书应当从兴趣出发？还是从需要出发？大学时，我读的是经济系。一年级时，我还认真听课，但到了二年级，我实在听不下，乃常常跑到图书馆，听凭我的兴趣，阅读有关文史哲方面的书籍。这样做，对不对呢？我说，有它对的地方，也有它不对的地方。说它对，是因为人无全才，各有所偏。根据兴趣去学习，最容易发挥一个人的长处，事半功倍。同时，兴趣所在，真情亦在。我读书，不是为了赶任务，而是我喜欢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来到我心里，学习本身成了一种乐趣。正因为这样，所以能够不期然而然地有所启发，不期然而然地会有一些思想的火花。这些启发和火花，可能都是极其肤浅的，甚至是虚假的，但它们却是发自内心，给年轻的心灵带来了欢乐和安慰，以至常常乐不可支。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是尝到了这一“乐之者”的味道的。再者，兴趣还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力量。在人生学习的道路上，免不了挫折和困难。面对这些挫折和困难，我仍然能够坚持下来，我相信是与我所感受到的兴趣分不开的。一个人对一件事有了兴趣，他会雷打都不动，他会钻进去，沉浸在里面，他所关心的，不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学问的本身。他读书，他追求，也不是想以之作为个人的桂冠或战利品，用来夸耀或装饰自己。他只要想竭尽自己的全力，为阐述真理做出自己的一点点贡献。许多科学上或学术上的献身精神，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从兴趣出发来读书，未始没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天下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读书也是如此。读书是一种学

习，学习的目的是增益其所不能，使不知道的东西变成知道的东西，使不懂的东西变成懂的东西。这样，问题就不会在于有兴趣或没有兴趣了。有兴趣的东西，我们要学；没有兴趣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也就是说，我们要全面地、系统地学，要按部就班地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好我们所要学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学，我们就容易单打一，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地方，结果，不仅不系统，不全面，而且常常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读初中时，开始对平面几何感兴趣，我就自学平面几何；对三角不感兴趣，就放弃三角。哪知学习是相辅相成的，我不懂三角，也就影响了我进一步学习几何，以至两败俱伤，都没有学好。因此，学习不能只凭个人的兴趣，它还要看需要而定，需要不是某个人主观的爱好，它是由客观的条件决定的。需要带有强迫性。每个人为了某种需要，都得强迫自己，学好某一门课，读好某一种书。不仅这样，而且还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取得一定的成绩。等到攻关的时候，需要更是成了无上的命令：为了求得某一种证据，取得某一种论证，不管我们有没有兴趣，我们都得呕心沥血，拼命上！因此，读书不能只强调兴趣，有时需要更为重要。兴趣要服从需要，兴趣要化成需要。最高的学术境界，应当是需要与兴趣的结合。可惜我年轻时，体会不到这一点，过多地强调兴趣。

其次，我想谈一下读“死”书与读“活”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也得两点论，而不能一点论。那就是说，应当读“死”书的地方读“死”书，应当读“活”书的地方读“活”书。书就是书，无所谓死活。你读它的时候，能够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把书上印的黑字读成生动的思想和感情，这时，书就活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灵思妙悟，等等，都是读“活”书的好处。许多科学家的创造发明，许多文人学士的锦心绣口，都是读“活”书的光辉例证。因此，我们应当读活书。至于古人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更说明了我们不能死死地迷信书，我们要掌握读书的主动权。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他还没有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还不具备基本的知识

和理论，他所要求的，应当是准确无误的知识，明确可靠的理论。也就是说，对于尚在打基础阶段的青年学子来说，读“死”书比读“活”书更为重要。

谈到读“死”书，我们不要为“死”字所吓倒。读“死”书，其实就是要认真地读书，照着书本去读书，书上怎么讲，我们就跟着怎么读。先求准，后求懂。由于书是由文字构成的，汉字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读“死”书，就是要抓住书中的形、音、义，把形认准，把音读准，把义理解准，然而，准确无误地把书中的话记准、背准、用准。“准”字当头，处处讲“准”，这就是读死书的要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不懂装懂。我在当学生时，读书贪快，常常不求甚解，就囫囵吞枣式地吞下去，自以为懂了，其实不仅没有懂，而且犯了大错误。这在读外语时，尤其明显。例如英语busy一词，应当读成bizi，但我自作聪明。想当然地把bi音读成bju音。结果一音之差，谬以千里。从这里，我深深感到读“死”书的重要性！对于初学者来说，与其去赶读“活”书的时髦，求一时的灵悟，不如老老实实地读“死”书，把基本的功夫学得扎扎实实的，更为可取。对于已有成就的饱学之士来说，各人有各人的读书方法和态度，毋庸我来多说。但是，我认为求实的考据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第三，关于记笔记，我也想讲几句话。人和动物都有记忆，但人和动物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动物像熊瞎子掰玉米一样，掰一个扔一个，积累不起来。人则不仅有记忆，而且能够积累。他们积累物质的财富，也积累精神的财富，书就是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我们读书，光凭记忆不行，不仅记忆不了那么多，而且记不准确。为了准确地把我们读过的书积累起来，保存起来，我们就得记笔记。古今学者，不记笔记的，可说难得其人。但我年轻时，却自恃记忆力比较好，不肯认真记笔记，结果贻误和遗憾都无穷！后来，我到海光图书馆工作，看到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笔记记得那样认真，仔细，严肃，我深受感动和启发，于是我开始记笔记。但不久，运动

开始，无暇读书，也就无暇记笔记了。

在我记笔记的时候，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资料性的，专记文物考据，历史事实，以及书中所引到的例证和故事；另一种，则是思考性的，记录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启发，引起的感受和随时想到的议论。这两种笔记对我的学习，都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和帮助。有些事实，当时只要随便记记，并不指望以后会有什么用处。但意想不到的，是它们后来竟然起了大的作用。例如1986年6月27日，我看《新民晚报》，偶然看到一条消息，说两个意大利人，到非洲原始部落去旅游，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妇女“美容术”。我出于好奇，把这条消息记下来了。哪里知道，数年以后，我写《美学新论》，写到《美感的诞生》时，我会用上了这条笔记。

最后，我想再谈一点读书人形象的塑造问题，也就是说，读了书，要成为什么样的读书人？天下书多得很，读书人也多得很，要成为什么样的读书人，这取决于各人自己。《儿女英雄传》中的安公子，一心只读圣贤书，满脑子的仕途经济，他所塑造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形象。反过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他愈读书愈厌恶这些“国贼禄蠹”，终于看破红尘，一走了之，成了他那个社会的“多余人”的形象。至于《儒林外史》，描写了各种各样的读书人，塑造了各种各样读书人的形象：有周进、范进那样热衷科举的书呆子，有庄绍光那样埋头学问的大学者，有杜少卿那样敝屣功名、逍遥自在的风流文士，还有牛浦郎、匡超人那样见利忘义的投机小人，等等。那么，在这些人当中，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样的读书人呢？人各有志，很难得出统一的结论。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它所需要的读书人，也不能同于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我们不想得出现成的答案，我们只是说，在今天科学文化昌明的时代，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能读书，都能成为读书人。既然都是读书人，那么，首先就得都要读书。一个读书人而不读书，或者说，没有书卷气，那算什么读书人？不仅这样，读书人还得通过读书、讲书和写书，来影响人，来传布思想。读书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读书，写文章，传布思

想。写到这里，有人怒叫而起，说："读几本书，写几篇文章，算什么东西？"这话对不尊重知识和文化的人来说，是对的；但一个有文化的人如果这样说，他就忘了：要是人类不能读几本书，不能写几篇文章，那人和猴子又还有什么差别？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能有文化和文明，人之所以有今天的进步、发达和开放，不就因为人能读几本书，能写几篇文章吗？由于人类能够读几本书，能够写几篇文章，所以他能够超越于现实世界，超越于自己，并对现实世界和自己进行反省和反思。在反省和反思的过程中，他明白了事物发生的原因和规律，明白了事物的必然性。他明白了事物的道理，他有所觉醒。读书人所要塑造的形象，应当就是这种明白了道理和觉醒了的形象。

明白道理，是对客观世界、对事而言；觉醒则是对自己、对人生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而言。觉醒了，我们会发现：人都是人，人天生是平等的，因而应当平等待人，而不应当势利待人。有的人，太势利了。记得果戈理写过一位局长大人，生就一副势利眼，对人的态度全凭等级地位。比他官高一等，他鞠躬低一级；高二等，他鞠躬低二级；高三等，他简直爬在地下，直不起身。反过来，如果见了级别比他低的人，他会根据低的等次，把自己高傲的头一级一级地昂起来，以至到不能再昂的地步。这样的人，把心思全部用在等级的较量上，未免太渺小了，也太无聊了。一个读书人，读了大量的书，阅尽了人间的沧桑和不幸，其结果只是挣来一个会摆等级的势利眼，那真是太可悲、太可怜了。人生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也未免太卑微了。一个读书人，应当从这种卑微和渺小的境界中走出来，从而懂得应当平等待人。既然平等待人，就不应当把人分成等级，也不应当崇拜英雄。过去的历史，充满了英雄。这些英雄，有的是好的，他们除暴安良，打抱不平。但有的就不那么好了，他们不仅以英雄自居，而且惹是生非，把自己英雄的"业绩"建立在他人的痛苦和牺牲上。今天，是人民的时代，读书人不应当再以英雄自居，而应当回到人民当中，与人民平等地生活，平等地工作，与人民鞠躬

尽瘁，为人民普度众生。今天读书人的形象，应当就是人民的形象。

我读了一辈子书，而且至老不倦。年过七十，仍然在读书。我没有在书中找到“黄金屋”、“颜如玉”，也没有找到“英雄”的宝座，但是，我却找到了真理：一个人，读了书，应当明白道理，应当平等待人，应当有所觉醒。读书人所追求的，就是“觉醒”！

【大师简介】

蒋孔阳（1923—1999），四川万县人。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1946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1951年以后一直在复旦大学工作，曾任中文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美学研究会会长。

【往事与追忆】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郜元宝

节选自郜元宝著《怀念蒋孔阳先生》，标题为编者所加。

不知怎么说起正在读唐诗，先生非常高兴，一边讲他自己的唐诗研究，一边大肆背诵起杜甫、李白、李商隐来，明显要和我比赛记忆力。一首首背诵下来，我的库存很快见底。先生沉浸在胜利者的喜悦中，我趁机提议由他请客，一边吃中午饭一边开始宋词方面的记忆清点。先生说好啊，今天濮先生不在家，你就帮我买点熟食和啤酒，我们继续背诵如何？

先生从第九宿舍一路走到我所在的第一宿舍，额上汗涔涔的。他在堆得乱七八糟的餐桌旁坐下，把我小女儿叫到跟前，考问她叫什么名字。小孩

子不肯回答，却反问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来我们家？”先生乐了，说你看，还是小孩子有哲学头脑，一开口就向你提出这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做学问的做着做着，往往倒把这些根本性问题忘得干干净净了。

先生对自己不多的散文，并非一概轻视。有篇回忆母亲的文章，就常常提到。我也跟他谈起自己的母亲，受苦一辈子，到死无怨言；总认为后辈的生活会好起来，而她自己也就有了希望；一字不识，却特别理解人，体贴人。我问先生，这应该说是中国妇女的美德呢，还是一味的隐忍？先生说，恐怕我们都没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人只要心中时时记着善良慈爱的母亲，就不会成为一个坏人；坏人之所以变坏，多半因为他们不幸没有一个值得终身纪念的好母亲，要么就是看不到天下母亲的善良与慈爱。

先生突然问我：小郜，拿鲁迅和钱钟书相比，你觉得应该怎么说才好？我知道他已经有说法了，笑而不答。于是他说：鲁迅是把人生当学问，钱钟书是把学问当人生。

谈到冯雪峰，先生说，这人很聪明，他如果搞美学，我们都要失业。

先生给我一些钱，说你帮我把翻译过来的海德格尔的书尽量买来，我们一起读，等你开始写毕业论文，就可以跟你讨论了。“先生，海德格尔的书怎么样？”我问。先生说：“不好懂啊。但我不相信真的读不懂。年纪大了，脑筋转不过来。要是年轻，会狠狠下一番工夫的。”他认真地看着窗外，做什么长远打算似的。

先生有一回说，他在读书方面，也像王国维那样经历了三种境界。年轻时拿到一本书，读到会意处，这里画一道，那里画一道，结果把整本书都画遍了；中年以后，道道越画越少，因为觉得许多地方只是高潮之前的过渡，精彩之笔的铺垫，不必那么经心；到了老年，几乎不再画道道了，一方面因为比较从容，好像与作者平静地对话，并不急于抓住对方一两句要紧的话；另一方面则是认为，一本书并不能绝对分出要紧不要紧，你认为平凡的一句

话，作者写来都是很要紧的！说到这里，先生又笑着补充道：你知道吗，我现在不在书上乱画，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我终于超越了寻章摘句的实用主义。我不想写文章了，也就用不着从别人书中特别标出自以为日后可以引用的句段了。先生这样说着，目光中充满了一种因为超脱而来的优越感。

【深度阅读】

《文学的基本知识》，蒋孔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论文学艺术的特征》，蒋孔阳著，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德国古典美学》，蒋孔阳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蒋孔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蒋孔阳全集》（1—4册），蒋孔阳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真与美：蒋孔阳美学随笔》，蒋孔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学新论》，蒋孔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读书

对于书籍的读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读“书”，一是读“人”。正像教书也可以分成教“书”和教“学”一样。读“书”是以我为主，我寻材料供我用，和查考辞书类书的目的一样；所以读的书，也无所谓好坏，凡可以供我利用的都要读。这正是写卡片抄材料的记问之学，学得好时，便是淹博。读“人”却不然：读一人的著作，想见其为人，于是尊之为师，敬之如友，研其思想，学其品行，择善而从，不善则改，所注意的是见解，所学习的是做人，不嫌狭隘，但求贯通。这样读书，结果也许只精读一部全集，但确可以受用终身。读“书”能博足以炫人，所失在浅；读“人”而精足以立己，所弊在陋。此外的读书，若不是当课本学技术，就只能算是消遣而已。

“学以致用”是句老话，“不要读死书”是句新话；但从学问的本身说来，无所谓有用无用；而从学的人这方面说来，只要真学就真有用，就是说，至少所学直接对己间接对人都有影响；所以如果不把“用”的范围定得太褊狭，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该事先注意这学习所应有的结果。这样便不能生吞活剥地读书，给人家当收音机；学的经过也就应当大致分作：学—思—行；打个比方说：吸收—消化—营养。

抽象地论读什么书，似乎无益，其实也很有帮助。读专书，专读书，都已近于老生常谈了，实际上奉行的人还是很少。读书人大半还是喜欢东抄

西撮杂凑起来的书，只求便捷，不怕肤浅，又喜欢广博而不肯专精；这都是不能牢记着上两条原则的结果。还有一条原则也很重要，便是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我们往往翻开一本书后，一看句句都是自己心中要说的话，于是非常痛快，佩服，很高兴地看下去，以为这是正对自己胃口的好书。结果却往往是一无所得，即有进步也很少；因为书中意见，自己既在读书之前便有，那么读了之后，自然也不过是更坚信或更丰富而已。唯有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可以使自己瞿然一惊，然后以敌人的态度去观察这本书的意见。结果若是自己被人折服，自然是自己原有的见解不对，从此便更进一步；若自己攻破了书中的理论，也就是自己受到了一次论敌的冲锋，无形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正合吾意”的书愈多读，愈无进步，愈容易流入褊狭；远不如多读几部不合吾意的书。但这样读书也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要能批判地读书，有自己存在，不为书所囿；第二是有所为而读书，不要视同看看小说之类的消遣。

九方皋读书

想起了九方皋，把他的“相马”和读书联系起来了。

伯乐如今名声大振，说是他会“相马”，也就是会发现和推荐人才。到底他是会“相马”，还是会“相人”？

伯乐以善于“相马”名垂千古。但他的著名故事却是推荐了九方皋。找到千里马的不是伯乐而是九方皋。这位九方皋的大才是伯乐以外谁也认不出来的。好像徐悲鸿还画过一幅九方皋相马图，传达出他站在马群之前的神情

气概。

故事出于《列子》。说的是秦穆公立志要秦国富强而招揽人才。他请来伯乐，要他去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了九方皋。找了三个月，九方皋回来报告，找到了一匹千里马，说是黄色的母马。马到了，原来是一匹黑色的公马。大家都笑九方皋不认识马的颜色和性别。可是一试之下，果然是千里马。于是千古流传了“相马于牝牡骊黄之外”这句名言。这话是伯乐对九方皋的解释的称赞。他还说，九方皋“相马”是“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列子》的这个故事用秦穆公、伯乐、九方皋三个人物表达出发现人才的一条秘诀。不过并不是人人都能赞同这一条的。

懂得这妙诀而实行的是曹操。他的求贤是不论出身和行为，只问有没有能称职的才干，只管效用，不看包装。再推上去，刘邦、萧何敢用小兵韩信当大将也是依据这一条妙诀。不问他是否“出人胯下”，只问他能不能带兵打胜仗。要办什么事就得找能办好这件事的人。这人的其他一切都不必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哪有那么多的全才？这就是“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九方皋的妙诀就是：不问是黄马是黑马，不问是公马是母马，只要能日行千里，那就是千里马。若是只看包装，追查血统历史，全面挑剔，那就没有千里马了。

这与读书何干？该书也这样。“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才有效率。效率包含了速度。一本书里可以有无数内容，有各种层次的思想，那就只能取我所需，见我所见，择其一端，不及其余。为什么“好书不厌百回读”？就是因为读书一遍见到一些，再读又见到上次没见到的，读来读去甚至读出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事先想到的。有的书如同工具，是当做资料查考引证的，或者是为专门研究必须全面读的，但那样读书就成为工作了。

书有不同的种类层次，应当有不同的读法。这就是九方皋的相马法和伯乐的相人法用于读书。一本书，作为对别人有无教育意义的书和作为对我是否有用的书是不同的。若随包装判断，那就不是读书而是读包装了，好比买

东西只看广告不看货物了。

看小说、电影、戏剧一直到看足球难道不是同样？为什么马拉多纳离开球场引起球迷惋惜？因为迷的是踢球，不是别的。

九方皋的故事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可是我若换个荒诞包装，只怕看到的人要说这是什么文，像谜语一样了。读书不管包装很难，所以九方皋人才难得。不过也难说我这篇小文不像另一种谜语。读书是不是也可以有猜谜之乐，好像自己当一回侦探？

书读完了

有人记下一条逸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

中国古书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谁敢夸这海口？是说胡话还是打哑谜？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好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层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下棋也是猜心思，打仗也是破谜语和出谜语。平地盖房子，高山挖矿井，远

洋航行，登天观测，难道不都是有一股子猜谜、破案的劲头？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怎么能说全是出于任务观点、雇佣观点、利害观点？人老了，动弹不得，也记不住新事，不能再猜“宇宙之谜”了，自然而然就会总结自己一生，也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一生这个谜面的谜底是什么。一个读书人，比如上述的两位史学家，老了会想想自己读过的书，不由自主地会贯穿起来，也许会后悔当年不早知道怎样读，也许会高兴究竟明白了这些书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倒相信那条逸事是真的。我很想破一破这个谜，可惜没本领，读过的书太少。

据说20世纪的科学已不满足于发现事实和分类整理了，总要找寻规律。因为总向理论方面迈进。爱因斯坦在1905年和1915年放了第一炮，相对论。于是科学，无论其研究对象是自然还是社会，就向哲学靠拢了。哲学也在20世纪重视认识论，考察认识工具，即思维的逻辑和语言，而逻辑和数学又是拆不开的，于是哲学也向科学靠拢了。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关于语言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大大发展，牵涉到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索绪尔在1906年到1911年的讲稿中放了第一炮。于是本世纪的前八十年间，科学、哲学、语言学“搅混”到一起，无论以自然或人类社会都仿佛“条条大路通罗马”，共同去探索规律，也就是破谜。大至无限的宇宙，小至基本粒子，全至整个人类社会，分至个人语言心理，越来越是对不能直接用感官觉察到的对象进行探索了。现在还有十几年便到本世纪尽头，看来越分越细和越来越综合的倾向殊途同归，微观宏观相结合，21世纪学术思想的桅尖似乎已经在望了。

本文开始说的那两位老学者为什么说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是读得完的呢？显然他们是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说必备的知识基础。举例说，只读过《红楼梦》本书可以说是知道一点《红

楼梦》，若只读“红学”著作，不论如何博大精深，说来头头是道，却没有读过《红楼梦》本书，那只能算是知道别人讲的《红楼梦》。读《红楼梦》也不能只读“脂批”，不看本文。所以《红楼梦》就是一切有关它的书的基础。

如果这种看法还有点道理，我们就可以依此类推。举例说，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有《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知识，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都依傍它的。这是西方无论欧美的小孩子和大人在不到一百年以前人人都读过的。没有《圣经》的知识几乎可以说是无法读懂西方公元以后的书，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书，只有一些纯粹科学技术的书可以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与《圣经》无关，但也只有在《圣经》的对照之下才较易明白。许多古书都是在有了《圣经》以后才整理出来的。因此，《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基础书是必读书。对于西亚，第一重要的是《古兰经》。没有《古兰经》的知识就无法透彻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又例如读西方哲学书，少不了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不是要读全集，但必须读一点。有这些知识而不知其他，还可以说是知道一点西方哲学；若看了一大堆有关的书而没有读过这些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学了西方哲学，事实上也读不明白别人的哲学书，无非是道听途说，隔靴搔痒。又比如说西方文学茫无边际，但作为现代人，有几个西方文学家的书是不能不读一点的，那就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再加上一部《堂·吉诃德》。这些都是常识了，不学文学也不能不知道。文学作品是无可代替的，非读原书不可，译本也行，决不能满足于故事提要和评论。

若照这样来看中国古书，那就有头绪了。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替代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氏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

《老子》、《庄子》。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19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这不是提倡复古、读经。为了扫荡封建残余非反对读经不可，但为了理解封建文化又非读经不可。如果一点不知道“经”是什么，没有见过面，又怎么能理解透鲁迅那么反对读经呢？所谓“读经”是指“死灌”、“禁锢”、“神化”；照那样，不论读什么书都会变成“读经”的。有分析批判地读书，那是可以化有害为有益的，不至于囫囵吞枣、人云亦云的。

以上是算总账，再下去，分类区别就比较容易了。举例来说，读史书，可先后齐读，最少要读《史记》、《资治通鉴》，加上《续资治通鉴》（毕沅等的）、《文献通考》。读文学书总要先读第一部总集《文选》。如不大略读读《文选》，就不知道唐以前文学从屈原《离骚》起是怎么回事，也就看不出以后的发展。

这些书，除《易》、《老》和外国哲学书以外，大半是十来岁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过去。我国古人并不喜欢“抽象思维”，说的道理常很切实，用语也往往有风趣，稍加注解即可阅读原文。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从前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读的。主要还是要引起兴趣。孩子有他们的理解方式，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别是不能抠字句，讲道理。大人难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懂”。孩子时期稍用一点时间照这样“程序”得到“输入”以后，长大了就可腾出时间专攻“四化”，这一“存储”会作为潜在力量发挥作用。错过时机，成了大人，记忆力减弱，理解力不同，而且“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再想补课，读这类基础书，就难得多了。

以上举例的这些中外古书分量并不大。外国人的书不必读全集，也读不了，哪些是其主要著作是有定论的。哲学书难易不同；康德、黑格尔的书

较难，主要是不懂他们论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他们的数学式分析推理和表达方式。那就留在后面，选读一点原书。中国的也不必每人每书全读，例如《礼记》中有些篇，《史记》的《表》和《书》，《文献通考》中的资料，就不是供“读”的，可以“溜”览过去。这样算来，把这些书通看一遍，花不了多少时间，不用“皓首”即可“穷经”。依此类推，若想知道某一国的书本文化，例如印度、日本，也可以先读其本国人历来幼年受教育时的必读书，却不一定要用学校中为考试用的课本。孩子们和青少年看得快，“正课”别压得太重，考试莫逼得太紧，给点“业余”时间，让他们照这样多少了解一点中外一百年前的书本文化的大意并非难事。有这些做基础，和历史、哲学史、文学史之类的“简编”配合起来，就不是“空谈无根”，心中无把握了，也可以说是学到诸葛亮的“观其大略”的“法门”了。花费比“三冬”多一点的时间，就一般人而言大约是“文史足用”了。没有史和概论是不能入门的，但光有史和概论而未见原书，那好像是见蓝图而不见房子或看照片甚至漫画去想象本人了。本文开头说的那两位老前辈说的“书读完了”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说，“本人”都认识了，其他不过是肖像画而已，多看少看无关大体了。用现在话说就是，主要的信息已有了，其他是重复再加一点，每部书的信息量不多了。若用这种看法，连《资治通鉴》除了“臣光曰”以外也是“东抄西抄”了。无怪乎说中国书不多了。全信息量的是不多。若为找资料，作研究，或为了消遣时光，增长知识，书是看不完的；若为了寻求基础文化知识，有创见能独立的旧书就不多了。单纯资料性的可以送进计算机去不必自己记忆了。不过计算机还不能消化《老子》，那就得自己读。这样的书越少越好。封建社会用“过去”进行教育，资本主义用“现在”，社会主义最有前途，应当是着重用“未来”进行教育，那么就更应当设法早些在少年时结束对过去的温习了。

一个大问题是，这类浓缩维他命丸或和“太空食品”一样的书怎么消化？这些书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质量极高，又像堡垒，很难攻进去，也

难得密码本。古时无论中外都是小时候背诵，背《五经》，背《圣经》，十来岁就背完了，例如《红与黑》中的于连。现在怎么能办到呢？看样子没有“二道贩子”不行。不要先单学语言，书本身就是语言课本。古人写诗文也同说话一样是让人懂的。读书要形式内容一网打起来，一把抓。这类书需要有个“一揽子”读法。要“不求甚解”，又要“探骊得珠”，就是要讲效率，不浪费时间。好比吃中药，有效成分不多，需要有“药引子”。参观要有“指南”。入门向导和讲解员不能代替参观者自己看，但可以告诉他们怎么看和一眼看不出来的东西。我以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发生兴趣的入门讲话，加上原书的编、选、注。原书要标点，点不断的存疑，别硬断或去考证；不要句句译成白话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处处都懂，那是办不到的，章太炎、王国维都自己说有一部分不懂；有问题更好，能启发读者，不必忙下结论。这种入门讲解不是讲义、教科书，对考试得文凭毫无帮助，但对于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大概是不无小补的。这是给大学生和研究生作的前期准备，节省后来补常识的精力，也是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放眼观世界今日文化全局的一点补剂。我很希望有学者继朱自清、叶圣陶先生以《经典常谈》介绍古典文学之后，不惜挥动如椽大笔，撰写万言小文，为青少年着想，讲一讲古文和古书以及外国文和外国书的读法，立个指路牌。这不是《经典常谈》的现代化，而是引导直接读原书，了解其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打下文化知识基础。若不读原书，无直接印象，虽有“常谈”，听过了，看过了，考过了，随即就会忘的。“时不我与”，不要等到21世纪再补课了。那时只怕青年不要读这些书，读书法也不同，更来不及了。

谈读书和“格式塔”

现在人读书有个问题：书越来越多，到底该怎么读？

汉朝人东方朔吹嘘他“三冬，文史足用”。唐朝人杜甫自说“读书破万卷”。宋朝以后的人就不大敢吹大气了。因为印刷术普及，印书多，再加上手抄书，谁也不敢说书读全了。于是只好加以限制，分出“正经书”和“闲书”，“正经书”中又限制为经、史，甚至只有“九经、三史”要读，其他书可多可少了。

现在我们的读书负担更不得了。不但要读中国书，还要读外国书，还有杂志，报纸，即使请电子计算机代劳，我们只按终端电钮望望荧光屏，恐怕也不行。一本一本读也不行，不一本一本读也不行。总而言之是读不过来。光读基本书也不行；数量少了，质量高了，又难懂，读不快，而且只是打基础不行，还得盖楼房。怎么办？不说现代书，就说中国古书吧，等古籍整理出来不知何年何月，印出来的只怕会越多而不是越少，因为许多珍贵古籍和抄本都会印出来。而且古书要加上标点注释和序跋之类，原来很薄的一本书会变成一本厚书。古书整体并没有死亡，现在还在生长。好像数量有限度，其实不然。《易经》、《老子》从汉墓里挖出了不同本子。《红楼梦》从外国弄回来又一个抄本。难保不再出现殷墟、敦煌、吐鲁番之类。少数民族有许多古书还原封未动，或口头流传。古书像出土文物，有增有减，现在是增的多减的少。也许理科的情况好些，不必再去读欧几里得、哥白尼、牛顿的原著了，都已经现代化进了新书里了；可是新书却多得惊人，只怕比文科的还生长得快。其实无论文理法工农医哪一行，读书都会觉得忙不过来吧？何况各学科的分解、交叉、渗透越来越不可捉摸，书也跟着生长。只管自己一个研究题目，其他书全不看，当然也可以，不过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中的人若总是好像“套中人”，不无遗憾吧？

现在该怎么读书？这个问题只怕还没到有方案要做可行性审议的时候。不过看来对这问题感到迫切的是成年人或者中年人。儿童和青少年自己未必有此感觉。他们读书还多半靠别人引导。一到成年，便算进了大学吧，开始有人会感觉到了，也未必都那么迫切。有幸进大学的人多半还忙于应付考试，其他人也忙于为各种目的而自学或就业，无暇也无心多读书。老年人还有那么大的好奇心和读书兴趣的怕不太多。读书能力，至少是目力和记忆力，到老年也会大不如前了。所以书读不过来的问题只怕主要是从二十几岁到五六十岁以知识为职业的人的烦恼。实际上，范围恐怕还要小。从事某一专题研究的人未必都有此感觉。读书无兴趣的人也未必着急要读书。所以真正说来，这问题只是少数敏感的大约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人感到迫切。对这些人讲读基本典籍当然对不上口径。这也许是有人想提倡读基本书而未得到响应的原因之一吧？书卖得多的未必读的人多，手不释卷的人也许手中是武侠和侦探小说或者试题答案，嚷没工夫读书的人说不定并不是急于读书，所以不见得需要讲什么读书方法和经验，不过闲谈几句读书似也无妨。

照我的想法，同是读书人，读同类的书，只讲数量，十八岁的不会比八十岁的读得多。这不成问题，所以刚上大学不必为不如老教授读书多而着急。应当问的是：自己究竟超过了那位八十岁的老人在十八岁时的情况没有？若是超过了或大致相等，就可放心；若是还不如，那就该着急了。不会件件不如，应当分析比较一下，再决定怎么办。读书还不能只比数量，还得比质量，读的什么书，读到了什么。我想，教书的人，特别是教大学的人，应当要求十八岁的学生超过十八岁的自己，不应当要求学生比上现在的自己。我教过小学、中学、大学，每次总觉得学生有的地方比我强。这自然是我本来不行之故，却也可供参考。我自己觉得有不如学生之处，也有胜过学生之处，要教的是后者，不是前者。也许这就是我多次教书都尚未被学生赶走之故吧？甚至还有两三次在讲完课后学生忽然鼓掌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其实那课上讲的并不是我有什么独到之处。由此我向学生学到了一点，读书可

以把书当做教师，只要取其所长。不要责其所短。当然有十几年的情况要除外。正如有些书要除外一样。

话说回来，二三十岁的人如果想读自己研究以外的书，如何在书海之中航行呢？我的航行是迷了路的，不能充当罗盘。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诀窍。假如必须说点什么，也许只好说，我觉得最好学会给书“看相”，最好还能兼有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的本领。这当然都是说的老话，不是指现在的情况。我很佩服这三种人的本领，深感当初若能学到旧社会中这三种人的本领，读起书来可能效率高一点。其实这三样也只是一种本领，用古话说就是“望气术”。古人常说“夜观天象”，或者说望见什么地方有什么“剑气”，什么人有什么“才气”之类，虽说是迷信，但也有个道理，就是一望而见其整体，发现整体的特点。用外国话说，也许可以算是1890年奥国哲学家艾伦费尔斯（Ehrenrels）首先提出来，后来又为一些心理学家所接受并发展的“格式塔”（Gestalt）吧？20世纪有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探讨这个望其整体的问题，不过不是都用这个术语。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世纪末，各门学术，又是分析，又是综合，又是推理，又是实验，现在仿佛有点殊途同归，而且越来越科学化、效率化、哲学化了。这和技术发展是同步前进的。说不定到21世纪会像19世纪那样出现新局面，使人类的眼光更远大而深刻，从而恢复自信，减少文化自杀和自寻毁灭。

从前“看相”的人常说人有一种“格局”。这和看“风水”类似。王充《论衡》有《骨相》篇，可见很古就有。这些迷信说法和人类学、地理学正像炼丹术和化学，占星术和天文学一样，有巫术和科学的根本区别，却又不是毫无联系，一无是处。不论是人还是地，确实有一种“格局”（王充说的“骨法”）或说是结构、模式，不过从前人由此猜测吉凶祸福是方向错了，结论不对。但不必因此否认人和物自有“格局”。

从前在图书馆工作的人没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甚至书目还是书本式，没有变成一张张分立的卡片。书是放在架上，一眼望去可以看见很多书。因

此不大不小的图书馆中的人能像藏书家那样会“望气”，一见纸墨、版型、字体便知版本新旧。不但能望出书的形式，还能望出书的性质，一直能望到书的价值高低。这在从前是熟能生巧之故。不过有些人注意了，可以练得出一点这种本事，有些人对书不想多了解，就不练这种本事。编书目的，看守书库查找书的，管借书、还书的。都可能自己学得到，却不是每人都必然学得到。对书和对人有点相似，有人会认人，有人不会。书也有点像字画。

从前报馆里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没有这么多栏目互相隔绝，也没有这么多人合管一个版面，更没有电子计算机之类现代工具。那时的编辑“管得宽”，又要抢时间，要和别的报纸竞争，所以到夜半，发稿截止时间将到而大量新闻稿件正在蜂拥而来之时，真是紧张万分。必须迅速判断而且要胸有全局。一版或一栏（评论、专论）或一方面（副刊、专栏）或整个报纸（总编辑负责全部要看大样），都不能事先印出、传来传去、集体讨论、请示、批准，而要抢时间，要自己动手。不大不小的报纸的编辑和记者，除社外特约的以外，都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其他，既要记住以前，又要想到以后，还要了解别家报纸，更要时时注意辨识社会和本报的风向。这些都有时间系数，很难得从容考虑仔细推敲的工夫，不能慢慢熬时间，当学徒。这和饭碗有关，不能掉以轻心。许多人由此练出了所谓“新闻眼”、“新闻嗅觉”、“编辑头脑”。当校对也很不容易，要学会一眼望去错别字仿佛自己跳出来。慢了，排字工人不耐烦；错了，编辑会给脸色看。工资不多，地位不高，责任很重。非有本领不可。

以上说的都是旧社会的事。“看相”早已消灭了，图书馆和报馆也不是手工业式了，人的能力很多都让给机器了。可是读书多半还是手工业式，集体朗诵也得各人自己听，自己领会，所以上面说的“望气”本领至少现在对于读书大概还有点用处。若能“望气”而知书的“格局”，会看书的“相”，又能见书即知在哪一类中、哪一架格上，还具有一望而能迅速判断其“新闻价值”的能力，那就可以有“略览群书”的本领，因而也就可以

“博览群书”，不必一字一句读下去，看到后头忘了前头，看完了对全书茫然不知要点，那样花费时间了。据说诸葛亮读书是“但观大略”，不知是不是这样。这也不见得稀奇，注意比较，注意“格局”，就可能做到。当然搜集资料、钻研经典、应付考试都不能这样。

其实以上说的这种“格式塔”知觉在婴儿时期就开始了。辨别妈妈和爸爸的不同不是靠分析、综合、推理而来，也不是单纯条件反射。人人都有这种本领。不过很少人注意自己去锻炼并发展。科学家对此的解说还远未完成，所以好像有点神秘，实际上平常得很。可惜现在图书馆不让人人进书库，书店不让人人走到书架前自己翻阅，书摊子只卖报纸杂志通俗书，报馆不让人人去实习，而且分工太细又互不通气，时间性要求不强，缺少紧迫感，要练这种“略览”又“博览”的“望气”功夫比学武术和气功还难。先练习看目录、做提要当然可以，另外还有个补救办法是把人代替书，在人多的地方练习观察人。这类机会可多了。书和人是大有相似之处的。学学给人做新式“看相”，比较比较，不是为当小说家、戏剧家，为的是学读书，把人当做书读。这对人无害，于己有益。“一法通，百法通”，有可能自己练出一种“格式塔”感来。也许这是“宏观”、“整体观”的本领，用来读书总是有益无害的吧？

我来不及再学这种读书本领了，说出来“信不信由你”，至少是无害的吧？再重复一句：这说的是“博览”、“略览”，不是说研究，只是作为自我教育的一个部分，不是“万应读书方”。

【大师简介】

金克木（1912—2000），祖籍安徽寿县，只有小学文凭，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我国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大家，学贯东西，通晓多国语言，对东西方文化很多领域有广泛研究，著名的诗文学者。

自学成才的金克木

◎李工真

节选自李工真著《我所认识的金克木先生》。

金克木先生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8月14日出生于江西省一个旧官僚家庭。他父亲本是个穷秀才出身，多年苦读不第，五十多岁才捐到一个县官的位置，但在县官任上屁股还没有坐热，便逢上了辛亥革命，不仅削职为民，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至于他母亲，本是个穷丫头出身，由于天生一双大脚，一生中竟被卖过三次！只是在他父亲做官以后，花了三百两银子才买进门的。金老太爷在家庭生活上也十分不幸，五十多岁的人竟四次丧偶，在得到第四任续弦夫人的同意后，才将这位大脚大手、勤快能干的烧火丫头收为偏房。

没想到他父亲的这位偏房倒真有福气，竟在这“鼎革”之年，老爷头上的花翎和顶戴都掉了下来的倒霉年头，给他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金克木先生。而他母亲从生产的痛苦中清醒过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生了一个儿子，该不会再卖我了吧？”据金先生回忆，“民国成立后，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我生下来就遭遇抄家，尿片都被搜检过”。因此，金先生的童年并没有过上什么富贵生活。

金先生一生只拿过小学文凭，少年时，在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道彻底败落而不得不辍学。为了支撑家庭，他十六岁至十八岁，托人介绍，曾在家乡教小学，养活自己和母亲。

1930年，刚满十九岁的金克木先生，便到北平求学，无家无业在这古都中漂泊。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广为拜师，勤奋自学。他先与一群因种种原因读不了大学的年轻“北大迷”一起，到当时还设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

学旁听，学习英文、法文、德文和世界语。

1932年冬，金先生又因经济上难以为继而离开北平，前往山东德县师范教国文。但1933年，他又带着挣到手的一点点微薄薪水回到北京大学做起课堂上的“无票乘客”。1935年，经友人介绍，终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了一个职员的位置，成天坐在出纳台后，管借书还书。那段时间，据金先生自己说，“却是我学的最多的一段时间”。

金先生在他的《咫尺天颜应对难》一书中十分详细地谈到他是怎样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自学成才的：“这里大多是文科、法科的书，来借书的也是文科和法科的居多。他们借的书我大致都还能看看。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寻。渐渐，他们指引我门路。”

“这些读书导师对我影响很大，若不是有人借过像《艺海珠尘》（文艺丛书）、《海昌二妙集》（围棋谱）这类书，我未必会去翻看，外文书也是同样。有一位来借关于绘制地图的德文书。我向他请教，才知道了画地图有种种投影法，经纬度弧线怎样画出来的。又有一次，来了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借关于历法的外文书。他在等书时见我好像对那些书有兴趣，便告诉我，他听历史系一位教授讲‘历学’课，想自己找几本书看。他还开了几部不需要很深数学知识也能看懂内容的中文和外文书名给我。他这样热心，使我很感激。”

金克木先生还特别谈到过一位从几十里外步行赶到北大图书馆来的鼎鼎大名的教授，虽然金先生没有透露他的姓名，但可以肯定他不在北大任教，只可能是当时燕京大学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向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我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第准予借出。借的全是善本、珍本。”由于外借需有馆长批

准，而馆长那天又刚好不在，这位老先生又一言不发地离去了。待这位客人走后，“我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我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当然他对我这个土头土脑的毛孩子不屑一顾，而且不会想到有人偷他的学问”。

深度阅读

《蜗角古今谈》，金克木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挂剑空垄：新旧诗集》，金克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孔乙己外传》，金克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风烛灰思想的旋律》，金克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书读完了》，金克木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
《文化卮言》，金克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文化的解说》，金克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读书

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

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我爱念书。

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愣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这类书可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一来是因为——我才明白过来——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些已经死了，比如写《尚书》的那位李二哥。二来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专爱念这类书，我不便得罪人太多了。顶好，我看是不管别人；我不爱念的就不动好了。好在，我爸爸没希望我成个学者。

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书不老老实实的当本书，瞪人干吗呀？我不能受这个气！有一回，一位朋友给我一本《相对论原理》，他说：

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读了两个“配纸”，我遇上了一个公式。我跟它“相对”了两点多钟！往后边一看，公式还多了去啦！我知道和它们“相对”下去，它们也许不在乎，我还活着不呢？

可是我对这类书，老有点敬意。这类书和第一类有些不同，我看得出。第一类书不是没法懂，而是懂了以后使我更糊涂。以我现在的理解力——比上我七岁的时候，我现在满可以做圣人了——我能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明白完了，紧跟着就糊涂了；昨儿个晚上，我还挨了小女儿——玫瑰唇的小天使——一个嘴巴。我知道这个小天使性本不善，她才两岁。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懂不懂的，人家不闹玄虚，它瞪我，或者我是该瞪。我的心这么一软，便把它好好放在书架上；好打好散，别太伤了和气。

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其实这不该算一类；就这么算吧，顺嘴。这类书是这样的：名气挺大，念过的人总不肯说它坏，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地说将要念。譬如说《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罗马的悲剧，辛克莱的小说，《大公报》——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都算在这类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随手便又放下了。这里还就属那本《大公报》有点劲。我不害羞，永远不说将要念。好些书的广告与威风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认那些广告做得不错，谁管它威风不威风呢。

“类”还多着呢，不便再说；有上面的三项也就足以证明我怎样的不高明了。该说读的方法。

怎样读书，在这里，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话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

管你这一套！

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姻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姻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儿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得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儿累赘。

第五，哼，算了吧。

【大师简介】

老舍（1899—1966），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曾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

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凌辱投湖自尽。

【往事与追忆】

怀念老舍先生

◎邓友梅

节选自邓友梅著《怀念老舍先生》。

认识老舍先生那年，我刚十九岁。是在北京市的“大众文艺创研会”里。这个创研会是个团结、改造章回小说作家和旧文人的一个群众性组织，由赵树理、康濯、马烽、苗培时等解放区来的作家担任领导工作。有陈慎言、陶君起（是否有还珠楼主李红，已记不清）等老北京城内的章回、武侠小说作家和记者参加活动。老舍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也参加了创研会，并成了解放区来的作家和这些职业文人之间的桥梁。他和这两边都有交情，都能过话。他穿着讲究的西装，说着道地的京白，三天两头在东单三条一间光线极暗的屋子里谈笑风生。为了引用一句唱词他可以一口气背下半段《剑阁闻铃》或是《黛玉焚稿》。碰上对一件事有意见，又不便直谈，他能即兴说一段单口相声式的笑话，让大家哈哈大笑之后，悟出这里另有深意。记得有位正在发红的同志写了个剧本，虽然有不少人奉承叫好，明眼人一看就看出这作品是不行的。可这位同志自视过高，又被捧得昏昏然，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于是讨论这剧本时，大家都缄口不言。老舍说：“有闷着这工夫，我给大伙说个笑话吧。”他说有一个唱花脸的演员，专爱唱黑旋风李逵，戏瘾极大，可玩意儿极糟，哪个剧团都不敢约他。他犯了瘾就自个在家里唱，唱了几天，周围的邻居找到派出所，说他再这么唱我们大伙都得搬家。我们情愿捐献一张月票，让他天天上郊区唱去。派出所就以维持治安名义给这人下了个通令，只许他上郊区唱，不许在家里唱。他倒听话，就带着行头，夹着板

斧上西山唱去了。这地方虽然没人管他了，可也没人听他的了，唱了几天没有一个听众，实在感到寂寞。

这天正唱在兴头上，远处来了个过路的。他就唱得格外卖力气。那人一看他耍着一对板斧，又唱又叫，以为是个疯子，赶紧绕开想另找条路走。好几天才碰上这么个观众，竟然要跑，这演员急了，追上去抓住过路人的衣领问："你是想死还是想活？"那人说："好好的，我干吗想死呢？"演员说："要想死你就跑，我一板斧杀了你，要想活你坐下，老老实实听我唱两段黑旋风，唱完放你走！"过路的说："嗨，就这事呀？行，我还就爱听戏，您唱吧，我决不走了！"过路的坐在路边，演员就开唱。唱了一段，舞了一回，正要开始唱第二段，那过路的站起来说："先生，我看您还是杀了我吧！……"

大家听了捧腹大笑，老舍绷着脸坐在一边，等大家笑完，他说："×同志这剧本还是写得好。那么多人买票来看，没一个是被人拿板斧迫着来的……"

那位同志却有所领悟，连说："大家实打实说点不足之处吧……"

【深度阅读】

《骆驼祥子》，老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老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茶馆》，老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四世同堂》，老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老舍小说全集》（全十一卷），老舍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读书与生活

到白沙来，原是应了朋友的约，来看看梅花的，听说有三百棵，很羡慕诸位的幸福。不料却有同学来找我演讲，我不免叹一口气，心想说书的命，到什么地方也逃不脱。不过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因为我只带来一个空空的脑袋，预备装满了好风景，好印象回去；却原来也要付代价。这年头，穷日子真难过。幸而听几位先生说，诸位很爱读书，我因此想到现在要讲的题目。诸位也许笑我，“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想这样笑我是不应该的，因为读书也罢，生活也罢，我都外行得很：现在纠缠到一块来说，恐怕更说不好了。

听一般人的说话，读书仿佛是怪令人头痛的事情。不是“一部廿四史无从读起”，分量太多，就是天气不好，“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又凉来冬又冷，收拾书包好过年。”——这首好诗，别处的学生听说都是很心会的。说是进学堂读书来的，为什么这样为难呢？我想，现在的教育制度要负一部分责任：拿死的知识填塞了之后，再拿考试来测量结果，不要几年，学生就变为完全被动的了，读书的兴趣也被消灭。我记得自己在学校读英文时，先生曾经用过几种英国文学名著作教本，结果我往往想到这些书的颜色和样式便觉得厌恶。我这样怀着偏见来厌恶的，有那位“写起文章来像天使”的高斯密斯（Oliver Gotdsmith）。以后我每看他的文章，

特别看到他那聪明的高额头，便觉得怪对他不住。连对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我都表示过不敬，诸位就想一想这些教育家的本事！幸而我自己碰到一本《天方夜谭》，使我对外国文的兴趣，没有完全被闷死。从此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在课堂上虽然不免常打盹，课外却往往懒得睡觉。我用不着再听先生三番五次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或"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知道他们只使我见到"颜如铁"，我倒不如闭眼念几声佛。我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怎样，不过我相信在塞与考两重夹板中间，总压不出很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要想培养读书的兴趣，非将态度根本改变了不可。读书不是要应付考试，不是要敷衍外来的要求，却是要满足内心的需要，充实自己的生活。换了话说，读书必须是自己的有机的一部分，必须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熔为一炉。若是书和生活经验发生了亲切的关系，书便有了味道，变为知己的朋友一样了。若是生活经验从读书扩大推广，充实的机会就无限地增多了。书将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根本改变，是常有的例子。反之，生活的经验越丰富，读书的欣赏和理解力也就越深广，也就越能领略书中的真味。所以读书与生活是相辅相成的，必须两者并进，才可以达到佳境。光读书而无生活，只尝得到间接的经验，和吃嚼过的饭差不多；光生活而不读书，却势必空虚，狭小。

我现在来举几个小小的例子，说明我这一点点的意思。我说读书可以增广加深生活的经验，因为名著是最好的感情和思想的结晶，我们可以从其中吸收无穷的精神的养料。很平常的东西，经过名著的作者，特别是诗人，描写之后，便有了意味，在读者的心中形成了联想。这样的诗句便成了"**Open Sesame**[1]"一样的咒语，可以替读者打开珍贵的宝库。诸位知道，罗马有一位大诗人维吉尔（**Veigil**），他在中世纪被人认为魔术家，因为他的半行一行的诗，往往可以在读者心里唤起无穷的联想，仿佛是咒语一样。

最近翻译吉辛（George Gissing）的《四季随笔》（*The private papers of*

[1] 《阿利巴巴与四十大盗》中开门的咒语。

Henry Ryeeroft），其中有一段将这个意思讲得最好。他引约翰生（**Samuel Johnson**）的话：在读过书和没有读过书的人之间，同死人与活人之间，有同样大的差别。接着他说蝙蝠和枭鸟，若不是因为入了诗人的世界，他也许看到它们，听到它们，只怀着厌恶或迷信。可是，

> "Then nightly sings the staring owl,
> To-whit!
> To-who! -a nerry note."
> **（凝目的枭鸟夜夜歌唱着，To-whit！To-who—欢快的歌调。）**
> "On the bat's back I do flg，After Summer merrily."
> **（我在蝙蝠的背上飞来飞去，快快乐乐地过着夏季。）**

这两种鸟便入了超凡的境地，变为富于诗的联想的了。可是对于不读诗的人，它们和麻雀有什么不同呢？夜莺、云雀、布谷，也因为诗的联想，更被人珍视。这种微妙的经验，不读诗的人却无福领略。我因为韩愈的诗句——“黄昏到寺蝙蝠飞”，对于蝙蝠也颇怀好感，而且每见到它，往往想起“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仿佛见到了诗人辛弃疾独宿的凄凉情景。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过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其他如树木花草，本身固然是美的，也因为诗的联想而更美。梅呀、柳呀、梧桐呀、芭蕉呀，在不读书的人的心目中，假如引起什么情绪的话，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读书使我们的生活丰富。

吉辛又说到半夜的钟声使他惊醒，若不是为了莎士比亚的联想，他也许会诅咒它扰乱睡眠呢。读过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假如诸位中有

人半夜被钟声惊醒，不会因此感到喜悦吗？

生活的方式和态度被读书所改变，是所以还要办教育的基本理由，恐怕诸位从教育家听的已多，见的已多，我用不着多说了。我只说一件小事。多年前我读到一篇论散步的文章，作者特夫莱严（G. M. Trevelyan）说他有两位大夫，一位是他的左腿，一位是他的右腿，在身心失调的时候，他总请他们医治，而且一治必好。那时我还在穷学生时代，而且颇有人担心我活不下去，所以常请这两位大夫侍候我，是最合理，也是最经济的事。决然下聘约。不像目前许多教授，只兼挂名的差事，他们倒是很热心服务的。几年后旧同学见到我，却惊讶我居然不但没有入墓，却比以前健康些了。这还是小益处。他们给了我更多的精神上的快乐。我觉得我的整个的人生观，都差不多因为他们改变了。别的人听说都是用脑子思想的，我却用腿思想的时候也颇多。我向诸位保证，腿实在不像许多脑子那样空虚。假如我早几年读到这篇文章，我不知要多得多少益处；特别他论到青春苦恼期的一段，会给我最健全的启示。我先说到蝙蝠，诸位也许有讥笑我悬空的；这一回可脚踏实地了。

我说生活的经验也可以增加读书的理解和欣赏，让我也来举一点小小的例子。记得有一回，和在座的台静农先生谈到中国诗的意境，我说很喜欢柳永词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他问我，前一句“今宵酒醒何处”如何？我摇摇头，因为我不善喝酒。他却觉得酒醒后那境界更好。这有点不好商量。不过他继续说，有一次回故乡的途中，却亲身经历过这境界。我只有甘拜下风，承认他的欣赏更真切。在我，“杨柳岸”和“晓风残月”从没有合成过一张和谐的图画。

我在北平，教学生读过一点诗，有一位坦然承认念不出什么味道。多半是情诗，他正在厌恶女性，难怪的。暑假后，他见我第一句话便说他喜欢那些诗了。我笑了笑，他也心会我知道他不是在厌恶中过日子了。

对于名著的欣赏，有许多地方很受自己的经验限制，所以脍炙人口的

名著，有时读不出什么好，也不必扫兴的。怎样的名著也往往有不精彩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自己的了解力过差。就是最精彩的地方，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同样领略。有人说，一年读一次莎士比亚，每次都可以有新发现。真正的名著。大体都很耐咀嚼，咀嚼一回，总可以得到些真味。不要只相信别人的说法，虽然明达的批评可以帮助我们的欣赏，可惜这样的批评并不多。我们和十个人相交，未必有两三位可以成为朋友；众书中所得的友谊温情，比例却比较高。有时我们自己的经验没有成熟，不能了解欣赏一部作品；有时同一作品，因为读的时间不同，给我们很不同的印象，可以证明自己的经验往往在读书上有绝大的决定作用。所以我们要想深入到书里去，非同时将生活经验尽力扩大不可。有批评家说，少年人读塞万提斯（Gervantes）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会发笑，中年人读了会思想，老年人读了却要哭，也就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生活同读书是分不开来的。一方面不要做书呆子，将脑袋里装满着死书；一方面也不要空着脑袋过生活。读书应当是生活的一种享乐，不是令人头疼的工作。生活应当用书籍来陶冶，使它美化并充实。读书，我们可以接近古今中外的良师益友；生活，我们才可以接受它们给予的恩惠。这样将生活和读书熔为一炉，我想英国诗人勃莱克所说：

>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 （一粒沙里一个世界，一朵花里一个天国。）

这境界我们有时候可以领略到。

谢谢诸位的耐心，费不少时间来听这几句很平常的话。

【大师简介】

李霁野（1904—1997），原名李继业，安徽霍丘人。教育家、作家、翻译家。1925年加入鲁迅先生建议成立的未名社。1927年肄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经鲁迅先生推介，翻译的《简爱》作为《世界文库》单行本印行，这也是《简爱》的第一个中译本。1947—1949年，在台湾大学任教。1949—1982年，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系主任。曾任全国第二、三、四、五、六届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

【往事与追忆】

对于李霁野先生的点滴回忆

◎林非

节选自林非著《对于李霁野先生的点滴回忆》。

在经历了巨大的灾难之后，人们并没有沮丧与绝望，却依旧充满了信心，洋溢着欢声和笑语，顽强地搏斗下去，那么这个民族就应该可以迎接阳光灿烂的明天。这活泼泼的场景，顿时使我觉得似乎刮起了一阵温和的暖风，完全吹走了周围凛冽的寒气。

我正是怀着一种快乐的情绪，找到了这条名叫大理道的街巷，走进李霁野先生的家里。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之后，他很高兴地带领我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招呼我坐在桌子旁边的沙发上。在他稀疏的华发底下，一对细小的眼睛里，闪烁出阵阵的光芒，将自己布满了皱纹的脸庞，映照和衬托得很明亮起来。我张望着他堆积在案头的文稿，和支撑在小床顶端防备着屋顶倒塌的铁架，想象他在去年一夕数惊的地震中间，大概也并未中断过笔耕的习惯。

……

李霁野先生听着我说话，笑容满面地瞧了我一眼，说是他自己早就认为应该撰写鲁迅的传记，这样可以给予世人无限的教益，而如果许广平先生还健在的话，此书的作者当然以她最为适宜，因为她跟鲁迅朝夕相处，肯定最了解他的性格与为人，并且还能够随时笔录他智慧和风趣的谈话。

……

他又提起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写信给他谈论撰写传记的问题，说是鲁迅实在太谦逊了，认为自己的一生过于平凡，只是有一些“小小的想头和语言”。其实在本世纪之间，像鲁迅这样深刻的哲人，肯定是寥寥无几的。

……

李霁野先生说起了自己正在撰写几篇回忆往日的文章。他兴冲冲地诉说着，不管多么忙乱，不管精力正在日渐地衰退，每天总得写上几百字，像这样坚持不懈，一年中间也可以写出十几万字来，相当可观的数字啊！说着就爽朗地笑开了，哪里像是早已进入了古稀之年的老翁。

我虽然很愿意跟他说话，却怕他再聊下去，会太劳累的，只好怏怏地站起身来，说是以后再继续向他请教。他送我走到大门外边，一面走路，一面喃喃地说：“只要活着，就还能写下去！”老人这种执著的神态，立即使我想起刚才在路上瞧见的情景，心里也升腾出无穷的希望来。

【深度阅读】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李霁野译，岳麓书社，1994年
《被侮辱与损害的》，（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李霁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李霁野文集》（1—9册），李霁野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四季随笔》，（英）吉辛著，李霁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学问之趣味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O”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做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它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

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喝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要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诸君要尝学问的趣味吗？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

第一，"无所为"。（为读去声）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另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便，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掉弄虚机，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那部分搁久了不用，他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得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

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子。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哪里不消耗了？千万别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症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地研究。趣味总是慢慢地来，越引越多，像那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人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窗户张一张，再不会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做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有肯一层一层地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玩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打伙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说的这四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曾会这样做。唉，世上人多么可怜啊！有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自没有几个人肯来享受。古书说的故事“野人献曝”，我是尝冬天晒太阳的滋味尝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地来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采纳吧！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大师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1912年组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20年后，脱离政界，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授，并专心著述。一生完成一千二百万字以上，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

【往事与追忆】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节选自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

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昂，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口张口大笑了。

【深度阅读】

《饮冰室合集》（全十二册），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89年
《阅读梁启超》，夏晓虹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梁启超游记》，梁启超著，东方出版社，2006年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册），梁启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读书苦？读书乐？

从开蒙说起

读书苦？读书乐？一言难尽。从前读书自识字起。开蒙时首先是念字号，方块纸上写大字，一天读三五个，慢慢增加到十来个，先是由父母手写，后来书局也有印制成盒的，背面还往往有画图，名曰看图识字。小孩子淘气，谁肯沉下心来一遍一遍地认识那几个单字？若不是靠父母的抚慰，甚至糖果的奖诱，我想孩子开始识字时不会有多大的乐趣。

光是认字还不够，需要练习写字，于是以描红模子开始，“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再不就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或是“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洞中才一日，世上几千年”。手搦毛笔管，硬是不听使唤，若不是先由父母把着小手写，多半就会描出一串串的大墨猪。事实上，没有一次写字不曾打翻墨盒砚台弄得满手乌黑，狼藉不堪。稍后写小楷，白折子乌丝栏，写上三、五行就觉得很吃力。大致说来，写字还算是愉快的事。

进过私塾或从“人，手，足，刀，尺”读过初小教科书的人，对于体罚一事大概不觉陌生。念背打三部曲，是我们传统的教学法。一目十行而能牢记于心，那是天才的行径。普通智商的儿童，非打是很难背诵如流的。英国

18世纪的约翰孙博士就赞成体罚，他说那是最直截了当的教学法，颇合于我们所谓“扑作教刑”之意。私塾老师大概都爱抽旱烟，一二尺长的旱烟袋总是随时不离手的，那烟袋锅子最可怕，白铜制，如果孩子背书疙疙瘩瘩的上气不接下气，当心那烟袋锅子敲在脑袋壳上，砰的一声就是一个大疱。谁疼谁知道。小学教室讲台桌子抽屉里通常藏有戒尺一条，古所谓，也就是竹板一块，打在手掌上其声清脆，感觉是又热又辣又麻又疼。早年的孩子没尝过打手板的滋味的大概不太多。如今体罚悬为禁例，偶一为之便会成为新闻。现代的孩子比较有福了。

从前的孩子认字，全凭记忆，记不住便要硬打进去。如今的孩子读书，开端第一册是先学注音符号，这是一大改革。本来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我们的文字不是拼音的，虽然其中一部分是形声字，究竟无法看字即能读出声音，或是发音即能写出文字。注音符号（比反切高明多了）是帮助把语言文字合而为一的一种工具，对于儿童读书实在是无比的方便。我们中国的文字不是没有严密的体系，所谓六书即是一套提纲挈领的理论，虽然号称“小学”，小学生谁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说文解字》五百四十个部首就会使得人晕头转向。章太炎编了一个“部首歌”，“一、上、示、三、王、玉、珏……”煞费苦心，谁能背得上来？陈独秀编了一部《小学识字读本》（台湾印行改名为《文字新论》），是文字学方面一部杰出的大作，但是显然不是适合小学识字的读本。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说难不难，说易不易，高本汉说过这样一段话——

北京语实在是一种最可怜的方言，总共只有四百二十个音缀；普通的语词有不下四千个，这四千多个的语词，统须支配于四百二十个音缀当中。同音语词的增进，使听受者受了极大的困难，于此也可以想见了……（见《中国语与中国文》）

这是外国人对外国人所说的话，我们中国儿童国语娴熟，四声准确，并不觉得北京语“可怜”。我们的困难不在语言，在语言与文字之间的不易沟通。所以读书从注音符号开始，这方法是绝对正确的。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旧式的启蒙的教材。《百家姓》有其实用价值，对初学并不相宜，且置勿论。《三字经》《千字文》都编得不错，内容丰富妥当，而且文字简练，应该是很好的教材，所以直至今日还有人怀念这两部匠心独运的著作，但是对于儿童并不相宜。孩子懂得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1912年，我在北平陶氏学堂读过一个时期的小学，记得国文一课是由老师领头高吟“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全班一遍遍地循声朗诵，老师喉咙干了，就指派一个学生（班长之类）代表他领头高吟。朗诵一个小时，下课。好多首《诗经》作品就是这样地注入我的记忆，可是过了五六十年之后自己摸索才略知那几首诗的大意。小时候多少时间都浪费掉了。教我读《诗经》的那位老师的姓名已不记得，他那副不讨人敬爱的音容道貌至今不能忘！

新式的语文教科书顾及儿童心理及生活环境，读起来自然较有趣味。1912年的国文教科书，“一人二手，开门见山，山高日小，水落石出……”，“一老人，入市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这一类课文还多少带有一点文言的味道。后来仿效西人的作风，就有了“小猫叫，小狗跳……”一类的句子，为某些人所诟病。其实孩子喜欢小动物，由此而入读书识字之门，亦未可厚非。抗战初期我曾负责主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深知其中艰苦，大概越是初级的越是难于编写，因为牵涉到儿童心理与教学方法。现在台湾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无论在内容上或印刷上较前都日益进步，学生面对这样的教科书至少应该不至于望而生畏。

纪律与兴趣

高中与大学一二年级是读书求学的一个很重要阶段。现在所谓读书，和从前所谓“读圣贤书”意义不同，所读之书范围较广，学有各门各科，书有各种各类。但是国、英、算是基本学科，这三门不读好，以后荆棘丛生，一无是处。而这三门课，全无速成之方，必须按部就班，耐着性子苦熬。读书是一种纪律，谈不到什么兴趣。

梁启超先生是我所敬仰的一位学者，他的一篇《学问与兴趣》广受大众欢迎，很多人读书全凭兴趣，无形中受了此文的影响。我也是他所影响到的一个。我在清华读书，窃自比附于“少小爱文辞”之列，对于数学不屑一顾，以为性情不近，自甘暴弃，勉强及格而已。留学国外，学校当局强迫我补修立体几何及三角二课，我这才知道发愤补修。可巧我所遇到的数学老师，是真正循循善诱的一个人，他讲解一条定律一项原理，不厌其详，远譬近喻地要学生彻底理解而后已。因此我在这两门课中居然培养出兴趣，得到优异的成绩，蒙准免予参加期终考试。我举这一个例，为的说明一件事，吾人读书上课，无所谓性情近与不近，无所谓有无兴趣。读书上课就是纪律，越是自己不喜欢的学科，越要加倍鞭策自己努力钻研。克制自己欲望的这一套功夫，要从小时候开始锻炼。读书求学，自有一条正路可循，由不得自己任性。梁启超先生所倡导趣味之说，是对有志研究学问的人士说教，不是对读书求学的青年致词。

一般人称大学为最高学府，易令人滋生误解，大学只是又一读书求学的阶段，直到毕业之日才可称之为做学问的“开始”。大学仍然是一个准备阶段，大学所讲授的仍然是基本知识。所以大学生在读书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凡是课程规定的以及教师指定的读物都是必须读的。青年人常有反抗的心理，越是规定必须读的，越是不愿去读，宁愿自己去海阔天空地穷搜冥讨。到头来是枉费精力自己吃亏，五四时代我还是个学生，求知的欲望很

盛，反抗的情绪很强，亦曾有志于读书而不知所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不足以餍所望。有一天几个同学和我以《清华周刊》记者的名义进城去就教于北大的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慨允为我们开一个最低的国学必读书目，后来就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内容非常充实，名为最低，实则庞大得惊人。梁启超先生看到了，凭他渊博的学识开了一个更详尽的书目。没有人能按图索骥地去读，能约略翻阅一遍认识其中较重要的人名书名就很不错了。吴稚晖先生看到这两个书目，气得发出一切线装书都该丢进茅坑里去的名言！现在想想，我们当时惹出来的这个书目风波，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罢了。我们的举动表示我们不肯枯守学校规定的读书纪律，而对于更广泛更自由的读书的要求开始展露了天真的兴趣。

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到三十岁左右开始以教书为业的时候，发现自己学识不足，读书太少，应该确有把握的题目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缺口，自己没有全部搞通，如何可以教人？既已荒疏于前，只好恶补于后，而恶补亦非易事。我忘记是谁写的一副对联：“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很有意思，下句好像是左宗棠的，上句不知是谁的。这副对联表面上语气很谦逊，细味之则自视甚高。以上句而论，天下之书浩如烟海，当然无法遍读，而居然发现自己尚有未曾读过之书，则其已经读过之书必已不在少数，这口气何等狂傲！我爱这句话，不是因为我也感染了几分狂傲，而是因为我确实知道自己的简陋，许多该读而未读的书太多，故此时时记挂着这句名言，勉励自己用功。

我自三十岁才知道自动地读书恶补。恶补之道首要的是先开列书目，何者宜优先研读，何者宜稍加参阅，版本问题也是非常重要。此时我因兼任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长，一切均在草创，经费甚为充足，除了国文系以外各系申请购书并不踊跃，我乃利用机会在英国文学图书方面广事购储。标准版本的

重要典籍以及参考用书乃大致齐全。有了书并不等于问题解决，要逐步一本一本地看。我哪里有充分时间读书？我当时最羡慕英国诗人米尔顿，他在大学卒业之后听从他父亲的安排到郝尔顿乡下别墅下帷读书五年之久，大有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之概，然后他才出而问世。我的父亲也曾经对我有过类似的愿望，愿我苦读几年书，但是限于环境，事与愿违。我一面教书，一面恶补有关的图书，真所谓是困而后学。例如莎士比亚剧本，我当时熟悉的不超过三分之一，例如米尔顿，我只读过前六卷。这重大的缺失，以后才得慢慢弥补过来。至于国学方面更是多少年茫然不知如何下手。

读书乐

读书好像是苦事，小时嬉戏，谁爱读书？既读书，还要经过无数次的考试，面临威胁，担惊害怕。长大就业之后，不想奋发精进则已，否则仍然要继续读书。我从前认识一位银行家，镇日价筹划盈虚，但是他床头摆着一套英译《法朗士全集》，每晚翻阅几页，日久读毕全书，引以为乐。宦场中、商场中有不少可敬的人物，品位很高，嗜读不倦，可见到处都有读书种子，以读书为乐，并非全是只知道争权夺利之辈。我们中国自古就重视读书，据说秦始皇日读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公文才就寝。《鹤林玉露》载："唐张参为国子司业，手写九经，每言读书不如写书。高宗以万乘之尊，万畿之繁，乃亦亲洒宸翰，遍写九经，云章粲然，始终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从前没有印刷的时候讲究抄书，抄书一遍比读书一遍还要受用。如今印刷发达，得书容易，又有缩印影印之术，无辗转抄写之烦，读书之乐乃大为增加。想想从前所谓"学富五车"，是指以牛车载竹简，仅等于今之十万字弱。纪元前一千年以羊皮纸抄写一部《圣经》需要三百张羊皮！那时候图书馆里的书是用铁链锁在桌上的！《听雨纪谈》有一段话：

苏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曰："予犹及见老儒先生言其少时，《史记》《汉书》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诸子百家，转相摹刻，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其文辞学术当倍蓰昔人。而后学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苏公此言切中今时学者之病，盖古人书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录。盖以其得之之难故，其读亦不苟。至唐世始有板刻，至宋而益盛，虽云便于学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读，或读之而不灭裂，则以有板刻之故。无怪乎今之不如古也。

其言虽似言之成理，但其结论今不如古则非事实。今日书多易得，有便于学子，读书之乐岂古人之所能想象。今之读书人所面临之一大问题乃图书之选择。开卷有益，实未必然，即有益之书其价值亦大有差别，罗斯金说得好："所有的书可分为两大类：风行一时的书与永久不朽的书。"我们的时间有限，读书当有选择。各人志趣不同，当读之书自然亦异，唯有一共同标准可适用于我们全体国人。凡是中国人皆应熟读我国之经典，如《诗》、《书》、《礼》，以及《论语》、《孟子》，再如《春秋左氏传》、《史记》、《汉书》以及《资治通鉴》或近人所著《通史》，这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之所寄。如谓文字艰深，则多有今注今译之版本在。其他如子集之类，则各随所愿。

人生苦短，而应读之书太多。人生到了一个境界，读书不是为了应付外界需求，不是为人，是为己，是为了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吾故曰：读书乐。我想起英国18世纪诗人一句诗"Stuff the head With all such reading as was never read"大意是："把从未读过的书籍，赶快塞进脑袋里去。"

漫谈读书

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简，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版、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一千六百余种，分为五十五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各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地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地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足现代人之望。一

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偕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江页）洞崩拆之声，山林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连刺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书，本身就有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份偏爱。吴稚晖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逸丛书影印宋版蔡孟弼《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校勘上笺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

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确是无上的艺术品。

书

从前的人喜欢夸耀门第，纵不必家世贵显，至少要是书香人家才能算是相当的门望。书而日香，盖亦有说。从前的书，所用纸张不外毛边连史之类，加上松烟油墨，天长日久密不通风自然生出一股气味，似沉檀非沉檀，更不是桂馥兰薰，并不沁人脾胃，亦不特别触鼻，无以名之，名之曰书香。书斋门窗紧闭，乍一进去，书香特别浓，以后也就不大觉得。现代的西装书，纸墨不同，好像有一股煤油味，不好说是书香了。

不管香不香，开卷总是有益。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有书癖的人，读书种子是不会断绝的。买书就是一乐事，旧日北平琉璃厂隆福寺街的书肆最是诱人，你迈进门去向柜台上的伙计点点头便直趋后堂，掌柜的出门迎客，分宾主落座，慢慢地谈生意。不要小觑那位书贾，关于目录版本之学他可能比你精。搜访图书的任务，他代你负担，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数，一有所获立刻专人把样函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气气。书价么，过节再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读书人很难不染上“书淫”的毛病，等到了四面卷轴盈满，连坐的地方都不容易匀让出来，那时候便可以顾盼自雄，酸溜溜地自叹“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现代我们买书比较方便，但搜访的乐趣，搜访而偶有所获的快感，都相当地减少了。挤在书肆里浏览图书，本来应该是像牛吃嫩草，不慌不忙的，可是若有店伙眼睛紧盯着你，生怕你是一名雅贼，你也就不会怎样的从容，还是早些离开这是非

之地好些。更有些书不裁毛边，干脆拒绝翻阅。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曰：‘我晒书。’”（见《世说新语》）郝先生满腹诗书，晒书和日光浴不妨同时举行。恐怕那时的书在数量上也比较少，可以装进肚里去。司马温公也很爱惜书的，他告诫儿子说：“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净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晒其脑。所以年月虽深，从不损动。”书脑即书的装订之处，翻页之处则曰书口。司马温公看书也有考究，他说：“至于启卷，必先几案洁净，借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曾敢空手捧之，非唯手汚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随覆以次指面，捻而夹过，故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见《宋稗类钞》）我们如今的图书不这样名贵，并且装订技术进步，不像宋朝的“蝴蝶装”那样的娇嫩，但是读书人通常还是爱惜他的书，新书到手先裹上一个包皮，要晒，要揩，要保管。我也看见过名副其实的收藏家，爱书爱到根本不去读它的程度，中国书则锦函牙签，外国书则皮面金字，庋置柜橱，满室琳琅，真好像是如福地，书变成了陈设、古董。

有人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有人分得更细：“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大概都是有感于书有借无还的。书也应该深藏若虚，不可慢藏诲盗。最可恼的是全书一套借去一本，久借不归，全书成了残本。明人谢肇淛编《五杂俎》，记载一位“虞参政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径，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惜一般人难得有此设备。

读书乐，所以有的人一卷在手往往废寝忘食。但是也有人一看见书就哈欠连连的，以看书为最好的治疗失眠的方法。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这也要看所读的是些什么书。如果读的尽是一些猥亵的东西，其人如何能有书卷气之可言？宋真宗皇帝的劝学文，实在令人难以入耳：“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

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不过是把书当做敲门砖以遂平生之志，勤读六经，考场求售而已。十载寒窗，其中只是苦，而且吃尽苦中苦，未必就能够进入佳境。倒是英国19世纪的罗斯金，在他的《芝麻与白百合》第一讲里，劝人读书尚友古人，那一番道理不失雅人深致。古圣先贤，成群的名世的作家，一年四季的排起队来立在书架上面等候你来点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行吟泽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饭颗山头的李白、杜甫也会联袂而来；想看外国戏，环球剧院的拿手好戏都随时承接堂会；亚里士多德可以把他逍遥廊下的讲词对你重述一遍。这真是读书乐。

我们国内某一处的人士最好赌博，所以讳言书，因为书与输同音，读书曰读胜。基于同一理由，许多地方的赌桌旁边忌人在身后读书。人生如博弈，全副精神去应付，还未必能操胜算。如要沾染上书癖，势必呆头呆脑，变成书呆，这样的人在人生的战场之上怎能不大败亏输？所以我们要钻书窟，也还要从书窟里钻出来。朱晦庵有句：“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寻春。”是见道语，也是老实话。

【大师简介】

梁实秋（1903—1987），浙江杭县人，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著名文学家，翻译家。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

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

【往事与追忆】

“滑竿教授”

◎程绍国

节选自程绍国著《林斤澜说》，标题为编者所加。

林斤澜在回忆文章中，称梁实秋为“滑竿教授”。梁实秋那时兼着两个学校的课，还有一个就是在北碚的复旦大学。北碚到北温泉，十多里。十多里路，不坐车，也不坐船。班车拥挤，又不准时，小轿车呢，战时的口号叫“一滴汽油一滴血”，名教授梁实秋坐小轿车还不够格！坐船要过滩，嘉陵江水急滩险。那么，只好步行了，梁实秋是别人代步。四川有一种简易轿子，叫滑竿的，即两条竹竿上绑一把竹躺椅子，没有遮盖。

这样抬着来上课的，学校只有梁教授一人。

青年学生或多或少读过鲁迅的书，即使没有读过，也听说过三十年代鲁迅梁实秋的论战。私下一般只说一句：“叫鲁迅骂过的”，倾向明显。

林斤澜说，他们同学中，对两位论战的性质内涵，一般不大清楚。也有记得一二名句。梁实秋的有：“无产阶级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人性高明，那么动物性更高明。”鲁迅的有：“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

冬日，江边山脚，时有飘飘棉絮般的南国飞雪。风也冻手。梁实秋小胖，穿皮袍，戴绒帽，围可以绕三圈的长围巾，圆滚滚地仰在竹躺椅上。竹竿一步一颤一悠，一颤是抬前头的一步，一悠是抬后头的步子。南方穿皮袍，身上是不会冷的，可以发生一些诗意。

梁实秋下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微笑，可见不当做苦差使。他不看学生，从长袍里掏出一张长条小纸条，扫一眼，就开讲。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中世纪，文艺复兴。顺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摆事实，不重观点。如一条没有滩，没有漩涡，平静可是清楚的河流。

一会儿法国，一会儿英国，一会儿德国，提到人名书名，写板书，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抗战时期，学生中多半是“流亡学生”，即使学过外语，也耽误得差不多了。他全不管，从不提问，和学生不过话，更不交流。下课铃一响，揣纸条，戴帽子，围三绕围巾，立刻走人，上滑竿。

和别的老师，进步的或不进步的名流，都不招呼。

他的课经常满座。当时书不易得，流亡学生自有生活方式，读书时间也少。他的课显得知识丰富，条理清晰，叙述娴熟又动听。

深度阅读

《梁实秋文集》（全15卷），梁实秋著，鹭江出版社，2002年
《梁实秋散文》，插图珍藏版，梁实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雅舍谈艺》，梁实秋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梁实秋作品经典》（全五册），梁实秋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





读书的艺术

积二十年读书治学的经验，深知大半的学生对于读书一事，已经走入错路，失了读书的本意。读书本来是至乐之事，杜威说，读书是一种探险，如探新大陆，如征新土壤；佛兰西也已说过，读书是“魂灵的壮游”，随时可以发现名山巨川，古迹名胜，深林幽谷，奇花异卉；到了现在，读书已变成仅求免扣分数留班级一种苦役而已。而且读书本来是个人自由的事，与任何人不相干，现在你们读书，已经不是你们的私事，而处处要受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干涉，如注册部及你们的父母妻室之类。有人手里拿一书本，心里想我将何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这实在是一桩罪过。试想你们看红楼、水浒、《三国志》，《镜花缘》，是否你们一己的私事，何尝受人的干涉，何尝想到何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的问题？但是学问之事，是与看红楼、水浒相同。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你们若不能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经济学大纲》，你们就是不懂得读书之乐，不配读书，失了读书之本意，而终读不成书。你们能真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学，科学的书，读书才能“成名”。若用注册部的方法读书，你们最多成了一个“秀士”“博士”，成了吴稚晖先生所谓“洋绅士”，“洋八股”。

我认为最理想的读书方法，最懂得读书之乐者，莫如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及其夫赵明诚。我们想象到他们夫妇典当衣服，买碑文水果，回来夫妻

相对展玩咀嚼的情景，真使我们向往不已。你想他们两人一面剥水果，一面赏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经籍，这是如何的清雅，如何得了读书的真味。易安居士于《金石录·后序》自叙他们夫妇的读书生活，有一段极逼真极活跃的写照；她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藏既富，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你们能用李清照读书的方法来读书，能感到李清照读书的快乐，你们大概也就可以读书成名，可以感觉读书一事，比巴黎跳舞场的“声色”，逸园的赛“狗”，江湾的赛“马”有趣。不然，还是看逸园赛狗，江湾赛马比读书开心。

什么才叫做真正读书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这才是不失读书之本意。这就是李清照的读书法。你们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现在课堂上读书连烟都不许你抽，这还能算为读书的正轨吗？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现在你们手里拿一书本，心里计算及格不及格，升级不升级，注册部对你态度如何，如何靠这书本骗一只较好的饭碗，娶一位较漂亮的老婆——这还能算为读书，还配称为“读书种子”吗？还不是沦为“读书谬种”吗？

有人说，如林先生这样读书方法，简单固然简单，但是读不懂如何，而且成效如何？须知世上决无看不懂的书，有之便是作者文笔艰涩，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读者的程度不合，见识未到。各人如能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事偶有疑难，未能遽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试问诸位少时看红楼、水浒何尝有人教，何尝翻字典，你们的侄

儿少辈现在看红楼、西厢，又何尝需要你们去教？许多人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说史记得来的，而且都是背着师长，偷偷摸摸硬看下去，那些书中不懂的字，不懂的句，看惯了就自然明白。学问的书也是一样，常看下去，自然会明白，遇有专门名词，一次不懂，二次不懂，三次就懂了。只怕诸位不得读书之乐，没有耐心看下去。

所以我的假定是学生会看书，肯看书，现在教育制度是假定学生不会看书，不肯看书。说学生书看不懂，在小学时可以说，在中学还可以说，但是在聪明学生，已经是一种诬蔑了。至于已进大学还要说书看不懂，这真有点不好意思吧！大约一人的脸面要紧，年纪一大，即使不能自己喂饭，也得两手掰一只饭碗硬塞到口里去，似乎不便把你们的奶妈干娘一齐都带到学校来给你们喂饭，又不便把大学教授看做你们的奶妈干娘。

至于“成效”，我的方法可以包管比现在大学的方法强。现在大学教育的成效如何，大家是很明了的。一人从六岁一直读到二十六岁大学毕业，通共读过几本书？老实说，有限得很。普通大约总不会超过四五十本以上。这还不是跟以前的秀才举人相等？从前有一位中了举人，还没听见过《公羊传》的书名，传为笑话。现在大学毕业生就有许多近代名著未曾听过名字，即中国几种重要丛书也未曾见过。这是学堂的不是，假定你们不会看书，因此也不让你们有自由看书的机会。一天到晚，总是摇铃上课，摇铃吃饭，摇铃运动，摇铃睡觉。你想一人的精神是有限的，从八点上课一直到下午四五点，还要运动，拍球，哪里还有闲工夫自由看书呢？而且凡是摇铃，都是讨厌，即使摇铃游戏，我们也有不愿意之时，何况是摇铃上课？因为学堂假定你们不会读书，不肯读书，所以把你们关在课堂，请你们静坐，用“注射”“灌输”的形式，由教员将智识注射入你们的脑壳里。无如常人头颅都是不透水的，所以智识注射普遍不大成功。但是比如依我方法，假定你们是会看书，要看书，由被动式改为发动式的，给你们充分自由看书的机会，这个成效如何呢？间尝计算一下，假定上海光华，大夏或任何大学有一千名学

生，每人每期交学费一百圆，这一千名学费已经合共有十万圆。将此十万圆拿去买书，由学校预备一间空屋置备书架，扣了五千圆做办公费（再多便是罪过），把这九万五千圆的书籍放在那间空屋，由你们随便胡闹去翻看，年底拈阄分配，各人拿回去九十五圆的书，只要所用的工夫与你们上课的时间相等，一年之中，你们学问的进步，必非一年上课的成绩所可比。现在这十万圆用到那里去，大概一成买书，而九成去养教授及教授的妻子，教授的奶妈，奶妈又拿去买奶妈的马桶，这还可以说是把你们的“读书”看做一件正经事吗？

假定你们进了这十万圆书籍的图书馆，依我的方法，随兴所之去看书，成效如何呢？有人要疑心，没有教员的指导，必定是不得要领，杂乱无章，涉猎不精，不求甚解。这自然是一种极端的假定，但是成绩还是比现在大学教育好。关于指导，自可编成指导书及种种书目。如此读了两年可以抵过在大学上课四年。第一样，我们须知道读书的方法，一方面要几种精读，一方面也要尽量涉猎翻览。两年之中能大概把二十万圆的书籍，随意翻览。知其书名作者内容大概，也就不愧为一读书人了。第二样，我们要明白，学问的事，绝不是如此呆板。读书必求深入，而欲求深入，非由兴趣相近者人手不可。学问是每每互相关联的。一人找到一种有趣味的书，必定由一问题而引起其他问题，由看一本书而不得不去找关系的十几种书，如此循序渐进，自然可以升堂入室，研磨既久，门径自熟；或是发现问题，发明新义，更可触类旁通，广求博引，以证己说，如此一步一步地深入，自可成名。这是自动的读书方法。较之现在上课听讲被动的方法，如东风过耳，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结果不得其门而入，一无所获，强似多多了。第三，我们要明白，大学教育的宗旨，对于毕业的期望，不过要他博览群籍而已（be a well-read man），并不是如课中所规定，一定非逻辑八十分，心理七十五分不可，也不是说心理看了一百八十三页讲义，逻辑看了二百零三页讲义，便算完事。这种的读书，便是犯了孔子所谓“今汝画”的毛病。所谓博览群籍，

无从定义，最多不过说某人“书看得不少”某人“差一点”而已，哪里去定什么限制？说某人“学问不错”，也不过这么一句话而已，哪里可以说某书一定非读不可；某种科目是“必修科目”。一人在两年中翻览这二十万圆的书籍，大概他对于学问的内容途径，什么名著杰作版本，笺注，总多少有一点把握了。

现在的大学教育方法如何呢？你们的读书是极端不自由，极端不负责。你们的学问不但有注册部定标准，简直可以称斤两的，这个斤两制，就是学校的所谓“七十八分”“八十六分”之类，及所谓多少“单位”。试问学问之事，何得称量斤两？所谓英国史七十八分，逻辑八十六分，如何解释？一人的逻辑，怎么叫做八十六分？且若谓世界上关于英国史的智识你们百分已知道了七十八分，世上岂有那样容易的事？但依现在制度，每周三小时的科目算三单位，每周二小时的科目算二单位，这样由一方块一方块的单位，慢慢堆叠而来，叠成多少立方尺的学问，于是某人“毕业”，某人是“秀士”了。你想这笑话不笑话？须知我们何以有此大学制呢？是因为各人要拿文凭，因为要拿文凭，故不得不由注册部定一标准，评衡一下，就不得不让注册部来把你们“称一称”。你们如果不拿文凭，便无被称之必要。但是你们为什么要文凭呢？说来话长。有人因为要行孝道，拿了父母的钱，心里难过，于是下定决心，要规规矩矩安心定志读几年书，才不辜负父母一番的好意及期望。这个是不对的，与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恋爱女子一样的违背道德。这是你们私人读书享乐的事，横被家庭义务的干涉，是想把真理学问孝敬你们的爸爸妈妈老太婆。只因真理学问，似太渺茫，所以还是拿一张文凭具体一点为是。有人因为想要得文凭学位，每月可以多得几十块钱使你们的亲卿爱卿宁馨儿舒服一点。社会对你们的父母说，你们儿子中学毕业读了三十本书，我可给他每月四五十圆，如果再下二千圆本钱再读了三十本书，大学毕业，我可给他每月八九十圆。你们父母算盘一打，说“好”，于是议成，而送你们进大学，于是你们被称，拿文凭，果然每月八九十圆到手，成

交易。这还不是你们被出卖吗？与读书之本旨何关，与我所说读书之乐又何关？但是你们不能怪学校给你们称斤两，因为你们要向他拿文凭，学堂为保持招牌信用起见，不能不如此。且必如此，然后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处于今日大规模生产品（mass production）之时期，不能不划定商货之品类（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s），学问既然成为公然交易的商品，秀士，硕士，博士既为大规模生产品之一，自然也不能不“划定”一下。其实这种以学问为交易之事，自古已然。子张学干禄；子曰“三年学，不至于，未易得也”[1]。

到了这个地步，读书与入学，完全是两件事了，去原意远矣。我所希望者，是诸位早日觉悟，在明知被卖之下，仍旧不忘其初，不背读书之本意，不失读书的快乐，不昧于真正读书的艺术。并希望诸位趁火打劫，虽然被卖，钱也要拿，书也要读，如此就两得其便了。

读书与风趣

黄山谷说：“三日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是二句名言，含有至理。读书不是美容术，但是与美容术有关。女为悦己者容，常人所谓容不过是粉黛卷烫之类，殊不知粉黛卷烫之后，仍然可以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男女都是一样。我想到谢道蕴的丈夫王凝之。我想凝之定不难看，况且又是门当户对。道蕴所以不乐，大概还是王郎太少风趣。所以谢安问他侄女“王郎逸少子，甚不恶，汝何恨也？”道蕴答道：“一门叔父，则有阿大，

[1] 关于往时“生员”在社会所作的孽，可参观《亭林文集》《生员论》上中下三篇。

中郎；众从兄弟复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我个人断定，王郎是太不会说话，太无谈趣了。所以闺中日与一个虚有其表的郎君对坐，实在厌烦。李易安初嫁赵明诚，甚相得。何以？故因为志趣相同。后来明诚死于兵乱，易安再嫁一位什么有财有势的蠢货，懊悔万分。道蕴辩才无碍，这我们知道的。凝之弟王献之与宾客辩论，辞穷理屈。这位嫂子倒能遣侍女告诉小叔“请为小郎解围”。乃以青绫步障自蔽，把客人驳倒。这样看来，王郎也是一位语言无味的蠢材无疑，人而无风趣，不知其可也。

凡人之性格，都由谈吐之间可看出来。王郎太无意见了。处于今日，道蕴问他看电影，他也好，道蕴说不去，他也好。要看西部电影他也好。要看艳情电影，他也好。这样不把道蕴气死了吗？红楼梦大观园姊妹，都是在各人的说话中表达出来。平儿之温柔忠厚，凤姐之八面玲珑，袭人之伶俐涵养，晴雯之撒泼娇憨，黛玉之聪慧机敏，宝钗之厚重大方，以至宝玉之好说怪话，呆霸王之呆头呆脑，都由他们的说话中看出。你说读书所以养性也可以，说读书可以启发心灵，增加风趣也可以。只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断断不可以。

或谓清谈可以误国。我说清谈可以误国，不清谈也可以误国。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样的误国。东晋亡于清谈之手，南宋何尝不亡于并不清谈者之手？所以以亡国之罪挂在清谈上头是不对的。纣王亡于妲己，你想这个昏君，没有妲己就可以不亡吗？虐主暴君亡国，都得找一个替身负罪。由于昏君暴主政治不良，武人跋扈，像嵇康洁身自好的人犹不能免于一死。所以清谈是虐政生出来的，不是虐政由清谈生出来的。向来儒家，倒果为因，不思之甚。

论读书

本篇演讲只是谈谈本人对于读书的意见，并不是要训勉青年，亦非敢指导青年。所以不敢训勉青年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近来常听见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须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也有卖国官僚到大学演讲，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暗讽时事。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如今也一样发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料想战国的土豪劣绅亦必好训勉当时的青年，所以激起孟子这样不平的话。第二，读书没有什么可以训勉。世上会读书的人，都是书拿起来自己会读。不会读书的人，亦不会因为指导而变为会读。譬如数学，出五个问题叫学生去做，会做的人是自己脑里做出来的，并非教员教他做出，不会做的人经教员指导，这一题虽然做出，下一题仍旧非指导不可，数学并不会因此高明起来。我所要讲的话于你们本会读书的人，没有什么补助，于你们不会读书的人，也不会使你们变为善读书。所以今日谈谈，亦只是谈谈而已。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说破读书本质，“心灵”而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乎亦非读书的本旨。读书本旨湮没于求名利之心中，可悲。可惜现在也一样。

今日所谈，亦非指学堂中的读书，亦非指读教授所指定的功课，在学校读书有四不可。一、所读非书。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

书。今日大学毕业的人所读的书极其有限。然而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二、无书可读。因为图书馆存书不多，可读的书极有限。三、不许读书。因为在课室看书，有犯校规，例所不许。倘是一人自晨至晚上课，则等于自晨至晚被监禁起来，不许读书。四、书读不好。因为处处受训导处干涉，毛孔骨节，皆不爽快。且学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学，乃记问之学。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礼记早已说过。书上怎样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倘是你能猜中教员心中要你如何答法，照样答出，便得一百分，于是沾沾自喜，自以为西洋历史你知道一百分，其实西洋历史你何尝知道百分之一。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这些不必用头脑，只需强记，然学校考试极其便当，差一年可扣一分；然而事实上与学问无补，你们的教员，也都记不得。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上去查。又如罗马帝国之亡，三大原因，书上这样讲，你们照样记，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于蚊子（传布寒热症），这是书上所无的。在学校读过书者，皆当会心而笑。然想到教科书规范头脑，湮塞性灵，却又堪哭。

今日所谈的是自由的看书读书，无论是在校，离校，做教员，做学生，做商人，做政客有闲必读书。这种的读书，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人之初生，都是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点明读书要能破俗见陋习，复人之灵性。对死读书本固持陈念之人一段讥讽，令人心惊警惕。盖我们也未尝不有鄙俗之时。并且要时时读书，不然便会鄙吝复萌，顽见俗见生满身上，一人的落伍、迂腐、冬烘，就是不肯时时读书所致。所以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一人在世上，对于学问是这样的：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

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大学生自以为心理学他也念过，历史地理他亦念过，经济科学也都念过，世界文学艺术声光化电，他也念过，所以什么都懂，毕业以后，人家问他国际联盟在哪里，他说“我书上未念过”，人家又问法西斯蒂在意大利成绩如何，他也说“我书上未念过”，所以觉得什么都不懂。到了中年，许多人娶妻生子，造洋楼，有身份，做名流，戴眼镜，留胡子，拿洋棍，沾沾自喜，那时他的世界已经固定了：女子放胸是不道德，剪发亦不道德，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读《马氏文通》是反动，节制生育是亡种逆天，提倡白话是亡国之先兆，《孝经》是孔子写的，大禹必有其人……意见非常之多而且确定不移，所以又是什么都懂。其实是此种人久不读书，鄙吝复萌所致。此种人不可与深谈。但亦有常读书的人，老当益壮，其思想每每比青年急进，就是能时时读书所以心灵不曾化石，变为古董。

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黄山谷谓人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须知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很多，不但商界政界如此，学府中亦颇多此种人。然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官僚商贾则无妨，在读书人是不合理的。所谓面目可憎，不可作面孔不漂亮解，因为并非不能奉承人家，排出笑脸，所以“可憎”；胁肩谄笑，面孔漂亮，便是“可爱”。若欲求美男子小白脸，尽可于跑狗场、跳舞场，及政府衙门中求之。有漂亮脸孔，说漂亮话的政客，未必便面目不可憎。读书与面孔漂亮没有关系，因为书籍并不是雪花膏，读了便会增加你的容辉。所以面目可憎不可憎，在你如何看法。有人看美人专看脸蛋，凡有鹅脸柳眉皓齿朱唇都叫做美人。但是识趣的人若李笠翁看美人专看风韵，笠翁所谓三分容貌有姿态等于六七分，六七分容貌乏姿态等于三四分。有人面目平常，然而谈起话来，使你觉得可爱；也有满脸脂粉的摩登伽，洋囡囡，做花瓶，做客厅装饰甚好，但一与交谈，风韵全无，便觉得索然无味。“风韵”二字读书而来。性灵可决定面目，此处也说的这个道理。黄山谷所谓面目可憎不可憎亦只是指读书人之议论风采说法。若浮生

六记的芸，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男子也是如是看法。章太炎脸孔虽不漂亮，王国维虽有一条辫子，但是他们是有风韵的，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简直可认为可爱。亦有漂亮政客，做武人的兔子姨太太，说话虽漂亮，听了却令人作呕三日。

至于语言无味（着重“味”字），都全看你所读是什么书及读书的方法。读书读出味来，语言自然有味，语言有味，作出文章亦必有味。有人读书读了半世，亦读不出什么味儿来，都是因为读不合的书，及不得其读法。读书须先知味。读书知味。世上多少强读人，听到此语否？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有人自幼嚼书本，老大不能通一经，便是食古不化勉强读书所致。袁中郎所谓读所好之书，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这是知味的读法。若必强读，消化不来，必生疳积胃滞诸病。

口之于味，不可强同，不能因我的所嗜好以强人。先生不能以其所好强学生去读。父亲亦不得以其所好强儿子去读。所以书不可强读，强读必无效，反而有害，这是读书之第一义。有愚人请人开一张必读书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殊不知读书须求气质相合。人之气质各有不同，英人俗语所谓“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因为听说某书是名著，因为，要做通人，硬着头皮去读，结果必毫无所得。过后思之，如作一场噩梦。甚且终身视读书为畏途，提起书名来便头痛。小时候若非有随时扔掉不喜之书之权，亦几乎堕入此道矣！萧伯纳说许多英国人终身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塾师强迫背诵种下的果。许多人离校以后，终身不再看诗，不看历史，亦是旨趣未到学校迫其必修所致。

所以读书不可勉强，因为学问思想是慢慢胚胎滋长出其滋长自有滋长的道理，如草木之荣枯，河流之转向，各有其自然之势。逆势必无成就。树木的南枝遮荫，自会向北枝发展，否则枯槁以待毙。河流遇了矶石悬崖，也会转向，不是硬冲，只要顺势流下，总有流入东海之一日。世上无人人必读

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不得不读之书。警句。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孔子说五十可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尚不可读《易》经。刘知几少读古文《尚书》，挨打亦读不来，后听同学读《左传》，甚好之，求授《左传》，乃易成诵。《庄子》本是必读之书，然假使读《庄子》觉得索然无味，只好放弃，过了几年再读。对庄子感觉兴味，然后读庄子，对马克思感觉兴味，然后读马克思。读书要等兴味来。若有不喜欢之书，搁下几年，未尝不变做喜欢，于我心有戚戚焉。

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出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五十而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凡是好书都值得重读的。自己见解愈深，学问愈进，愈读得出味道来。譬如我此时重读Lamb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魂灵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一人背痈，再去读范增的传，始觉趣味。可是叫许钦文在狱中读清初犯文字狱的文人传记，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程子谓《论语》读者有此等人与彼等人。有读了全然无事者；亦有读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所以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一位气质与你相近的作家，作为老师，这是所谓读书必须得力一家。若单就读书，得力一家，失之于简率。然林语堂意思是要人找到师法对象，全心投入、气质浸润。此即读书以“情”读和以“智”读之区别。不可昏头昏脑，听人戏弄，庄子亦好，荀子亦好，苏东坡亦好，程伊川亦好。一人同时爱庄荀，或同时爱苏程是不可能的事。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心胸中

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George Eliot自叙读卢骚自传，如触电一般。尼采师叔本华、萧伯纳师易卜生，虽皆非及门弟子，而思想相承，影响极大。当二子读叔本华、易卜生时，思想上起了大影响，是其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之始。因为气质性灵相近，所以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流连忘返，始可深入，深入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须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这与“一见倾心”之性爱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作家，自会恨相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文学上的爱人”，奇语，但极有道理。读书若无爱情，如强迫婚姻，终究无效。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

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二字是骗人的话。苦学误人！警句。只可惜读教科书，却非苦学不可。然如能从浸润各色奇书来长己之才智，未必不能过考卷关。学者每为“苦学”或“困学”二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据说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又丫头监读法。其实都是很笨。读书无兴味，昏昏欲睡，始拿锥子在股上刺一下，这是愚不可当。一人书本摆在面前，有中外贤人向你说极精彩的话，尚且想睡觉，便应当去睡觉，刺股亦无益。叫丫头陪读，等打盹时唤醒你，已是下流，亦应去睡觉，不应读书。而且此法极不卫生，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若

已读出书的精彩来，便不想睡觉，故无丫头唤醒之必要。刻苦耐劳，淬励奋勉是应该的，但不应视读书为苦。视读书为苦，第一着已走了错路。天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汝以为苦，彼却沉湎以为至乐。比如一人打麻将，或如人挟妓冶游，流连忘返，寝食俱废，始读出书来。以我所知国文好的学生，都是偷看几百万言的三国水浒而来，绝不是一学年读五十六页文选，国文会读好的。试问在偷读三国水浒之人，读书有什么苦处？何尝算页数？好学的人，是书无所不窥，窥就是偷看。于书无所不偷看的人，大概学会成名。

有人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都是读书未入门路，未觉兴味所致。有人作不出文章，怪房间冷，恐蚊子多，怪稿纸发光，怪马路上电车声音太嘈杂，其实都是因为文思不来，写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读书，总有种种理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知等待到来年。”其实读书是四季咸宜。古所谓“书淫”之人，无论何时何地可读书皆手不释卷，这样才成读书人样子。读书要为书而读，不是为读而读。顾千里裸体读经，便是一例，即使暑气炎热，至非裸体不可，亦要读经。欧阳修在马上厕上皆可作文章，因为文思一来，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净几才可作文章。一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皆可读。而且必办到洋车上、理发室都必读书，才可以读成书。

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说回前面论点，最后一点，也即读书全部之主旨，读出自己性灵来。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自己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耘人。诗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竟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则或系汝自己学力见识未到，

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刘知几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现张衡、范晔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知几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滥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

【大师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林乐和，曾用名林玉堂、毛驴、宰予、萨天师等。现代作家、学者。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起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1923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曾因反对军阀专制，被北洋政府通缉。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职，1927年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半年后到上海，决心以写作为职业。1935年用英语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畅销。1936年到美国定居，以著作为生，主要用英语写作。1966年回台湾定居。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往事与追忆】

林语堂的梦想

◎林太乙

节选自林太乙著《女王与我》。

父亲自从二十三岁起就梦想发明一架人人无须受训练就会打的中文打字

机。关键在于重新把汉字分类——不用康熙部首——进而发明一个便利的键盘。1931年，父亲三十六岁时，他以为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从上海到美国去和工程师研究打字机的设计，回国的时候钱用光了，口袋里只有三毛钱。他没有制造模型的本钱，但是他念念不忘这个梦想。

1947年，由于他写了好几本畅销书，有了几万美元的积蓄，他以为足够制造打字机的模型，于是便开始积极进行。

问题层出不穷，每个零件都需请工程师绘图，以人工制造，开销越来越大，远超出他的估计，但是既然已经投资这么多钱，实在不能半途而废。模型造好之后，由我练习打，按照父亲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只需按三个键便可以打出一个字，比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笨重难打的打字机，实在方便得多。

父亲开记者招待会，各大报以大篇幅刊出“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消息，我们家并且一连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来参观。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

1948年，美国默根索拉排字公司和父亲签约付了父亲两万美元，取得独家研发中文打字机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内战，没有进行制造。父亲发明打字机背的一身债要许多年以后才能还清。他从不抱怨，从不后悔。“人要有梦想，才会有进步。”他说。三十年后，计算机时代开始，父亲研发的“上下形检字法”和键盘，被台湾神通公司采用为计算机输入法，父亲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父亲一直到老，心里都充满梦想，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他是最好的父亲。

【深度阅读】

《林语堂散文》，林语堂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林语堂传》，林太乙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吾国与吾民》，英文版，林语堂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生活的艺术》，英文版，林语堂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京华烟云》，英文版，林语堂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京华烟云》，中文版，林语堂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林语堂自传》，中文版，林语堂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吾国与吾民》，中文版，林语堂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生活的艺术》，中文版，林语堂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读书的习惯

人类的知识大都是从眼睛输入的，用耳朵听来的东西，毕竟有限，所谓耳食者流所得到的知识，不外乎是一些道听途说，学生治学，固然要听，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读。英国大学里有些学生终年不去听讲，学校里也让他们如此，而且多认为他们是优秀学生，考试起来果然比每天去听讲的学生成绩还要好，因为勤读胜于勤听，名师讲授，同学共享，只有自修，才是一人独得。

古今的大学者没有不勤读的，囊萤凿壁，比我们现在的一灯如豆，还要不方便得多，但学问就是这样得来。苏东坡说“读破万卷自通神”，可见学问并不难，只在多读，你如果手不释卷，必然会有成就，甚至偶然翻阅，也就开卷有益。

可是现在很少有人手上拿着书本。终日终夜不离牌桌的人，我曾见到过，废寝忘餐手不释卷的人，却尚未遇到。一般人买书，大都是拿来做装饰品的，永远陈列在书架上，很少拿到手中来读。这些书要他们去读，条件很多，第一得有明窗净几，其次得有清闲，再次得有心情；地方不好不能读书，时间不长不能读书，心情不定也不能读书。懒学生还有一首解嘲的打油诗：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很好眠，秋多蚊虫冬多雪，一心收拾到明年。

阔公子有了明窗净几，又有的是清闲，但还是不能读书，因为他没有那种心情；穷小子终日忙于做工糊口，也没有时间读书。军人忙于打仗，商人忙于赚钱，政客忙于应酬，男子忙于做事，女子忙于说话，少年忙于寻乐，老人忙于怀旧，甚至闲人也忙于逛街，或坐茶馆，或凑热闹，似乎谁都不能读书。其实，他们并不是不能读书，而只是不去读书罢了。要读书谁都可以读，决不受任何限制，读书的条件，就在养成读书的习惯，其余皆不足道。

一般人为着生活关系，没有充分的时候去读书，这也是实在的情形。除了少数有闲阶级的阔人以外，谁都不免要为名利，或至少为衣食而终日奔走忙碌，如果一定要等到把生活问题解决了，闲居无所事事，然后再来从容读书，这无异待河之清，可说永远无此机会。因为人的欲望无穷，等到生活问题在布衣粗食之下可以解决的时候，他又想到美食暖衣，朱门绣户，即令有了丰衣足食，华屋良田，他仍然不肯罢休。所谓水涨船高，生活的标准既然随时有变，这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了。我认为要读书决不可等待那种无尽悠闲的到来才开始，应该随时随地利用空余的时间来读，把那种读书的习惯，织入我们的生活中去，作为我们日常工作的调剂品，那么，事也做了，书也读了，一点光阴也没有虚掷。

你不要以为五分钟做不了什么事，把一百个五分钟集起来，就差不多等于一个整天。我尝听见善于治家的人说，爱惜厨房里一粒米，就可以成为一笔家产。我们利用五分钟的余暇去读书，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

利用余暇去读书是轻而易举的，大家之所以不这样做，仅是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已。英国人在电车上读书的风气很盛，每天都要出外工作，起码有一个钟头在电车上，预备一本书专门在车上读，不过几天也就读完了，日积月累，一年读四五十本书。也不算稀奇。我们对于这种废时不去利用，实在未免可惜。

英国人利用废时读书，不仅在有规律的电车上，即在饭馆菜馆中亦莫不为然。至于在休假日，夫妇约好同出游玩，丈夫至多取一根手杖就可以出

门，太太则不免要去戴顶帽子。可是每当那丈夫在楼下等着太太去戴帽子的时候，他照例翻开一本书来读，等他太太把帽子戴好姗姗地走下楼来，他手中的书，也就起码读完两章了。中国的丈夫却不晓得这样做，所以在楼下不仅独自等得心焦，而他太太一再地被他催促，也就老不耐烦，常常把一个快乐的计划，弄成不欢的结果。

如果大家都有了这种读书的习惯，不仅国民的知识可以逐年提高，而且闲事也就不会有人爱管了。枕边有一本书，可以免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苦，厕上有一本书，也就可以辟除恶臭。

我常想洋车上是一个很好读书的地方，拉到了车夫自然会停下，不像乘电车一不当心就驶过了目的地。可惜我现在只能走路，没有乘洋车的福分了，每天白白地在街上糟蹋了一两个钟头。哦，如果我能利用这种时间读书的话……

【大师简介】

钱歌川（1903—1990），原名慕祖，自号苦瓜散人，又号次逖，笔名歌川、味橄、秦戈船。著名散文家、翻译家、语言学家。1920年赴日留学。曾任《中华杂志》主编。1936年入英国伦敦大学，1939年回国后任武汉、东吴等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同盟国军队驻日代表团主任秘书。1946年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就教于台湾成功大学、海军军官学校、新加坡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

【往事与追忆】

请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太太

◎钱歌川

节选自《钱歌川谈学英文》。

我学英文，约莫经过三个时期。即国内的初学时期，日本的阅读时期，和英国的写作时期。在国内我进过好几个教会办的小学和中学，得益最多的，是在长沙的青年会中学，教我的英文的，是一个叫做费雅的英国人，他每个星期要我写一封英文信给他，又常常把一个个的学生叫他房间里去会话。所以我初到日本的时候，觉得说日文真难，要说英文反而容易。可是在日本住上六七年下来，永远见不到一个西洋人的影子，我口头几句似通非通的英文，便于不知不觉之中，被费雅索回去了。

记得有一位初到伦敦的朋友，得到了他房东的同意，每天同吃过晚餐以后，就和他谈半个钟头的话，他很得意地把这种交涉的成功，逢人便说，使我们大家都羡慕他的好运，难得遇到那么好的一个房东，可是一个月之后，他除了房金伙食的账目，另外还接到一张账单，上面开的是谈话费若干镑。

我房东太太和我很少接触。我所交际的，都是外面的人。我知道英国的男子大都是很忙的，你出上半镑钱一个钟头请他教你会话，毕竟得不偿失，最好找一个女朋友，英国在上次战后，人口中女子多于男子一百万，没有机会结婚的女子到处都是，她们比较有闲，而且极愿意与男子交际，认识之后，她可以时常和你往来，目的并不在钱。男女间既有一种吸引力，自然更容易接近。

我经朋友介绍，结识了一位刚从英国皇家美术学校毕业的女画家。初期不过是请吃茶，同去参观画院而已。后来熟了，不仅在茶室中两人可以闲谈一个下午，甚至常同出野外郊游，可以一道玩。在那些时候，说话的机会

既多，而且无所不谈，范围又广，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博物院出来，来吃茶点，叫来的点心，似乎太少，我说不够吃，她就笑我“眼大肚小”。（这句英文你如果还不晓得的话，请来问我好了）像这一类的俗话，是教师们怎也不会教你的。

有时她到海滨小住，也打电报来约我去玩一天。她在车站上接到我后，我们便沿着海边慢慢朝市里走去，一面闲谈一面拾海螺壳，把时间置之度外。等我们达到她预先约定的吃午饭的地点时，她的女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有位我也很熟的小姐，故意把手遮在眼睛上，做着寻找的姿势向着我们问：“他们哪里去了？”而我的那位朋友也不甘示弱，马上反唇相讥，大家互相开着玩笑。我觉得很难为情，她们则满不在乎。原来在她们，就是恋爱也不妨公开的呀。

当日洗了一回海水浴，我们便去游山，走到青草原上，云雀在空中歌唱，蕙风吹着我们的衣，她故意让女伴走上前去，而倒下在我身边的草地上，装出一副娇慵无力的样子，终至闭上眼睛，吞吞吐吐地说出一些听不清楚的话，使得我也非把头靠拢她的唇边不可。到了这种时候，练习英文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正是莎士比亚所谓：

Love therefore， and tongul tied simplicity
In least speak most

这种令人回忆的往事，我现在只对你说，请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太太。

【深度阅读】

《钱歌川文集》（共四册），钱歌川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
《钱歌川散文选集》，钱歌川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读书漫谈

1

要建筑一所屋宇必先问建此何用。若不先明用途，专论建筑规模式样以及材料等等，便成漫无准则之空谈。读书亦应先定旨趣，旨趣未立，且莫谈方法门径书籍选材以及其他等等。

读书旨趣，大要言之，可分两途。一是为自己谋职业，寻出路，求身家温饱，乃至近而鬻名声，攫权位，皆从个人私利的立场出发。一是纯粹从一种求知的兴趣和热忱而读书。这里边又分两面，有的因自己的性情和爱好，从一种内部的要求而走向读书的路，有的因环境的问题和需要，从一种外面的刺激而走上读书的路，其实这两面往往交融互映，并不必严格分别。

以上说的读书旨趣之两途，有时亦未尝不可相通。本为个人的私利立场而读书的人，亦未尝全违背了他自己内部的性情和爱好，而且对国家社会，对其当前环境，亦未尝不可有相当之贡献。纯粹为求知的兴趣和热忱而出发的人，亦未尝不想谋一职业寻一出路，未尝不要兼顾他身家之温饱，乃至亦望享有相当之名位。然而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到底这两路，还有绝大的不同。譬之建筑屋舍，一为旅馆，一为家宅。家宅未尝不可权当旅馆用，而旅馆未尝不可权做家宅用，然而到底性质不同，利弊迥异。至于目前一股读书

风气，究竟多半是为的盖旅馆，抑是盖家宅，则最好由各人自己反省，自己批评，自己认识。

2

论语上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家宅是为自己的。旅馆是为人的。为己的并不是为私，为人的并不是为公。从为己为人的心理差别，可以影响到他读书的态度形成绝大的乖离。

大抵为人之学，必求炫耀，必求迎合，必求卖弄，必求趋奉。读者心理的尊严，不在所读书中之真理，而在外面的时风众势，或是某些有力者之影响。因此读者对其书本的态度，常易陷于轻率而且傲慢，其为学必为浅尝，必求速成，必喜标新立异，必务独创己见。为己之学，则由自己性情所爱好及自己环境所刺激而感发。他既本于自己的真性情而欲对于环境求一种真知识，真了解，因此他心上的尊严，不在外面世俗上，而在他所追求的真理上。这样的读者，其开始一定沉潜，不喜炫耀，不务卖弄而刚毅，不求迎合，不乐趋奉。有一些严肃而谦恭而态度不轻率不傲慢，其成就则必深远不甘浅尝不期速成而真实。确乎有所自得，不为时风众势所摇，不为一二有力者所束缚驰骤而可以贡献于社会。而别人误认他的，还以为他亦是一个标新立异务创己见的人。

3

论语上又有一段孔子批评阙党童子的话，说他是“欲速成”者，非“求益”者。大凡读书亦有此两个很显著的分别，一是求益，一是欲速成。

欲速成的便不想再求益，读书只是求速成的凭借。他选择书本的标准和读书的方法，绝与志在求益者不同。与其读人人共读的书，不如读人人不读的书。人人共读的难于凌驾，人人不读的易于创辟。因此与其读《论语》

不如读《墨子》。并不是为他不愿请益于孔子而喜请益于墨子，只为《论语》人人共读，读了还是和人一般，难于表见自己的学问，《墨子》别人不注意，读了可以成名可以立业。最好是专注意于墨子书里别人都讲不懂的处所如《墨经》等篇，而由我讲懂了，岂不即此成名。于是渐渐造成喜艰僻不喜平易的心理。又渐渐造成喜欢寻疮摘疵的心理。最先是指摘后人注释的差误，以后是攻击著书人的不是。还借着怀疑批评种种好名词，来掩饰他求速成的坏心理。

文学艺术上的欣赏，无异于是再度的创造。哲理教义上的领会，也不异乎是再度的发明。我们不能希望人人成为哲学文学艺术家，但是可以希望人人领会哲学欣赏文艺，而社会全体之素质亦随之升进。只要求速成的学风一旦弥漫，文艺哲理的书籍，全变成读者求速成之工具。于是欣赏与领会，退处于不重要的地位，而学术上主要的工作，乃是些校勘训诂考订和辩难。更甚者则文艺必谈创作，哲理必谈发明。会场上的听众，各自急于要发表自己的音乐技能，而台上的乐师遂至于无技可奏。这便是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而创作发明等等一套好名词，还只是用来掩饰他而求速成的坏心理。

4

以上两节词锋所相通，似乎偏指关乎人文科学方面的现象而言，其实自然科学方面事无二致。只要你真是发乎性情之所爱好，为研究真理而走向自然科学的路径，则将及理亦来学成致用，职业即为性情之发舒，工作便是真理的实验。自然孜孜不倦，日寻向上。至少一种不苟且不敷衍的精神，可以常持不失。否则科学亦只是一块敲门砖，往日所探究的自然界的真理，现在依然是一种谋个人出路的手段和工具。私人的温饱，可以借着他的职业而蒸蒸日上，社会福利却不一定能借着他的工作而逐渐发展。一开始便立意要造一所旅馆的，到底造不出一座安稳而舒适的家宅。

5

学问之道，本已千门万户，累层曲折，涂辙纷歧。而学者心术之隐微，更难明指确说。又且一时有一时之风尚，在当时必有为他们的风尚辩护的一套理论。此种理论，亦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饮水冷暖，究竟各人肚里得知。本文粗引端绪，敬劝读书人本为己之旨，具求益之忱，莫误认别人盖的旅馆当做自己家宅。好学深思考自能从此籀绎。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风气固束不住人之生机也。

【大师简介】

钱穆（1895—1990），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九岁（1904年）入私塾，熟习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十三岁（1908年）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厦门、无锡、苏州等各地中小学。1930年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7年新亚书院被香港政府收归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往事与追忆】

国民必知

◎钱穆

摘自钱穆著《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深度阅读】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4年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

《国学概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
《人生十论》，钱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晚学盲言》，钱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下册），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
《灵魂与心》，钱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化与教育》，钱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史记地名考》（上下册），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论语新解》，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国史新论》，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湖上闲思录》，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秦汉史》，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孔子传》，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庄老通辨》，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中国史学名著》，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黄帝》，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古史地理论丛》，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中国文学论丛》，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新亚遗铎》，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我的爱读书

我读过不少的书，虽然在古今中外的书堆里，这所谓“不少”也者，还不过是大海中一点浪花，但在我自己的记忆中，这也不算是个小数目了。在这不少的书中间，本刊编者要我举出我所最爱读的书名来谈谈，这却很难说了。在我的记忆中，可能有些爱读的书，但哪一本是我“最”爱读的，这个选择却无从效命了。

现在，让我来拟定几个标准：一、如果说，凡是读的遍数最多的、就是最爱读的，那么，我应当举出《水浒传》来，这是小时候炒过七八遍冷饭的（吾乡俚谓重读旧书曰炒冷饭）。然而论语，史记，诗经，楚辞之类，我也何止看过七八遍，到如今我并不以为那是最爱读的书。所以这个标准靠不住。二、如果说对我印象最深的书就是最爱读的书，那么，我应当举出赵景深译的《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和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来，但我并不觉得对它们有多大的“爱”。三、如果说，我常常带在身边的书就是我最爱读的书，那么，我应当举出一部《词林记事》来，但是，一部《康熙字典》也同样地跟了我二十年，你以为我最爱读《康熙字典》吗？

我想，最好让我来谈谈我所爱读的书，如果编者更宽容一些，最好把一个“读”字也删掉。真的，有些书是我所爱的，但并不是为了读。不过，现在是在“读”的范围之内，找寻几种可以说是我所爱的，先从诗说起。Loeb

典丛书里的《希腊诗选》、Palqrave的《英诗金库》和Monroe与Henderson合编的《新诗选》，这三本都是好书，可以说是我所喜欢的，也是随时翻读的。我常常想在中国诗选中找三本能够抵得过这三本外国诗的，诗经勉强可以抵得了《希腊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加上徐陵的《玉台新咏》只好抵《英诗金库》的半本，唐以后诗的选本就没有可以满意的了。况且我们还有词，而词的选本也着实不容易推举出一种满意的来。至于现代的新诗，可怜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赶得上《新诗选》十分之一的选本。

在小说这方面，我喜欢梅里美的《嘉尔曼》（近来有人译作卡门，我很厌这两个字），高莱特的《米佐》，安特森的《俄亥俄州温斯堡小城的故事》，以及上文曾经说起过的柴霍甫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还有耿济之译的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漫记》。我不很喜欢长篇小说，所以这里开列出来的都是中篇和短篇。在中国小说部分，《水浒传》以外，当然应该推举《儒林外史》了。但这两本书对于我的兴味，实在还赶不上《清平山堂话本》。

关于散文的书，我想提起的只有两本外国人的著作，而且都是英国人的。一本是乔治·吉辛的《亨利·雷克洛夫随笔》，现在我们有了李霁野的译本，题名《四季随笔》（台湾省编辑馆印行）。另外一本是小说家莫姆的《西班牙印象记》，这不是莫姆的代表作，许多人几乎忘记了有这么一本书，但是我却觉得它挺好。在中国古典方面，我以为《洛阳伽蓝记》是第一本散文，以下就得推到宋人的许多题跋了。李笠翁的《闲情偶寄》可取得者不过十之一二，鼎鼎大名的《浮生六记》我却不敢恭维，觉得苏州才子气太洋溢了。近人著作则沈从文的《湘西》与《湘行散记》都不错，但这两本关于湘西的散文实在抵不上作者的一本小说《边城》。废名的《枣》倒是一本极好的散文，虽则人家都把它算作小说。梁遇春的《春醪集》，我们也不应该让它被冷落下去，它可以与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并读。这两本都是英国式的散文，在冲淡和闲雅这一点上，钱君似乎犹去梁一间。

以上所提的书，可以说是我的爱读书的一部分。也许还只是一小部分。

偶尔拈得，略叙如此，并非敢在作者之林中，把其余一切好书都抹杀者。在我个人，“爱读书”与“爱的书”之间，我的感情还是特别爱好着那些“爱的书”。将来有机会，也许会在本刊上与读者诸君谈谈我那些极爱好而并不为了读的书籍。

【大师简介】

施蛰存（1905—2003），生于杭州，随父母旅食苏州。原名施青萍，笔名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辛亥革命后，又迁居松江，一住三十年，遂为松江人。我国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往事与追忆】

回忆施先生

◎陆灏

节选自陆灏著《施先生解脱了，他说寿则多辱》。

我与施蛰存先生交往了十三年，第一次看到施蛰存先生是在1990年，首次接触，感觉施先生就像祖父，非常和善，可以很随便地与他聊天。施先生每次待客的时间都是下午，一推开门，就会闻到雪茄味，这时就知道他已经起床，在看报纸了。

施先生是一位豁达的人。他曾有一幅张大千的山水画，后来有一个学生从香港过来，对施先生说要把画拿到香港去拍卖，后来，这个学生和这幅画就一起消失了。人们知道后都觉得很可惜，说这幅画肯定能卖不少钱，而施蛰存先生却说：“没有关系，大不了就是一张纸。我们都是经历过各种战争

的，那时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贬值：大米和黄金，其余的满地都是，尤其是书和字画。那时人们要捡，遍地都是。”

几年前，施蛰存先生得到了上海市的一个终生成就奖，他坚决不要，他说：“给奖就是为了鼓励人们多做事，我已经做不动了，所以奖应该给那些年轻人。”施先生很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喜欢听到新鲜事情。

施蛰存先生送了我很多他喜欢的书，其中包括一些外文书，他说那都是自己想翻译的，希望以后能有人做这件事。施先生说自己的书坚决不会送到图书馆。“那就打入冷宫了，”施先生说，“你喜欢的你留下，不喜欢的就卖了，有人买我的书，说明他们喜欢。我的书不要送到图书馆。”

施先生老了也不糊涂，他说不做的就不做，例如他说不上电视，绝不献丑，有一个电视节目做他的专题，曾请他在电视上露下脸，他回绝了，说绝不献丑。

施先生晚年时开始收藏书、碑帖和一些瓶瓶罐罐，还专门弄了一个玻璃橱窗，在他给我的信中经常写到自己的生活很忙碌。每次我给他讲哪些老人又去世了，他就感叹说“要死要死”（要命要命），与他同龄的只有巴金先生了，所以他其实很寂寞。以前的施先生很乐观，人们说像他那样年轻时身体并不好，1985年又患了癌症的人，能够长寿就是两点，一是不怕死，很豁达，二是求生欲很强，生活态度非常积极。但今年春节初二，我去看他。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说自己脑子不行了，心脏、脚都不行了，现在也只能等死了，他那样说让人听着感觉很伤心，那天走时我给他的纸条上写道“下回来看你”，他在下回两个字下面打了个问号。

施先生的去世对我们来说是种损失，是件悲伤的事情，但在他应该是种解脱，因为他说寿则多辱。

【深度阅读】

《沙上的脚》，施蛰存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施蛰存小说选》（英汉对照），施蛰存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北山四窗》，施蛰存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北山谈艺录续编》，施蛰存著，文汇出版社，2001年
《施蛰存日记》，施蛰存著，文汇出版社，2002年
《施蛰存散文选集》，施蛰存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金石丛话》，施蛰存著，中华书局，2005年



说读书之重要

1

学问之道，本不限于读书。德性的修养，内心的开悟，是一种学问。这并不必须要读书。所以，不认字的武训，可以成圣成贤；不识字的慧能，亦能悟道。艺术的创造，诗歌的写作，亦是一种学问。然天才的艺术家与诗人，亦可不必读许多书，识许多字。如八指头陀作诗中有酒壶，写不出壶字，即画上一酒壶，仍不碍其为一绝代的诗人。此外办事才能的训练，人情世务的历练洞达，亦并非必须多读书。科学上的观察实验，为求科学真理之要道，此亦不是读书。听人演讲，与人讨论学术，亦是造学问，而非读书。而且，我们还可说，一切对自然宇宙对人生社会的知识，最初都是由人之仰观俯察，思想反省而得。所谓“尧舜以前，更读何书？”当初原只有自然宇宙人生社会一部大书。我们所谓书，乃人类思想文化已发展至某阶段才有的后起之物。则“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呢?

2

但是，我们须知，我们不是尧舜以前。我们是生于已有书的时代之后。我们既生于有书的时代之后，我们就必须要由读书以了解人类文化，通过人

造的书之了解，去进一步求更了解自然宇宙人生社会那部大书。武训、慧能、八指头陀固不识字或未读多少书，但是我们仍只可由书上以知武训、慧能与八指头陀。已往的人，如何训练其办事才能，如何历练人情，洞达世务，与科学的观察，实验之报告，哲学思想之纪录，亦大多皆载在书中。如果你有特殊办事才能，或对自然宇宙人生社会有特殊的观察实验及思想，你亦必将希望写成文字，著成书，以行远而垂久。由此便知，书籍虽是后于人类文化而有，然而都是人类文化之镜子。人必须要从此镜子中，才能了解整个人类文化之大体，而由自然世界走入人文之世界。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3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读书，只凭我们之天赋的聪明智慧或思想能力，真可直接去读自然宇宙人生社会这部大书，而自己读出其深微广大的意义来。这部大书，似易懂而实难。其所以似易懂，是因为我们自己心灵的聪明智慧思想能力，亦可说是一面镜子，因而对此大书之内容，总能照见一些。其所以实难，是因这本大书，早经无数古往今来的有更高聪明智慧思想能力之人读过了，经无数更好的心灵之镜子照过了，还未照清楚而读懂哩。

4

然而书籍之为一镜子，却是一大镜子。从此大镜子中，可以了解整个人类之文化之大体，亦即可以了解古往今来无数有聪明智慧与思想能力的人其心灵之镜中所照见的世界中之事物与真理。读书，即是把我们的小镜子，面对书籍之大镜子，而重加反映古往今来无数聪明智慧的心灵，所已照见之世界中之事物与真理，于我们之小镜子中。

一个心灵之镜子，照不见的事物与真理，另一心灵之镜子，可以照见。如果我们能通过书籍，而将无数的心灵之镜子所照见者重加反映，我们不是

更能了解自然宇宙人生社会这部大书，而把我们之小镜子亦变成大镜子一般了吗？这是从读书以增加思想之广度上说。但是更重要的是：只有读书才可以增加我们思想之深度。

5

读书之可以增加我们思想之深度，这可以读者与著者之心灵之镜的光明，互相渗透，则光之强度增加，来作比喻。但最好是以不同凹凸之度的镜子互相反映，则可看见我们原看不见之事物作比喻。我们都知道显微镜与望远镜之所以能使人看见更细微更深远之事物，乃由于利用凹凸镜之互相重叠，乃能使光线深入事物内部，将事物内部之情形清楚地反映出来，为我们所见。但是我们常不知读书正使我们心灵自身化为重叠凹凸镜之一，而使我们之聪明智慧的光辉，能照察到更细微更深远的自然宇宙人生社会之事物与真理者，由此才培养出我们思想之深度。

直接单纯的一个思想，从来不会深的。只有对一个思想再加思想，才能使思想深。读书即是在思想古往今来的他人的思想。人只有走过他人所已走过的，才走得远。人亦只有思想过前人所思想的，才能思想得深。我思想前人的思想，而前人的思想，又是思想更前之人的思想来的。人类的文化史与思想史是无尽的后代人对于以前人之思想再加思想之成果。当人思想前人所思时，其心灵是凹镜。凹镜聚合一切来的光线。当人表出其思想，留给后人交与他人时，其心灵是凸镜而分散出光线。重重叠叠的心灵之凹凸镜之互相反映，形成人类之思想史与文化史，人乃对自然宇宙人生社会中之真理一步一步，更能达微显幽而极深知远。人不经显微镜与望远镜，只凭肉眼，莫有人能了解细胞之构造，亦莫有人能看清天上的星云。人不多读书，只凭自己一点聪明智慧去判断自然宇宙人生社会，又如何能达于细微深远之事物与真理。所以不多读人所著的书，而以直接读大书自许，这只是学人的懒惰，必

将误人误己。

好多年来，因中国社会急遽变化，许多人主张读书不是学问中最重要的。所谓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诚然有毛病。但是不读书而只自恃聪明智慧以思想一切，判断一切，亦恒不免肤浅。这样虽未必死，但亦是不能真活的。必须要以自己之活的聪明智慧与书中人聪明智慧合起来。书活了，我自己亦才真活了。

【大师简介】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著名学者，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江南大学。1949年到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并兼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1958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受聘为该校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

【往事与追忆】

新亚书院

节选自《文化巨人——唐君毅》，作者不详。发表人“第三种可能”，来源国学网。

1949年10月，为了给离开大陆到香港的青年学子以继续学习的机会，唐君毅应钱穆之倡，会同张丕介、程兆熊诸君在香港创办文商专科夜校。次年10月，改夜校为日校，并将校名改为“新亚书院”，寓“重新赋予亚洲以新

生命”之意。钱穆明确提出书院的宗旨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显然，新亚书院无论在教育宗旨还是在方法上，都力图把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学院教育结合起来，目的在于把对学生道德理想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训练结合起来。

新亚书院创建初期，条件极为艰苦，仅有极简陋之教室两间，别无其他任何校舍及办公设施，但创始诸君以“延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怀横通天下、纵贯百世之心，起振衰扶危之志，布衣竹伞，筚路蓝缕，全不计个人得失，表现出了艰苦卓绝的精神。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日益光大，成就渐为世所瞩目，其精神更为世所钦佩。后来终于得到美国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捐助合作，使新亚初具规模，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新亚书院是唐君毅后半生倾心倾力之地。创院之初，他即担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并倡导设立文化讲座，除他亲自主讲外，还多方延请文化学术界之名宿担任，前后四五年，达139次之多，成为新亚独具特色的教学形式。作为新亚的创始人，唐君毅的目的绝不仅在一般性的办学育人，而是意在将新亚办成一座弘扬中华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堡垒，因此，他极为重视新亚的教育方针。并极力塑造一种新亚精神。他在1952年发表的《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亚精神的中心主旨是“讲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其精神理想在于“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为神奇，予一切有价值者皆发现其千古常新之性质；一方再求与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学相配合，以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也就是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以弘扬和创新中国文化为最高理想。正因为此，新亚同学都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钱穆为“圣人”（孔子），唐君毅为“亚圣”（孟轲）。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西方文化居统治地

位的香港，唐君毅更有切肤之感。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凭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态度，动心忍性，以传教士般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维护、弘扬中国文化。多年来，他履艰忘危，居约事大，宠辱两忘，专志于新亚之建设与发展。1963年9月，为满足香港华人社会之需要，经香港政府批准，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和教会办的崇基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经过唐君毅的据理力争，新成立的中文大学实行联合制，使各成员学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新亚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精神也得以保持。唐君毅被聘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还被选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67年又受聘为新亚研究所所长。然而，中大成立后不久，其措施即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贯精神渐生抵触，相去日远，致使新亚又陷入新的艰危困顿之中。为了维护新亚传统，保持新亚行政和教学的独立性，唐君毅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致与中大当局屡生龃龉，矛盾日深。其间，钱穆因不满于中大当局的百般刁难而愤然离港去台。张丕介亦因新亚理想受挫而忧伤成疾，不久即去世。当时，另一位新儒家重要人物徐复观曾著文说，新亚是凭着钱穆的名望，唐君毅的理想和张丕介之顽强精神来支撑的，而如今一去一逝，遂使唐君毅陷入孤立无援，独撑危局的苦境。1973年，中大当局一意孤行，宣布废弃联合制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权制，完全违背新亚书院加入时的初衷。为此，新亚研究所在1975年正式宣布脱离中文大学而独立，唐君毅继续担任所长，决心“将新亚精神带出中大”。1976年12月，因反对中大改制彻底失败，新亚书院董事会钱穆、唐君毅等9人联合发表辞职声明，宣布退出董事会，唐君毅还在刊物上撰文斥责香港政府“背信食言”，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深度阅读】

《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唐君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人文精神之重建》，唐君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人生之体验》，唐君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人生之体验续编》，唐君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1—2册），唐君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青年与学问》，唐君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1—2册），唐君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唐君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哲学概论》，唐君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人生三书》，唐君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唐君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唐君毅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2册），唐君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谈谈怎样读书

首先谈读什么书。

中国的书是很多的，光古书就浩如烟海，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读书要有选择。清末张之洞写了一本书叫《书目答问》，是为他的学生写的，他的学生等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他说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给这些学生指出一个门径，从何入手；第二个目的是要他们选择良莠，即好不好，好的书才念，不好的书不念；第三个目的是分门别类，再加些注解，以帮学生念书。从《书目答问》看，读书就有个选择的问题，好书才读，不好的就不用读。他开的书单子是很长的，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把他提到的书都读过也不可能，今天读书恐怕要比《书目答问》提出的书少得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此，选择书很重要。不加选择，如果读的是一本没有用处的书，或者是一本坏书，那就是浪费时间。不只是浪费时间，有时还接受些错误的东西。到底读什么不读什么？这要根据各人的专业来定。如对搞汉语史的来说，倘若一本书是专门研究“六书”的，或者专门研究什么叫“转注”的，像这样的书就不必去读，因为对研究汉语史没什么帮助。而像《说文段注》、《马氏文通》这样的书就不可不读了。因为《马氏文通》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语法书，而读了《说文段注》，对《说文解字》就容易理解多了，这对研究汉语史很有帮助。读书要有选择，这是第一点，可以叫去粗取精。

第二点叫由博返约。对于由博返约，现在大家不很注意，所以要讲一讲。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别的书我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陷在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这题目也相当尖，但只写论文了，别的书都没念，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将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搞汉语史的，除了关于汉语史的一些书要读，还有很多别的书也要读，首先是历史，其次是文学。多啦，还是应该从博到专，即所谓由博返约。

第三点，要厚今薄古。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前人的书，如果有好的，现代人已经研究，并加以总结和发挥了。我们念今人的书，古人的书也包括在里边了。如果这书质量不高，没什么价值，那就大可不念。《书目答问》中就提到过这一点，张之洞说，他选的大多是清朝的书，有些古书，也是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比如经书，十三经，也是经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从前，好的书经清朝人整理就行了，不好的书，清朝人就不管它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意思。他的话可适用于现在，并不需要把很多古书都读完，那也做不到。

再谈谈怎样读书。

首先应当读书的序例，即序文和凡例。过去我们有个坏习惯，以为看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其实序例里有很多好东西。序常常讲到写书的纲领，目的。替别人作序的，还讲书的优点。凡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些都很好，我们却常常忽略。《说文段注》的序是在最后的，我建议你们念《说文段注》时应该把序提到前面来念。《说文序》，段玉裁也加了注，更应该念，《说文段注》有王念孙的序，很重要。主要讲《说文段注》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作者讲究音韵，掌握了古音，能从音到义。王念孙的序把段注整部书的优点都讲了。再如《马氏文通》的序和凡例是很好的东西，序里有句话："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他上面讲到了字形常

有变化，字音也常有变化，只有语法自始至终是一样的。当然，他这话并不全面，语法也会有变化的，但他讲了一个道理，即语法的稳定性。我们的语法自古至今变化不大，比起语音的变化差得远，语法有它的稳定性。另外，序里还有一句话："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这句话意思是说研究语法，首先要分词类，然后是这些词跟词怎么搭配成句子。语法就是讲这个东西，这句话把语法的定义下了，这定义至少对汉语是适用的。《马氏文通》的凡例更重要。里边说，《孟子》有两句话："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之"是"他"的意思，"其"也是"他"的意思。为什么不能互换呢？又如《论语》里有两句话："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两句格式很相像，为什么一句用"之"，一句用"焉"？《论语》里还有两句话："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则未之学也。"这两句话也差不多，为什么一句用"矣"，一句用"也"呢？这你就非懂语法不可。不懂，这句话就不能解释。从前人念书，都不懂这些，谁也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来，更不知怎么解答了。这些问题从语法上很好解释，根据马氏的说法，参照我的意见，可以这样解释："亲之欲其贵也……"为什么"之"、"其"不能互换，因为"之"只能用宾语，"其"相反，不能用作宾语。"之"、"其"的任务是区别开的，所以不能互换。"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为什么前一句用"之"，后一句用"焉"？因为"爱"是及物动词，"忠"是不及物动词，"爱"及物，用"之"，"之"是直接宾语；"忠"不及物，只能用"焉"，因为"焉"是间接宾语。再有，"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则未之学也。""矣"是表示既成事实，事情已完成；"未之学也"，是说这事没完成，没这事，所以不能用"矣"，只能用"也"。凡没完成的事，只能用"也"，不能用"矣"。从语法讲，很清楚。不懂语法，古汉语无从解释。他这样的一个凡例有什么好处呢？说明了人们为什么要学语法，他为什么要写一本语法书。不单是《说文段注》和《马氏文通》这两部书，别的书也一样，看书必须十分注意

序文和凡例。

其次，要摘要作笔记。现在人们喜欢在书的旁边圈点，表示重要。这很好，但是还不够，最好把重要的地方抄下来。这有什么好处呢？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一本书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不重要，你看不出来，那就劳而无功。现在有些人念书能把有用的东西吸收进去，有的人并没有吸收进去，看是看了，却都忘了。为什么？因为他就知道看，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好的，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精彩的，这个书就白念了。这些人就知道死记硬背，背得很多，背下来有没有用处呢？有些人并不死记硬背，有些地方甚至马马虎虎就看过去了，但念到重要的地方他就一点不放过，把它记下来。所以读书要摘要作笔记。

第三点，应当考虑着作眉批，在书的天头加自己的评论。看一本书，如果自己一点意见都没有，可以说你没有好好看，你好好看，总会有些意见的。所以最好在书眉，又叫天头，即书上边空的地方作些眉批。试试看，我觉得这本书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合适，都可以加上评论。从前我念过的那本《马氏文通》，上边都写有眉批，那时我才二十六岁，也是在清华当研究生。我在某一点上不同意书里的意见，有我自己的看法，就都写在上边了。今天拿来看，有些批的是对的，有些批错了，但没关系，因为这经过了自己的考虑。批人家，自己就得用一番心思，这样，对那本书的印象就特别深。自己作眉批，可以帮你读书，把书的内容人吸收进去。也可用另外的办法，把记笔记和写书评结合在一起，把书评写在笔记里边，这样很方便。准备一个笔记本，一方面把书里重要的地方记下来；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对书里的某些讲法的不同意见记下来。

另外，要写读书报告。如果你作了笔记，又作了眉批，读书报告就很好写了。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一篇很好的读书报告，就是赵振铎的《读〈广雅疏证〉》，可以向他学习。《广雅疏证》没有凡例，他给它定了凡例，《疏证》是怎么写的，有什么优点，他都讲到了。像这样写个读书报告就很好，

好的读书报告简直就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大师简介】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

【往事与追忆】

忆王力教授二三事

◎陈继礼

1977年4月，我出差东北前夕给王力教授去了封信，准备路过北京时去拜访他。28日下午我到北大燕南园六十号扣门时，是王教授夫人夏蔚霞开的门。我被引导来到书房。恰值王教授刚从卧室出来，示意让我坐下。当他知道我来自广西北海，顿时高兴起来。他说，北海这地方我还留有印象，1939年我从（越南）河内回国就是在北海上岸的，有机会我还想访问这地方。1978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他作为知名人士被邀返回故乡参加盛典，后来还到北海。我知道这次会议活动安排十分紧张，未便打扰，所以没有谋面。但万没料到，1979年1月14日，他回到首都后在给我的信

中竟说："我去北海参观时，本想打个电话给你，但手头没有你的地址。又因参观事忙，未能与你见面，请你原谅。"接信后真使我惶恐之至。

那次见面，我把新从香港辗转购得的《汉语音韵学》一书送给他。他摩挲着书本，深情地说，"这算是'正名'了"。谁都知道，王教授桃李满天下，在海外，王力学术是显学，是家传户诵的。当时就盛传他"隔海指导'国家'博士"（纽约《华侨时报》）的佳话。只是由于他"附共"，所以他的著作和署名，在翻印时都给改篡了。上述这部书曾被改名为《中华音韵学》，著者改为王协，也有改为王子武的；我送给他这本则署的是王力真名，对作者来说，这喜悦是自然的。这次我们谈得很宽。教授的平易、亲切、诚恳，使我敞开了话匣。看看时过四十分钟，我准备告辞，王教授说，还可以再坐一会，我像小学生那样率真地畅谈。我被《汉语诗律学》的博大、精深所深深陶醉。我说，记得朱自清先生说过，教授对中国语"分析得详尽，发挥得透彻"，会使柏隆菲而特等一些学者不如。要是朱先生活到今天，看到此书，一定盛赞它会使舒梦阑和万树也难攀肩背，还要再写一篇比《中国语的特徵在哪里》更长的吧？王教授破颜笑了。"实在，我写的那本小书（指朱自清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没想到佩弦先生竟为我写了五六千字的长序！而且给了那么多的鼓励和肯定。"当谈到此书出版至今，二十年仍未再版，要购买他的书十分困难时，他说，俟以后书出一定寄给我。最使我感佩的是，不论是《诗经韵读》这样的小部头，还是《汉语诗律学》那样的巨制，都是在出版（重印）后，由他亲自封签，署上"北大王力"字样寄给我的。想着他的工作已经够繁忙，像这等琐事也躬亲处理。间或，我也倚声填制寄去一些习作，王教授总是及时地逐字审正，认真答复。我在阅读《百香词谱》和《词律》时，发现《满江红》词谱的四声存有舛谬，于是比照王教授的《诗词格律》和《十讲》，不意也发现有互不一致的地方。于是冒昧请教。没想到王教授在收到我的信后，第二天即以空邮给我答复："你问及《满江红》的平仄，常以《词律》为准，《十讲》是

错误的。《白香词谱》也有误，当以《词律》为准。匆复。”

我还向他请教明人朱良知《哭海瑞》诗中第二联“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的隐喻所指，他却坦诚地表示，“我也讲不好”。像王教授这样一位著名学者，也以不知为不知，这正是他严格治学精神的真切体现。但是对于他能解答和做到的事，都尽量解答和做到。我向他请教朱良知和顾复初的生平行状，他为我查阅不少资料，还亲笔摘录了几百字寄给我。我向他索诗，也及时掷下。信中却说，“我的诗诗味不多。既蒙索阅，另纸抄两首寄上，请你指教”。一次我引述友人传诵他的两句名句：“焚心久积添膺愤，刺背深铭刻骨仇”，要求一览全璧，他很快就把这首在1965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读陈毅副总理对记者谈话有感》录出寄我。他知道我确实喜欢他的诗，也主动抄录寄来。周总理逝世周年，他写了三首绝句，是他制成后及时寄给我的。他对诗非常严格。他在悼念周总理诗中有句“负天九万上苍穹”，误写成“背天”，发现后专门为它写来一信更正。可见他着一字也是经过几番斟酌、几许推敲的！王教授是广西博白县人，弱冠去国，三十一岁就以《博白方音实验录》的论文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半个世纪以来，著述一千万字。可贵的是，这都是在本人身处困难，甚至是艰危的境况下写就的。这种坚毅刚强精神也许是初到法国求学时，在那种“被水作战”的环境锻炼出来的。所以是他在以后的人生道途上都是朝着既定的志趣，一步一个脚印地战斗着，他那诲人不倦、治学严谨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后人。

深度阅读

《王力文集》（共20卷），王力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

《汉语语法史》，王力著，商务印书馆，1989年

《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1—4册），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

《诗词格律》，王力著，中华书局，2000年

《王力古汉语字典》，王力主编，中华书局，2000年

《诗词格律概要》，王力著，北京出版社，2002年

《王力汉语散论》，王力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
《诗词格律十讲》，王力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
《曲律学》，王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古体诗律学》，王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现代诗律学》，王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汉语史稿》，王力著，中华书局，2004年
《汉语诗律学》，王力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王力等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希腊文学·罗马文学》，王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诗经韵读·楚辞韵读》，王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语言学史》，王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关于书

听出版社的人说，近年来一部销量可观的书是精装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再一打听，原来买主大多是新婚夫妇，而用途则是装饰新房。

最初听了，当然很不是滋味。倘若莎翁在天有灵，对他的遗著在80年代的中国所走的这种鸿运，必然深感痛心。可是想起另外一些只追求多少条腿和几大件的新婚夫妇来，又觉得这种雅兴未可厚非了。

小时上学走过朱门，经常看到上面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有的是逢年贴出来，更多的是红底黑字漆上去的。

所以我从小就认定“诗书”是高尚的。人不读书，就没出息。大概我母亲当年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宁可出去为人佣工，也一定要我读成书。我十来岁上母亲去世，从此就寄养在一位堂兄家。初中还没毕业，他逼迫我辍学去当邮递员。我就同他崩了。

最早读的书，往往是强迫性的。那就是上私塾时读的《大学》、《中庸》。我后来又上了教会学校，因而除了“人手足刀尺”，还有《圣经》。现在谈读书，指的当然不是这些，而是课外自选的，甚至是偷偷摸摸读的。我头一本接触的这类书是《济公传》。那真是冒了挨板子的风险，放到书桌底下或藏在被窝里读的。我喜欢那位玩世不恭的和尚的仗义，也赞赏他的滑稽。

1926年，我同新文艺作品结下不解之缘。那年暑假，我考上了北新书局的练习生。白天，我干的是校对、打包等活儿，还骑着自行车给印刷厂送稿，到作家（鲁迅、冰心、周作人、徐祖正等）府上去取稿，或面送酬金。

我应当感激北新的老板李小峰。那时他准许我下班后，晚上可以从门市部借几本书带回大兴公寓去读。我个人的读书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根本没人指导，什么《太平天国文件》、《吴稚晖文集》、《兰生弟日记》，甚至《性史》，逮着什么读什么。当然，在看鲁迅和冰心早期作品的校样时，我也一边校对一边读了。

最早指导我系统地读中外名著的，是杨振声老师。他不但教我认真地读了鲁迅、郁达夫、蒋光慈、沈从文、茅盾、叶绍钧的书，也把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介绍给我，他讲课总是慢条斯理，井井有条。一边讲，一边还在思索。而且他一向是先介绍作家生平和时代背景，然后才一本本地讲作品内容。他的讲课甚至使我对胶东口音也产生了特殊感情。

30年代初期的大学图书馆不但开架，而且开库！暑假期间，我经常成天待在燕京、清华或北图的书库里。那真可以说是徜徉于天堂。后来到了剑桥，就更便当了。书库里，一排排书架尽头，迎窗摆着一张张小书桌，桌与桌之间还隔着块木板，以免互相干扰。书嘛，随便从架子上拣。上午看不完，放在桌上，下午再看，甚至今天看不完，也可以撂在那里，第二天接着看。

参观一家图书馆，我首先要看它的卡片做法。70年代的一天，我去北图查看一位英国小说家生平的资料。拉开卡片匣，里面只插着一个分类卡："文学"。天哪！那叫什么图书馆。并不是西洋月亮特别圆，而是国外大学图书馆里，不但分类细，交叉卡也多。你找一个作家的资料，不但有专书卡，并且还有交叉卡告诉你，某部文学史或个人文集中，也有关于这位作家的一章或一节。我们的图书馆如今也有了研究员，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希望尽多地搞一些交叉卡。

有人问过我生平最喜欢哪家食堂。我想了想，还是30年代北图大楼后身的那个食堂好，饭菜可口，有两三毛钱就能吃个饱。吃完就又回书库去了。剑桥的图书馆就缺这个设备。

在“文革”后期，我因懂点外文，被编入出版界的一个翻译组。最初只是翻译上边指定的书，什么《美国海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之类。后来，领导给了我一个美差：调查国外新到的书中，有什么值得一译的。于是，经介绍，我就又进了北图的书库。那时梅绍武君正负责国外大学新交换来的书，我每次去，必在他的架子上有所发现。另外，我还同科学院的图书馆也联系上了。我总是先把那些洋书粗粗浏览一下，然后选出“可能值得一读”的对象。他们每次准许我借上十本。好在我那辆自行车前头有个筐子，后头又有架子。我把它们带回我那个用门洞改造成的斗室里，就任情地捧读起来。忘记了那时的风声鹤唳，也忘记自己那牛鬼蛇神身份。我写的“审读报告”，有的竟超出万言。因为光写评价还不够，对于所建议翻译的书，还得摘要介绍其内容。

“四人帮”倒台之前，在外贸学院任教的友人姚念庆（已殁），曾约我去他的学校作一次讲演。1977年，我又在商务印书馆的业务会议上，就这项审书业务的经验作过一次发言。当时，我已经重新被称为“同志”了，商务还在所出《译书消息》（第1期，1978年6月25日）上，把我的发言提纲刊登出来。那是1957年后，我第一回当众那么长篇大论地絮叨。最近偶然在废纸堆中发现了它。今附在本文后，作为我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点读书经验介绍。

生活中，大量的是泛泛之交，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知音。能通宵达旦深谈的，总是极少数。

书也是这样。大多只是翻翻，有些从头读到尾，而能反复精读，百读不厌的，毕竟也寥若晨星。

然而正如生活中不能没有朋友，生活中也不能没有书：那可是难以想象的悲惨境地。

书真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它能使人插翅生翼，忽而飞向远方，忽而回到古代，有时甚至把人带到朦胧的未来。忙时，你尽可能冷落它，丢在一边，它也不气恼。但它随时都准备给你快乐，尤其在你孤寂、痛苦或卧病在床时。我就是在国外病榻上接触《好兵帅克》这本书的。它使我忘记了病痛，捧着那本书兀自笑个不停。于是，那个捷克丘八在我心目中就成了个洋济颠。

我最早接触的外国小说家是新西兰的曼殊斐尔（即曼斯菲尔德）。我是通过在北新当学徒的职业关系遇到她的。那时李小峰老板派我去北大红楼图书馆抄录徐志摩译的曼殊斐尔小说。说来这应属于“强迫性”的读书。然而她那些悲恻感人的故事拨动了我幼小的心弦。我不时地随抄随呜咽，泪水沾湿了面前的稿纸。至今我还保存着1927年李安宅兄送给我的那本英文原著：曼殊斐尔的《稚气集》（伦敦康斯贴勃公司1924年版）。

我最怀念老北京的东安市场、隆福寺以及厂甸的旧书摊，正如我怀念剑桥市中心广场那家“大卫书摊”。怀念，是因为如今它们都已消失了。在东安市场买书，还要“斗智”。书商一旦发现你看中了那本书，他必然要大大抬高价码。于是就同时从架子上取下三四本书，请他一一开价。这时就像压宝一样，他摸不清哪本是我真正看中的。等他一一报了价码之后，我才说出自己真正要买的那本。这种办法初试很灵，后来他也不上当了。凡是我挑出的书，他一律都加了码。

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编《大公报·文艺》时，收藏了足足一箱子作家的签名本。“八一三”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经香港带到汉口。后来要随杨振声、沈从文二位先生去大西南，实在搬不动了。于是就寄存在法租界的好友刘德伟家，多天真啊！随着战火的蔓延，它们自然早已化为灰烬。

最后一次浩劫，当然是1966年的8月。从那以后，我对藏书再也打不起兴致了。现在，我只求让书能尽量派上用途。80年代两次访问新加坡，他们送了我四五百本书。我都转送给汕头大学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了。

近年来台湾及香港友人陆续送我的上百种书，我也都转送给与台港文学有关的刊物或出版社了。

有一种书我是舍不得送人的，那就是工具书，不管是词典、字典还是百科全书。我把它们当做救火队。成套的书，我也保持完整，不零拆。

三十年代，曾掀起过一阵为青年开书单之风。西方文人也常喜公布自己生平所爱读的书。其中我最欣赏托尔斯泰在一封信中所开列的。

他是按一生不同时期开列的。分为：幼年至十四岁，十四至二十，二十至三十五，三十五至五十，五十至六十三岁（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时期所喜欢的书都不同，并且在每本书后面分别注上“了不起”、“十分伟大”一类评语。他小时候喜欢读童话《小黑母鸡》、青年时期爱读的书中有席勒的《强盗》，人到中年喜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英国一些不见经传的小说，晚年则喜读《圣经》、孔孟之书（“非常伟大”）和佛经。

西方读书界还经常请人开两种书目，一种是“你认为世上最坏的书”，另一种是“假若你定居沙漠，随身只准带书六册，你带何书”。这实际上就是征询最坏及最佳之作。

世界上最早焚书的是秦始皇。公元640年，埃及亚历山大被阿拉伯的统帅峨玛占领后，也烧了二十万册。接着，1497年，意大利又由于改革家撒翁拿柔拉宣传异教，而引起一次焚书，连但丁的《神曲》及薄伽丘的《十日谈》也未能幸免。

本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革”，实际上也是一次“焚书”，数量也许打破了纪录。

拿起一本书，我喜欢先看序跋，主要是为了预先知道作者的意图。一般情形下，我不赞成请旁人写序，因而对这种序读来也总有些保留。序中往往是些空洞的褒嘉之词。我平生只是处女作《篱下集》（1935），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沈从文先生写了一篇“题记”，现在已记不清是他主动写的，或商务要求的，还是我请托的了。从那以后，我的任何一本书，都未再请人写

过序。我也一向怕人找我写序。我总觉得一本书应当靠它自身的价值去与读者见面。我本人写的或翻译的书大多印有自己的序跋——尤其是1979年以后重印的。我认为不管是创作还是翻译，作者或译者都有义务向读者交代一下自己的初衷和意图。译者尤其有责任详尽地向读者介绍一下原作者的生平、艺术观点以及作品的时代背景，起码要说明翻译时的一些体会，为什么要译它。每当读大厚本的译作而不见译者任何交代时，我就觉得很是遗憾，觉得译者可能是不负责任地抓到什么译什么。

尽管最近一个时期，由于主客观原因，书市上出现了不少坏书，然而综观过去这十年，总的来看，这还是出版史上一个繁荣阶段，尤其是出了一些有益的工具书及成套的丛书。希望出版事业在90年代能进入一个更茁壮、更健康、更繁荣的高潮。

【大师简介】

萧乾（1910—1999），原名萧秉乾，化名萧若萍。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生于北京。蒙古族。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入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当研究生，进行英国心理派小说研究。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燃遍英伦，1944年放弃剑桥学位，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1945年赴美国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1954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1979年起，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职。

浪迹天涯

◎冰心

本文是冰心先生为李辉所著《浪迹天涯——萧乾传》一书写的序言。

李辉要我为他写的《浪迹天涯——萧乾传》作序。提起萧乾这个名字，我不禁微笑了，他是我最熟悉的人了！我说“人”，因为我不能把他说成是我的“朋友”，他实在是我的一个“弟弟”。七十多年以前，在他只比我的书桌高一个头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是我的小弟冰季（为楫）在北京崇实小学的同班好友，他的学名叫萧秉乾。关于他们的笑话很多，我只记得那时北京刚有了有轨电车，他们觉得十分新奇，就每人去买了一张车票，大概是可以走到尽头的吧。他们上了车，脚不着地地紧紧相挨坐着，车声隆隆中，看车窗外两旁的店铺、行人都很快地向后面倒退，同时他们悬空的小腿也摇晃得厉害！他们怕被电车“电”着，只坐了一站，就赶紧跳下车来，到家一说，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从那时起，他一直没有同我断过联系，他对我就像对亲姐姐一样，什么事都向我“无保留”地“汇报”。他说，“大姐，我又怎么怎么了”。干得出色的，我就夸他两句，干得差点的，我就说他两句。这种对话，彼此心中都不留痕迹，而彼此间的情谊，却每次地加深。他是我的孩子们的“饼干舅舅”，因为他给我的信末，总是写“弟秉乾”。孩子们不知道这“乾”字是“乾坤”的“乾”（音前），而念作“乾净”的“乾”（音甘）。所以每逢他来了，孩子们就围上去叫“饼干舅舅”。他们觉得这样叫很“亲昵”，至今还不改口！

“饼干”这个人，我深深地知道他。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会创作，会翻译，会评论，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我又深深地理解他，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他从青年时代，就到过海外许多国家，以他的才干，在哪个国家都可以很舒服，很富裕地生活下去，但他却毅然地抛弃了国外的一切，回到他热爱的祖国来“住门洞”，当“臭老九”，还遭到其他的厄运。这一切读者在《萧乾传》中都可以看到，我就不必多谈了。

他和冰季同岁，也比我小十岁，今年也八十的人了，凭他为祖国、为人民做的那些好事，他的晚景过得很称心，我十分为他欢喜。但想到能同我一齐欢喜而向他祝贺的，他的小友冰季，却已在六年前抑郁地逝世了，这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滚了下来，因为我想起龚定庵的四句诗：今朝无风雪，我泪浩为雪，莫怪浩如雪，人生思幼日！

1990年6月28日浓阴之晨

深度阅读

《北京城杂忆》，萧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好兵帅克》，雅·哈谢克著，萧乾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萧乾自述》，萧乾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
《独步世界大战中的欧洲》，萧乾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尤利西斯》，乔伊斯著，萧乾、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
《萧乾回忆录》，萧乾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
《萧乾全集》，共七卷，萧乾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牛津的书虫

牛津实在是学者的学国，我在此地两年的生活尽用于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阿克关屋（社会人类学讲室），及曼斯斐尔学院中，竟不觉归期已近。

同学们每叫我作“书虫”，定蜀尝鄙夷地说我于每谈论中，不上三句话，便要引经据典，“真正死路！”刘锴说：“你成日读书，睇读死你呀！”书虫诚然是无用的东西，但读书读到死，是我所乐为。假使我的财力、事业能够容允我，我诚愿在牛津做一辈子的书虫。

我在幼时已决心为书虫生活。自破笔受业直到如今，二十五年间未尝变志。但是要做书虫，在现在的世界本不容易。需要具足五个条件才可以。五件者：第一要身体康健；第二要家道丰裕；第三要事业清闲；第四要志趣淡薄；第五要宿慧超越。我于此五件，一无所有！故我以十年之功只当他人一夕之业。于诸学问、途径还未看得清楚，何敢希望登堂入室？但我并不因我的资质与境遇而灰心，我还是抱着读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的心志。

为学有三条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闻，三是能干。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的路向；第二是学者；第三是事业家。这三种人同是为学，而其对于同一对象的理解则不一致。譬如有人在居庸关下偶然捡起一块石头，一个思想家要想它怎么会在那里，怎样被人捡起来，和它的存在意义。若是一个地质学

者，他对于那石头便从地质方面源源本本地说。若是一个历史学者，他便要探求那石与过去史实有无关系。若是一个事业家，他只想着要怎样利用那石而已。三途之中，以多闻为本。我邦先贤教人以“博闻强记”，及教人“不学而好思，虽知不广”的话，真可谓能得为学的正谊。但在现在的世界，能专一途的很少。因为生活上等等的压迫，及种种知识上的需要，使人难为纯粹的思想家或事业家。假使苏格拉底生于今日的希腊，他难免也要写几篇关于近东问题的论文投到报馆里去卖几个钱。他也得懂得一点汽车、无线电的使用方法。也许他也会把钱财存在银行里。这并不是因为“人心不古”，乃是因为人事不古。近代人需要等等知识为生活的资助，大势所趋，必不能在短期间产生纯粹的或深邃的专家。故为学要先多能，然后专攻，庶几可以自有，可以有所贡献。吾人生于今日，对于学问，专既难能，博又不易，所以应于上列三途中至少要兼二程；兼多闻与深思者为文学家。兼多闻与能干的为科学家。就是说一个人具有学者与思想家的才能，便是文学家；具有学者与专业家的功能的，便是科学家。文学家与科学家同要具学者的资格，所不同者，一是偏于理解，一是偏于作用，一是修文，一是格物（自然我所用科学家与文学家的名字是广义的）。进一步说，舍多闻既不能有深思，亦不能生能干，所以多闻是为学根本。多闻多见为学者应有的事情，如人能够做到，才算得过着书虫的生活。当彷徨于学问的歧途时，若不能早自决断该向哪一条路走去，他的学业必致如荒漠的砂粒，既不能长育生灵，又不堪制作器用。即使他能下笔千言，必无一字可取。纵使他能临事多谋，必无一策能成。我邦学者，每不擅于过书虫生活，在歧途上既不能慎自抉择，复不虚心求教；过得去时，便充名士；过不去时，就变劣绅，所以我觉得留学而学普通知识，是一个民族最羞耻的事情。

我每觉得我们中间真正的书虫太少了。这是因为我们当学生的多半穷乏，急于谋生，不能具足上说五种求学条件所致。从前生活简单，旧式书院未变学堂的时代，还可以希望从领膏火费的生员中造成一二。至于今日的官

费生或公费生，多半是虚掷时间和金钱的。这样的光景在留学界中更为显然。

牛津的书虫很多，各人都能利用他的机会去钻研，对于有学无财的人，各学院尽予津贴，未卒业者为“津贴生”，已卒业者为“特待校友”，特待校友中有一辈子以读书为职业的。要有这样的待遇，然后可产出高等学者。在今日的中国要靠著作度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社会程度过低，还养不起著作家。……所以著作家的生活与地位在他国是了不得，在我国是不得了！著作家还养不起，何况能养在大学里以读书为生的书虫？这也许就是中国的“知识阶级”不打而自倒的原因。

大师简介

许地山（1893—1941），现代作家、学者。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的家庭。回大陆后落籍福建龙溪。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1922年又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1922年往美国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较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梵文、人类学、民俗学等。回国途中短期逗留印度，研究梵文及佛学。1927年起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编委，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1935年因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不合，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遂举家迁往香港。在港期间曾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发表文章、演讲，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皖南事变”发生，即与张一麐联合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息战。同时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展开各项组织和教育工作。后终因劳累过度而病逝。

落花生

◎许地山

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我们都说好。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

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

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

我们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姐姐说："花生的味儿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

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

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

是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夜深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深度阅读】

《道教史》，许地山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扶箕迷信的研究》，许地山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
《许地山散文》，许地山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作家许地山》，余思牧著，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



读书苦乐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同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日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产生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

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是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塞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

可惜“串门”只能“隐身”，“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

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大师简介】

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往事与追忆】

斯是陋室

◎杨绛

节选自杨绛著《我们仨》。

“斯是陋室”，但锺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1974年冬11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锺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1964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锺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这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水拍说：“钱锺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对方表示：钱锺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锺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条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叠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锺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锺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锺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锺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锺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定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锺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锺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锺书同志。"我不客气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1975年的国庆日，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锺书说：

“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的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锺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锺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深度阅读】

《洗澡》，杨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杨绛文集》（共8卷），杨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著，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杨绛译文集》（全3卷），杨绛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
《杂忆与杂写》，杨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我们仨》，杨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杨绛作品精选》（共两册），杨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干校六记》，杨绛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
《我们的钱瑗》，杨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斐多：柏拉图对话录》，柏拉图著，杨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



我的读书

我的读书，这就是说，除了学校的课本以外，自己私下看书，所看的又不是现在所说的“课外读物”，而是当时所说的闲书。据自己的记忆所及，是从两本书开始的。这两本书的性质可说全然不同。一本是《新青年》，是叔父从上海寄来给我大哥看的；一本是周瘦鹃等人编的《香艳丛话》，是父亲买来自己看的。这两本书都给我拿来看了。

这是1916年前后的事情，家住在江西九江。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事实上对于这两种书都不大看得懂，至少是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至今还记得这些事情的原因，乃是到底也留下了一点难忘的印象。一是从那一期的《新青年》上，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自己读了似懂非懂，总觉得那个人所想的十分古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难忘的印象是《香艳丛话》留下来的，这是诗话笔记的选录。其中有一则说是有画师画了一幅《半截美人图》，请人题诗，有人题云：“不是丹青无完笔，写到纤腰已断魂。”现在想来，这两句诗并不怎样高明，而且当时自然还不会十分明白为什么要“写到纤腰已断魂”。可是，不知怎样，对这两句诗好像十分赏识，竟一直记着不曾忘记。

就是这两本书，给我打开了读书的门径，而且后来一直就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这样同时读着两种不同的书，仿佛像霭理斯所说的那样，有一

位圣者和一个叛徒同时活在自己心中，一面读着“正经”书，一面也在读着“不正经”的书。

这倾向可说直到现在还在维持着，因为我至今仍有读“杂书”的嗜好。愈是冷僻古怪的书，愈想找来一读为快。若是见到有人的文章里所引用的书，是自己所不曾读过的，总想找了来翻一翻，因此，书愈读愈杂。这种倾向，仿佛从当年一开始读书就注定了似的，实在很有趣。

父亲的手上没有什么书，我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是到了昆山进高等小学的时期。住在叔父家里，这就是寄《新青年》给我大哥的那位三叔，我在那里读到了《吟边燕语》、《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类的小说，也读到了《南社丛刊》。学校里也有个小小的图书室，使我有机会读到了一些通俗的名人传记。书籍世界的大门，渐渐地被我自己摸索到，终于能够走进去了。

【大师简介】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笔名叶林丰、L·F、临风、亚灵、霜崖、秦静闻、佐木华、雨品巫、柿堂、南村、任诃、任柯、风轩、燕楼等。江苏南京人。著名作家，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青少年时代在九江、镇江居住。毕业于上海美专。1925年加入创造社。他早期小说创作颇丰，重视性心理分析，有的小说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者之一。30年代中期，他追随新的浪潮着力写真正意义的先锋小说，体现出标准的现代派风格。

记叶灵凤

◎刘以鬯

节选自刘以鬯著《记叶灵凤》。

曹聚仁曾经对我说过："朋友中，书读得最多的，是叶灵凤。"

后来，《四季》杂志在中环"红宝石餐室"举行座谈会，我将曹聚仁讲过的话告诉叶灵凤。叶老点点头，承认自己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像二十四卷的《阅微草堂笔记》，也曾从头至尾读过一遍。

在座谈会上，也渐提到加西亚·马盖斯的作品，问叶灵凤对这位作家的看法。叶灵凤摇摇头，说是没有读过。也斯又提到*Books Abroad*，叶灵凤表示希望能够读到这本杂志。也斯答应借给他。第二天，也斯到报馆来，嘱我将书转交叶灵凤。过几天，叶灵凤到《快报》来拿稿费，用兴奋的口气告诉我：他已找到加西亚·马盖斯的作品；且已仔细读过。那时候，他的视力很差，白内障眼疾已到了相当严重的阶段。

《四季》要出"穆时英专辑"，问他："有没有穆时英的照片？"他说："也许会有，不过找不到了。如果视力不这么差的话，可以凭记忆画一幅出来。"

由于视力太差，他曾向我询问参加座谈会的《四季》几位创办人的姓名与当时坐的位置。那几位都是也斯的朋友，我不熟，只好请也斯将座谈会的情形画出，注以姓名与位置，交给叶灵凤。

叶灵凤与鲁迅一样，很愿意与爱好文艺的青年接近。举行过座谈会后，他对我说："什么时候请这班年轻朋友到我家里去喝茶。"

提到鲁迅，就会想起叶灵凤与他的那一场笔战。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这样挖苦叶灵凤："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出现了叶灵凤先生，叶

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Uliyoe）的影响。”

叶灵凤的长篇创作《穷愁的自传》，刊于《现代小说》第三卷第四册。在小说中，叶灵凤写下这么一句：“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深度阅读】

《读书随笔》（1—3册），叶灵凤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灵凤小说集》，叶灵凤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

《叶灵凤书话》，叶灵凤著，北京出版社，1998年

《能不忆江南》，叶灵凤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叶灵凤散文》，叶灵凤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读书的意义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仅有关联，是一桩事情的两种看法而已。游历者，活动的书本。读书则曰卧游，山川如指掌，古今如对面，乃广义的游览。现在，因交通工具的方便，走几万里路不算什么，读万卷书的日见其少了。当有种种的原因，最浅显得看法，是读书的动机环境空气无不缺乏。

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位功名富贵，依目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要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这无怪喜欢读书，懂得怎样读的人一天一天地减少了。读书空气的稀薄，读书种子的稀少，互为因果循环。

现在有一些人，你对他说身心性命则以为迂阔，对他说因果报应则以为荒谬，对他说风花雪月则以为无聊。不错，是迂阔，荒谬，无聊。你试问他，不迂阔，不荒谬，不无聊的是啥？他会有种种漂亮的说法。但你不可过于信他，他只是要钱而已。文言谓之好利。有一个故事，不见得靠得住，只可以算笑话。乾隆帝下江南，在金山寺登高，望见江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船，戏问随銮的纪晓岚，共有几只。这原是难题，拿来开玩笑的，若回答说不知道，那未免煞风景。纪回答得很好，臣只见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

利。在那时，这故事讽刺世情已觉刻露，但现在看来，不免古色古香。意存忠厚，应该对答皇帝道，只有一条船。

好利之心压倒一切，非一朝一夕之故。古人说："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利是遥远的古话。退一步说，以名为利。然名利双收，话虽好听，利必不大。唯有不恤声名的人，以利为利，始专而且厚。道德名誉的观念本多半从书本中来，不恤声名与不好读书亦有相互的关联。

在这一味好利的空气中寻求读书乐，岂不难于上青天，除非我们把两者混合。假如我们能够立一种制度，使天下之俊秀求官位利禄之途必出于读书，近乎从前科举的办法，这或者还有人肯下十载寒窗的苦功。严格说来，这已失却读书的真意义，何况这制度的确立还遥遥无期。

现在有一种情形，这十年以来，说得远一点，二三十年以来都如此，就是国文程度显著地低落，别字广泛地流行着，在各级学校任教的，人人皆知，人人皱眉头痛，认为是不大好办的事情。这严重的光景，不仅象征着读书阶级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发展。

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我们常夸说神州立国几千年，华夏提封数万里，这种时空的超卓并不必由于天赋，实半出于人为，皆先民积久辛勤努力所致，我们应如何欢喜惭愧，却不可有恃无恐。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从时间说，我们读古书如《论语》，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那不必提周秦两汉，就是唐宋，也就很遥远而隔膜，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再从空间说，北自满洲，南迄岭海，虽分南北中三部，细分还有更多的区域，然而中国始终只是一个，譬如说广东话与北京话完全两样，而纸上文字完全一致。我国屡经外夷侵略，或暂被征服，而于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不失者，上面已表过是

先民血汗的成绩，而在民族的团结上，文字确也帮忙不少。历史事实俱在，不容易否认的。

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自非好作危言耸人听闻，废书不读可谓今日之流行病。用功的人难道没有？即有少数的人好学潜修也不足挽回这颓风。即以学校教育而论，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课业，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我不敢轻量天下之士，武断地说或者不多罢。如何使人安心向学，对读书感到兴味，似是小事，却是牵连社会生计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了。

【大师简介】

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人。原名俞铭衡，字平伯。著名诗人、散文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19年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40年代后期，参加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陈徒手

节选自陈徒手著《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1952年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引发了1954年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批判运动。该书编辑、九十岁的文怀沙谈起当年，依然长吁短叹。

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内部大会上明确阐述了大批判的动机："胡适是资产阶级中唯一比较大的学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可怜，没有多少学者，他是最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

大批判并不像林默涵预料得那么平和，在《人民日报》等单位收集到的一些反映中，可以看到知识界陷入人人自危的不安状态。北大教授游国恩说："太凶了，好厉害！"王瑶表示："俞的观点有问题，领导上早就知道，何必现在搞他一下子呢！"吴组缃觉得俞平伯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会一笑置之，因为该文既肯定俞在考据上的成绩，又否定了俞的结论。金岳霖说："俞和胡应该分别看待，不然就会影响团结。"

处在漩涡中心的俞平伯自然成了有关方面观察的重点，具体情况层层上报：

俞平伯教授没有服气，自我解嘲地说："我的书，这一来就一抢而光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又说，王佩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1]。

那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总支书记的王平凡谈起那几年不平静的情形：

所长郑振铎当时有些紧张："俞先生是我请来的，哎呀，没问题吗？"

[1] 《北京日报》办公室1954年11月5日编印《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

副所长何其芳请全所同志看俞先生的著作，看看究竟错在哪里？所里调子起得不高，不像社会上那么凶。何其芳在会上还说："我们还没成他（俞）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艺术鉴赏还不如俞。《红楼梦》后四十回让俞先生来续的话，比高鹗要好。"

1956年评职称，所里与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专家教授平衡，内部一致同意给俞先生定为一级研究员。何其芳、毛星和我三人研究后，让我找俞先生谈话。俞先生听后，平淡地表示："我想，我是应该的。"何其芳向上面提出定级的两条理由，一是俞平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社会影响。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陈伯达对此表示同意，周总理也知道了。这两条意见使俞先生心里的一些疑问解决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学问的肯定。

定了职称，就可以到好医院看病，看电影能坐在前排，进出城有车。倘若在其他单位不一定敢给俞先生这样的人评为一级。

深度阅读

《读词偶得·清真词释》，俞平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孤山听雨》，俞平伯著，华夏出版社，2003年
《红楼梦辨》，俞平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唐宋词选释》，俞平伯选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红楼梦研究》（插图本），俞平伯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中年》，俞平伯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
《湖楼小撷》，俞平伯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郁达夫谈读书】

人与书

书本原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就是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它产生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它供给了知识饥渴的乳料。世界上的大思想家和大发明家，都从书堆中进去，再从书堆中出来。

因书本与人类关联之亲密，所以古来学者多把书本当做人类的朋友看待。史曼儿说得好：“一个人常常靠了他所读的书而出名，正像他靠着所交的朋友而出名一样；因为书本和人们一样，也有交谊。一个人应该生活在很好的友伴中间，无论是书或是人。”

同时亦有一位，他却把人生当做书本来看，那就是诗人高法莱了，他说：“一个人好像一本书，人诞生，即为书的封面；其洗礼即为题赠；其啼笑即为序言；其童年即为卷首之论见；其生活即为内容；其罪恶即为印误，其忏悔即为书背之勘误表；有大本的书，有小册的书，有用牛皮纸印的，有用薄纸的，其内容有值得一读的，有不值卒读者。可是最后的一页上，总有一个‘全书完’的字样。”恕我续上一个“貂尾”，就是在人的诞生之前的受精成孕，就是书版付印前之文人绞汁的草稿了。

书即是人，人亦即是书。

说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是古人奖励读书的一句成语。从前读到一册坏书，读后每觉得为古人所欺；现在多了一点智识，反过来又觉得古人的不欺我了。总之，好书读了，原有所得，就是可以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坏书读了，而知道它的坏的原因与地方，岂不也是一得？从前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之意，也不一定是从正的一方面着想。反过来在负的一方面，也何尝不可以为鉴戒。因此，从前是非有定评之书不读的，现在却马博牛溲，一例地都想看看了，这大约总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

【大师简介】

郁达夫（1895—1945），浙江富阳人。名文，字达夫，著名作家。1938年底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流亡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隐居下来。不久，当地日本宪兵部强迫他去当翻译，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和华侨，并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罪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往事与追忆】

不成文天祥，也要做伯夷

◎刘海粟

节选自刘海粟著《漫论郁达夫》，标题为编者所加。

1977年间，黄葆芳学弟从新加坡回国观光，我见到他第一句话便是：

“达夫辞世二十多年，我总不相信是事实，他若能和你们一道同来，该多么好啊！”接着谈起在南洋的岁月。他说：“老师，当年达夫先生编《繁星》，对我的稿子特别垂青，总是稍加修改，便作为花边文学刊出，使我很感激。我们三人不是到林霭民先生家谈艺，便是到胡载坤大夫家中，我看您作画，郁先生捧着茶杯在屋里徘徊，有时低头敛眉，猛抽着香烟，等到丹青落笔，他的诗已想好，于是走笔题画，并称双绝。可惜星州沦陷之后，这些寓意极深、宣扬民族气节的作品多被收藏者销毁，不敢留下，真是叫人难忘的大憾事。”

这段话引起我亲切的回忆。记得有天晚上，我和达夫躺在期颐园中的草地上，碧天如水，寒月如霜，这时天上一颗亮星拖着火光刺眼的尾巴，在远远的树梢后陨落了。达夫说：“海粟兄！那不是徐志摩吗？多么有才华的诗人，英年早殒，千古同悲！”我们谈到在上海的朋友中，他与志摩都和我同庚，不免唏嘘。后来言及时局，达夫愤愤地跃起，带着人之子的柔情，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我觉得这是达夫心中流出的最佳诗作，听来感人肺腑。难兄难弟，相对无言。谦和质朴的达夫，眉宇间现出平时罕见的金刚怒目之气，从鼻翼到嘴角边的长纹变得坚韧了。

深度阅读

《郁达夫选集》（上下册），郁达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郁达夫小说集》，郁达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达夫游记》，郁达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读书学习的零星感想

要我谈谈“治学经验”，我感到惶恐，所以久久没有动笔。论年纪，我已七十七岁了；谈学问，不但离“升堂”还十分遥远，说句真心话，连门径还没摸清楚呢！

我1934年大学毕业，读的中文系，系主任是闻一多先生，名师有游国恩、张怡荪、闻在宥、丁山、肖涤非……诸位先生，都是学术界有成就的学者，而我却没有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毫无所得，意思是说我没有走研究这条路子，而把精力全灌注到文艺创作中去了。

上了年纪，觉得心里空虚，别人以为我什么都懂，其实是无知或知之甚少。为了填补过去的空虚，二三十年来除了从事写作，把时间大半用到读书上。我有一些藏书；不到一万册。我读书不是为了研究，不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读得很杂，但连个“杂家”也说不上。茅盾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说，他青年时代如饥似渴地读线装书，灯下一连读三小时，把眼睛都弄出了毛病，想成一个杂家。老来自叹，虚度年华，一事无成。茅盾先生十分谦逊，但我觉得这番话决非客套。何况我这个连给茅盾先生做学生还不一定及格的人！

我读的书，范围广泛，什么经啊，史啊，集啊，都想摸一摸，还热心读一些报刊上的讨论文章。我想从各方面找一点常识，和专家朋友们谈起来

可以插上嘴。学海无涯，古人终生不能穷一经，当代我认识的许多专家朋友都是把几十年的时间、精力集中在一点上，才能做出成绩，承前启后。我哪能比？因为我是以创作为主，以读书为副。当然，创作与读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甫不是说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学术部类繁多，一个人能力再大，天才再高，也不可能样样都精，成为多方面的专家。从研究角度上讲，应当选定一门，全力以赴。但选定一门，又必须懂得多门，博中求精，多而专一。学问虽然门路很宽广，但彼此都有牵连，即使科学与文艺，也决非别如天渊。所以，王国维谈研究学问的三种境界，确系有价值的经验之谈。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论干什么工作，全凭着一点锲而不舍的精神，拼命追求的劲头。读书，研究学问，从事文艺创作，都少不了这点精神和干劲，否则就无所成，或不能大成。古往今来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学者、文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当他们从事工作的时候，潭思凝神，屏弃一切，甚至废寝忘食，如傻似痴。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一可能漏万。

我喜欢看书，但既无系统，又不专注。看书为了增加一点知识，不是为了研究。我看的书，为数极少，偏重文艺。特别是古典文艺作品，不论散文、小说、诗词，都想涉猎，特别对于后者兴趣尤浓。我的日用的几架书柜里装的全是这类东西。我枕头一边，堆得高高的，也全是古典诗词和诗论之类。

我读古人书，但并不下大工夫做研究工作，大有读书不求甚解之意。读的时候，浓圈密点，旁注，十分认真，一句一字也不放过，以求吃尽其中味，对作者的感情、思想、所处时代环境以及艺术表现特点，都要求大体了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偏爱的作家。我个人对古代诗人，偏爱杜甫、苏东坡。可是，对他们的作品并不盲目称颂。有的我为之击节，万遍常新，有的则以为平常，并不令我佩服，不论多伟大的作家，也并非字字珠玑。

我们读古，尊敬古人，但不应迷信古人。应该心中有个自己的评价标

准，拿它去衡量一切作品。当然，这个标准的树立是不容易的，这需要多种条件。这与个人的人生观、文艺观是分不开的。读书与生活经验也大有关系。

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像叫花子讨求残羹冷炙一样，毫无意义而且是应该羞愧的。论古人，评今人，要有创见，这就得有修养。

我自己，把五十余年的精力，放在文艺创作上去了，对于学术，有兴趣而缺乏知识，根本谈不到什么研究，更不用说成绩了。

虽然如此，一点点甘苦经验还是有的。

我读书，只是欣赏。但有时也运用思考，有一星半点个人看法和想法，这或许可说“读书心得”。我也常常将这一得之见，质诸专家朋友，供他们参考。

我欣赏东西，特别是诗词之类，全凭两点。一点是长期的生活经验，另一点是五十多年的创作实践。用这两点去体会，去印证。

这两点，看似平常，得来却不易。我也写点有关古文、古诗之类的随笔文章，也对当代文艺创作抒发点个人的感想，本钱就是凭这两点。

当然，书本知识，虽然甚少，到底还有二星半点。

给我出了《治学经验一席谈》这个题目，好似一顶大帽子，在我的头上乱晃荡，草草千余言，离“治学”十万八千里。

【大师简介】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诗刊》创始人，主编；当代著名诗人。

【往事与追忆】

请主席打个电话

◎臧克家

节选自臧克家先生晚年回忆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1957年）1月14日上午11点，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同志忽然给我来了电话："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来接你。"那时，我住在笔管胡同7号人民出版社的宿舍，没有电话，电话是由斜对门的油盐店传呼的。我的住处到新华门，二十多分钟可达，我心急却嫌路远。车子驶入中南海，直达颐年堂门前。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毛主席站到我们身旁了。他安详和蔼地同我们握手，让座，自自然然地从烟盒里抽出支香烟让我，我说："我不会吸。"主席笑着说："诗人不会吸烟？"毛主席的神态和谈话，使我的心平静怡然了。主席问："你在北大教书？""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我回答。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我趁机问："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主席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主席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话没说几句，心和心近了，可以放言无忌了。谈起《诗刊》创刊，我向主席提出了印数问题。我说："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一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二十万，《诗刊》仅仅印一万，太不合理了。""你说印多少？"主席问。我说："公公道道，五万份。"主席想了一下，说："好，五万份。"我天真地说："请主席给黄治峰同志打个电话。"水拍用眼睛向我示意，赶忙说："不用了，不用了。"

……

1963年，《毛主席诗词》要正式出版了，先印了少数征求意见本，送我一本，我认真地一读再读，准备了二十三条意见，事前曾和《诗刊》副主编葛洛同志在电话里商讨过。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得到通知，要我到钓鱼台去参加座谈会。大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摆着毛主席用铅笔写的几张条子，字很大。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一议。"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这次会，主要由田家英同志汇报了出书的情况，他说，这次破例，先由出版社出版之后，各报刊再转载。我有点失望，我是带着为让《诗刊》优先发表的希望去的。我把我写好的二十三条意见交给了田家英同志。《毛主席诗词》出版之后，我查了一下，有十三条意见被采纳了。例如：《七律·登庐山》中的"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句，"热风吹雨"原作"热肤挥汗"，是毛主席接受我的意见改的。

深度阅读

《臧克家全集》（共12卷），臧克家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
《臧克家回忆录》，臧克家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烙印》，臧克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张岱年谈读书】

漫谈读书

书是人类认识的载体，有知识的人把所见所闻或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便成为书。有价值的书是智慧的结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表现于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也存储于这个民族长期流传的典籍书册中。

我对于世界有所认识、对于人类的崇高理想有所了解，都得益于读书。通过读书，我认识到人除了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之外还应有高尚的精神生活。通过读书，我了解到自古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感人肺腑的光辉事迹。

我幼年在家塾读书，读了《论语》、《孟子》，但只是诵读而已，并不理解其中意蕴。十多岁时阅读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张载的著作，才对于先秦儒家的精义深蕴有所了解。周敦颐《通书》中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又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又说："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周敦颐《通书》的这些话，阐述精神生活的崇高价值，可谓深切著明，我读了深受启发。

张载《正蒙》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唯大人为能

尽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显示了博大的胸怀，宏伟的抱负，使我对于《论语》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进一步的了解。

我在中学读书时，对于《老子》、《庄子》深感兴趣。初读《老子》第一章，感到莫明其妙，阅读了古今的许多注解，然后有所理解，于是对于形而上学本体论发生兴趣。《庄子》书中有许多深刻的智慧，如《齐物论》说：“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黑甚）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这是中国古代的怀疑主义，确实达到较高的深度，于是引起了我对于认识论的兴趣。

我对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都发生了兴趣，于是选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受吾兄申府的引导，我阅读了罗素的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我们的外界知识》）和An Outline of Philosophy（《哲学大纲》），其论证的细密、分析的透彻，给我以深刻的启迪。又读了罗素其他著作和怀特海（A. N. Whitehead）与博若德（C. D. Broad）的哲学著作。我感到，读这类分析哲学的书，不仅增加一些知识，而且受到一定的思维训练。

二十年代末，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阅读了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英译本。早年的中译本的译笔不甚通畅，英译本比较明晰。我读了这些著作，感到豁然开朗，深受启发。我以辩证唯物论的理论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作了比较，认为辩证唯物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既解决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也解决了认识论上唯理论与经验论的论争，更具有改造世

界的巨大作用，所以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从此，我对于唯物论深信不疑。

三十年代初期，我广泛阅读了先秦诸子、汉唐哲学、宋明理学以及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颜元等人的著作。在深入探索的基础上，撰写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书中对于自古以来的唯物论思想特别是王夫之的唯物论思想有较多的阐发。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尤其他的艰苦卓绝的高尚志节令我深深感动。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我提出今后应该继承发扬王船山的哲学思想。

西方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与罗素都认为西方近代哲学乃是古希腊哲学的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古希腊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我认为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先秦诸子哲学乃是汉唐宋明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论语》、《孟子》、《易传》、《老子》、《庄子》、《荀子》的思想对于后世思想的发展确有深刻的启迪作用。多年以来，我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近年来我更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常常重温《论》、《孟》、《老》、《庄》、《易》等书，感到先秦诸子学说确实含有深湛的智慧。举例来说，我认为古代儒家关于人生价值的学说，道家关于宇宙本体的学说，至今犹能给人以启发。

我受到孔子关于人的思想和老子关于道的思想的启迪。孔子学说以人为中心，所谓“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要是考虑人际关系问题。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肯定人民都有不可夺的独立意志。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即以人为终极关怀，反对求助于鬼神，可以说是古代的人本主义。这种以人为本的学说在现代仍是有重要意义的。老子提出天地万物的本原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创始人，所谓道指超越一切的绝对。老子提出天地本原问题，在思想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老子指出人类文明的种种流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在现在看来，仍有使人从声色货利的迷误中醒

来的作用。

古代哲学必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我们读书，一方面要虚心体会，努力研求其中的深湛意蕴，另一方面还要有批评态度，要辨识古人思想的偏失。既要虚心，又要保持批评精神，才是正确的态度。例如孔子强调“君臣之义”，老子主张回到“结绳”之世，这都是错误的，应加以批判。

读书是学，学习前人的经验与知识。在学的同时还要思，进行独立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在今日看来还是正确的。

独立思考又以对于实际情况的观察、考察、调查为基础，而观察不可能是静观，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思考的主要基础。

在读书的过程中勤于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参阅古今中外的名著，这是研究学问的必由之路。

【大师简介】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著名哲学家。1937年抗战爆发，蛰居读书。1943年任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讲师。1944年升副教授。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后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岱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著述等身，有着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的研究重视阐扬中国哲学固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传统，他的著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及其起源、演变作出了全面的论述和准确的分析，体现了他在把握中国哲学方面的广阔性和深刻性。

几句真话

◎张岱年

节选自张岱年著《曲折的道路》，标题为编者所加。

1958年8月下放到北京郊区黄村参加劳动，有些农民知道我划为右派后，私下对我说：你不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吗？对我表示同情。农民同志的纯朴令我感动。“五十而知天命”，我年近五十竟遭此大厄，才知道人生确实有命存焉，实亦由自己狂傲不慎所致。在1957年至1979年的二十年中，我完全放弃了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思考，正在精力比较旺盛的时间，却完全钻入故纸堆中，枉费了光阴，这是深感痛惜的。

1963年秋季，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上古讲到近代，讲了两个学期。1965年参加北京近郊区“四清”运动，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白鹿司村参加“四清”工作组，与任华同志同组，和农民同吃同住。农村生活比较艰苦，颇受农民的热情接待。当时到王四营参加“四清”的还有郑昕、周先庚、周辅成、熊伟、桑灿南等。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命回校。北大东南门旁贴了一个纸条：“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我们一回小吠靠边站了。

一开始，哲学系老教师在一起开会学习，不久就分为两组，一组是据说有问题的，如我和冯先生、洪谦、熊伟、沈履、周先庚、周辅成、黄丹森、朱蒙、吴天敏、桑灿南等；一组是据说没有问题的，有郑昕、王宪钧、任华、宗白华、齐良骥、黄子通等。有问题的一组由黄丹森任组长，每天清晨到校园内扫地一小时，然后开会学习，写检查，抄大字报。没有问题的一组，后来黄子通也被揪出来了，原来他曾参加国民党，曾任区党部的委员，在外调中发现了，他冒充进步，终于被发觉了。宗白华也受到批判。我每天

早晨到校内“一院”扫地，然后学习。不久冯友兰先生病了，住进医院，两月后出院，仍参加原组学习。我向冯先生表示慰问，但也有人对冯先生冷眼相看，如不相识。当时哲学系揪出所谓“黑帮”，共十几个人，以冯定及王庆淑为首。他们每天拔草，接受批斗。当时很多学生到老教师家搜查，称为抄家。9月初的一天，哲学系五年级的一帮学生由助教庄印带队到我家搜查，闹了一上午，抄走了日记及笔记卡片等，而没有抄去我的著作手稿，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冯先生被抄的次数更多了，但未动他的藏书。到1967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一周年，哲学系文革领导小组宣布：张岱年、黄丹森、汤侠声、叶朗、吴天敏五人检查得较好，予以解放，从此我们五个人不扫地不抄大字报了。我遵命参加王宪钧、任华、曼成书等的小组学习，每天看大字报，听大喇叭广播，读《毛选》。1968年8月初，哲学系文革小组令我换房子，从原住房迁出，换住一间半的小房间。我不敢违抗，遵命以大换小（其实原来也不大），于是卖掉四平板三轮车的旧书，又卖掉沙发。当时家具店不愿收沙发，必须搭上一个书桌，总算勉强安置下来。

当时北大两派斗争激烈，1968年8月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那天晚上，让我们迎候欢迎，等到深夜，一个工厂的宣传队到了，人们列队欢迎，我也参加在学生队伍中，接着开会，师生表示欢迎，我也说了两句欢迎的话，一个工人立即说，你们资产阶级教授没有发言权。我就不敢再说了。天天开会，过了几天，宣传队员又问我们，你们资产阶级教授为什么不发言呀？这令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王宪钧同志问我，不说不行，说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呀？这是老教师的共同感受。有一天，参加宣传队的某一工厂的领导同志魏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说，你们老知识分子还是有前途的。这给我以莫大的安慰。当时我是参加群众学习的，还有不少老教师被关进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如冯友兰先生、冯定同志等都不能参加群众学习。后来，将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38楼居住，每天开三段会，每天晚上要作思想汇报。1969年9月末，宣传队号召教职工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名单

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装随着队伍乘火车前往江西。到鲤鱼洲之后，哲学系与历史系共组成第八连。住大草棚。初到鲤鱼洲，参加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等劳动。因年过六十，遂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同组还有王宪钧、周先庚、桑灿南、吴天敏、李长林等。鲤鱼洲土地是红土，有雨是泥，无雨如铜，泥地很滑，我经常摔跤，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值夜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仰望天空，星云皎然。多年以来住在城内或近郊，房屋比栉，很难观到星斗，今一片空阔，仰望天空，北斗在目，另有一番情趣。1970年10月，八连领导宣布：石坚、张岱年、汤侠声等回校，于10月3日起程北归，回到北京。在鲤鱼洲整整一年，冯定、王宪钧等仍留在鲤鱼洲，次年才回京。

深度阅读

《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张岱年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文化与哲学》，张岱年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晚思集》，张岱年著，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谈读书

我是八岁那年上学的。那时候头上还留着一条小辫子。读的自然是“三字经”和“论语”、“孟子”之类。先生整天板着面孔。书的内容已经引不起兴趣，而教法又是那样的古老——只有点书、背书，却没有讲解。老实说，在那些时候，读书简直就是一种苦刑。即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不免要皱眉头呢。

我对书籍开始感兴趣，是从蒙馆转到区镇小学之后。那时候的小学，尽管说是一种新式教育，实际上旧的气味还相当浓厚。教的自然是国文、算术、格致、图画、体操等功课。但作起文章来，往往还是议论之类，课外读的书也是那些“古文析义”、“古文辞类纂”、“纲鉴易知录”等。这些总算稍稍引起我的兴味了。而更加有引诱力的是那种读诗和作诗的空气。这自然不是在课程内的，可是，由于旧日读书界风气多少还遗留着，而所谓教员也多半是秀才或者进过旧日试场的，因此学校是一些高年班的同学——他们的年纪有的已经二十以上，在正式功课之外，多少不免哼几首或者来几句。有时候，抓到一个题目，你唱我和，闹得“不亦乐乎”。我年纪尽管小，兴致却不比他们弱。因此，就拼命搜读着诗集和诗话（《随园诗话》，是那时候读得最熟的一部，差不多能够随便背出那里面自己喜欢的许多诗句）。这在我后来的生活上差不多成了一种支配的兴趣。尽管在做着什么工作，

如果有点闲工夫看看书，总是拿起一本诗集或诗论的东西来。读起这方面的作品，在心理上不单单是最少抵抗力的，而且是最容易感觉快乐的。这种情形，恐怕要维持到我活着的最后那一天。

可是，由于社会情势的不同，由于个人经历和心情的变迁，过去在这方面所读的书，前后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从古近体诗到小令散曲，从白居易、苏东坡、陈简斋到惠特曼、卡彭脱、马雅可夫斯基，从《石林诗话》、《说诗晬语》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波亚罗的《诗艺术》……真是五光十色。可是寻找起来，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线索，因为一个人到底是他所生息其中的社会的孩子。他的阅读思考和一切行动，都不能够不受它的制约。而社会本身又是有着严明的规律的。

我的读书，主要是凭个人的兴趣和暗中摸索，因此不免有许多地方是走了冤枉路的。

最初耽爱的是文学方面、历史一类的书籍，也曾打动过我少年时期的心情，可是到底敌不过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吸引力量。出了小学堂，我曾经有一整年时间，躲在光线暗弱的楼棚角圈诵读着《唐宋诗醇》、《国朝六家诗钞》和《八家四六文选》等。

进了中学我的兴趣却稍稍转变了，尽管书案上还放着《禅月集》、《渔洋精华录》，可是更迷惑我的，却是赫克尔的《宇宙之谜》（“一元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罗素的《哲学问题》等。往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的诵读的主要对象是神话学、民俗学、土俗志、人类学和宗教学等。在这方面，我杂读了欧美和日本的好些名著。这个时期，我的阅读，多少是有意识的。因为我妄想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方面建立自己的学绩。

自从日本侵略的铁骑闯进国门以后，辛辛苦苦搜集的许多图书、资料丢散了，生活的安定失去了。因为战斗情绪的昂扬，我暂时走出了书斋，去做谈政治、写宣言的工作。可是“英雄梦不许诗人做”，书呆子到底只会回到书斋去。因为过去那种学问上的野心，一时挨战火烧毁了，而教的又总是

文艺方面的功课，这时候，我重新细心地研读起《文心雕龙》、《艺术哲学》、《拉奥孔》、《从社会学观点看的艺术》、《科学的艺术论》等。身边尽管还带着吕淮·布鲁的《原始人心理的机能》一类的名著，可是已经很少打开来读了。

粗粗地回顾一下，我过去诵读书籍的杂乱就很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能够专心些呢？假如我一向就把精力集中在文艺理论或文学作品上，现在不是该有比较满意的一点成就么？这是我近年有时候要在心上浮起的感叹。可是认真想起来，过去的杂乱诵读也不是完全白费金钱和脑力的。比如我现在对于文学的起源、文学的功利性以及民众创作力等的认识，能够比较深入一些，这多少就靠了过去对于原始艺术和民间文艺多用了一点功夫。那些民俗学、人类学和土俗志的名著并不是白读的。如果当年不诵读那些书籍，也许在别的点上可能比较有些心得，可是在这方面却未必有现在的收获了。幸和不幸，往往是互相倚伏的。

现在一般谈到读书方法的人，大都主张要有计划。比如说，某些入门书应该先读，某些比较深沉的著作应该放在后面。某些书是一定要读的，某些则可以不读，或者根本不该提到它。我们读书正像造房子或缝衣服一样，要有一定的选择和工作的程序。这种说法自然很有道理。能够照着做去，成绩也许会很显著。可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说，却不是这样循规蹈矩的。我已经提过，我的读书趋向并不是很固定的。在这个时期这类的书是我的女皇。在另一个时期里，她可能已经变成弃儿，而另一类的东西完全代替了她的地位。和这相像，我的诵读某一类书也并不是怎样严密计划过的。有时候我的心意忽然整饬起来，要给自己的诵读一个“理想的”程序。开起书单，规定进展，好像一定会照着实行的样子。可是，结果呢，事实和理想总是差得很远。这自然要怪我的毅力不够，或者客观的、条件不凑巧，而我的不规矩的读书法，也没有疑问是有毛病的。

可是，我多少有点怀疑，读书究竟和造房子之类比较机械的工作，在

性质上是否“完全”一样？读书是一种偏于心理的活动，它该有它相对的自己的规律。事实上，我们预定要读的，往往倒没有去过眼。那些由于偶然的兴味或者迫于某种特殊需要去读的，却占着很大数目。在效果上，我们也不能够说后者定不如前者。平心地检查起来，我自己倒是从后者得到许多好处的。例如我因为研究民俗，就自然地读起先史学、考古学和宗教学一类的书来。而这方面的阅读，并不一定是由浅入深，或者非名著不读的。又因为对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雏形”感兴趣，就尽量搜读着他的（连到他那一派的）社会学的许多著作。这种“瓜蔓式的”读书法，也许有不少浪费或危险，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太看轻它的自然性和可能的益处。我决不反对有计划的阅读。只以为它不一定是唯一的道路。许多在学问上有成就的人，恐怕未必只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

现在是一个匆忙的时代。事情是那么繁复，生活是那么紧张。从前白头专一经的情形，已经和我们的时代太不合拍了！我们生在讲效率的时代，生在争速率的时代。今天我们要有十倍于孔子时代读书人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得吸收得分外敏捷些。据说，美国的大学生，在一个假期里教授往往指定了许多书要他们阅读。那些书的分量，在过去时代的读书人，也许是足足可以读一辈子的。现在，不但阅读范围推广了，读书的技术也大大进步。好像用“卡片摘记”的方法就是一种。这种方法，可以备忘和便于应用，是一般人所看重的。我自己自然是个时代的孩子。我泛滥地读许多性质不同的东西。记得有个时期，我整天关在那座九层楼的图书馆里，常常从第一层的“书目”之类钻到第九层的“娱乐”之类的书仓，活像一只谷仓的耗子。本来也许是想去检读某一本书的，但是结果却迷失在书的大海里了。

这种情形，多少说出了我的“滥读”。可是在另一面，我却是坚持“精读主义”的。“如果我跟别人读得那么多，我就跟别人一样知道那么少了。”这句英国名学者的话，好像永远壮着我的胆（虽然我在没有读到它的时候，早就是一个精读主义者了）。有一部诗选，我差不多从小学时代读

起，直到现在还时常放在枕头边或旅行的手提箧里。又像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法朗士的《易匹鸩尔的花园》、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和高尔基的《回忆记》等，都是反复读到十次以上，而且有的还要继续反复下去的。小泉八云曾经劝日本学生说，当你想买一部新书的时候，你还是去把已读过的名著重新读一回罢。我爱买新书，可是我更加喜欢重温旧书。许多人不肯再读已经读过的好书。这大概由于贪多爱新，或者不深懂得书味和它的真正益处。诵读已经读过的好书，正像和老朋友晤谈，那种味道决不能够是从新交那里得来的。而且从效果上说，对我们的人生修养和学艺精进最有帮助的，正是那平日读得烂熟的少数书本。要使书籍中的道理和文词，和我们深切联结起来，或者简直成了我们自己的血肉，那些随手翻翻或只映眼一过的书怎么办得到呢？那些潦草地零碎地摘下来的东西怎么办得到呢？因此，我常常要劝青年朋友熟读一些自己所喜欢的名著。这是他将来学问的一个重要泉源。泛泛之交满天下的人，往往是不容易得到一些真实友谊的援助的。也正因此，我对于现代一般流行的多读法和卡片主义，多少抱着批判的态度。“留意那一本书的人”，这是何等古老而又何等深隽的一句警语啊！……

【大师简介】

钟敬文（1903—2002），原名谭宗，又名静闻、金粟。广东海丰人。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早年在日本留学。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

钟敬文为什么放弃文学

◎苑利

节选自苑利著《我眼中的钟老》，标题为编者所加。

郁达夫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收录了钟老《西湖的雪景》等四篇散文，他在“导言”中这样写道：“钟敬文出身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梅县（按今属海丰）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令郁达夫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钟先生从30年代开始，便淡出文坛，走上了民俗研究之路。原因之一，便是他在思想上发生的那次激烈的蜕变。1930年，钟先生在《湖上散记》的后记中这样写道：……退出文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要专心于民俗学的研究。虽然当时民俗学还远不如文艺创作热门，“但我已经认识到，中国需要自己的民俗学。从上个世纪起，就有不少外国人来华，利用传教、旅行的机会，搜集中国的民俗资料，回去写他们的书，有的还进行他们的殖民文化宣传，他们却反而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想象力，这对我刺激很深，感受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我想到了放弃‘文艺创作’并开始自己的民俗学生涯”。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他的研究中，更多了一份人文关怀的色彩。

钟老认为，民俗文化在一定范围内，起着规范民众的作用。与这种规范作用并存的，是它的凝聚力。远在海外的华侨，每逢年节，都要放炮舞狮，原因就在于行为的背后，是文化的认同。1999年冬，他甚至为禁燃鞭炮而上书《光明日报》，对禁放问题上的一刀切做法，提出尖锐批评。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的展开，传统民居遭受灭顶之灾，陆续传来的消息，不时刺痛着老人的心。这是历史，这是文化，这是我们与祖先灵魂沟通的一条条渠道哇！一个人得了健忘症是可怕的，一个民族，如果为

了眼前的区区小利，毁坏了文物，健忘了历史，这个民族又依凭着什么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交会过程中，自然要有主体和客体。如果我们创造成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体性（像身体没有脊梁骨），即使真能现代化，那又有多大意义呢？如果要使祖国的新文化成为有体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重视自己千万代祖宗创造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这是一宗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必须万分珍惜，百般关爱。

【深度阅读】

《民俗学概论》，钟敬文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天风海涛室随笔》，钟敬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谣俗蠡测》，钟敬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婺尾集》，钟敬文著，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钟敬文散文选集》，钟敬文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为了民谣的旅行》，钟敬文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



读书的经验

买到一册新刻的《汴宋竹枝词》。李于潢著，卷头有蒋湘离的一篇李村墓志铭，写得诙诡而又朴实，读了很是喜欢，查《七经楼文抄》里却是没有。我看着这篇文章，想起自己读书的经验，深感到这件事之不容易，摸着门固难，而指点向人亦几乎无用。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古文析义》，只算是学了识字，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西游记》与《水浒传》，《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可以说是两大类。至于文章的好坏，思想的是非，知道一点别择，那还在其后，也不知道怎样的能够得门径，恐怕其实有些是偶然碰着的吧。即如蒋子潇，我在看见《游艺录》以前，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父师的教训向来只说周程张朱。便是我爱杂览，不但道咸后的文章，即使今人著作里，也不曾告诉我蒋子潇的名字，我之因《游艺录》而爱好他，再去找《七经楼文抄》与《春晖阁诗》来读，想起来真是偶然。可是不料偶然又偶然，我在中国文人中又找出俞理初、袁中郎、李卓吾来，大抵是同样的机缘。虽然今人推重李卓吾者不是没有，但是我所取者却非是破坏而在其建设，其可贵处是合理有情，奇辟横肆都只是外貌而已。我从这些人里取出来的也就是这一些些。正如有取于佛菩萨与禹稷之传说，以及保守此传说精神之释子与儒家。这话有点说得远了。总之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集合拢来，所谓粒粒皆辛苦的，在自

己看来觉得很可珍惜，同时却又深知道对于别人无甚好处，而仍不免常要饶舌，岂真敝帚自珍，殆是旧性难改乎。

外国书读得很少，不敢随便说，但取舍也总有的。在这里我也未能领解正统的名著，只是任意挑了几个，别无名人指导，差不多也就是偶然碰着，与读中国书没有什么两样。我所找着的，在文学批评是丹麦勃兰兑思，乡士研究是日本柳田国男，文化人类学是英国来则，性的心理是蔼理斯。这都是世界的学术大家，对于那些专门学问我不敢伸一个指头下去，可是拿他们的著作来略为涉猎，未始没有益处，只要能吸收一点进来，使自己的见识增深或推广一分也好。回过去看人生能够多少明白一点，就很满足了。近年来时常听到一种时髦话，慨叹说中国太欧化了，我想这在服用娱乐方面或者还勉强说得，若是思想上那里有欧化气味，所有的恐怕只是道士气秀才气以及官气而已。想要救治，却正用得着科学精神，这本来是希腊文明的产物，不过至近代而始光大，实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谓疾虚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我不知怎的觉得西哲如蔼理斯等的思想实在与李俞诸君还是一鼻孔出着气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靠直觉懂得了人情物理，前者则从学理通过了来，事实虽是差不多，但更是确实，盖智慧从知识上来者其根基自深固也。这些洋书并不怎么难于消化，只需有相当的常识与虚心，如中学办得适宜，这与外国文的学力都不难习得，此外如再有读书的兴趣，这件事便已至少有了八分光了。我自己读书一直是暗中摸索，虽然后来找到一点点东西，总是事倍功半，因此常想略有陈述，贡其一得，若野芹蜇口，恐亦未免，唯有惶恐耳。

近来因为渐已懂得文章的好坏，对于自己所写的决不敢自以为好，若是里边所说的话，那又是另一问题。我从民国六年以来写白话文，近五六年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不怪小朋友们的厌恶，我自己也戏称曰文抄公，不过说尽是那么说，写也总是写着，觉得这里边不无有些可取的东西。对于这种文章不以为非的，想起来有两个人，其一是一位外国的朋友，其二是亡友烨

斋。烨斋不是他的真名字，乃是我所戏题，可是写信时也曾用过，可以算是受过默许的，他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说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所以人家不理解，于别人不能有好处，虽然我十分承认，且以为当然，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如不写点下来，未免可惜。在这里我知道自己稍缺少谦虚，却也是无法，我不喜欢假话，自己不知道的都已除掉，略有所知的就不能不承认，如再谦让也即是说诳了。至于此外许多事情，我实在不大清楚，所以我总是竭诚谦虚的。

大师简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著名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往事与追忆】

再谈周作人的几件史实

◎高炎（原名郭健夫）

抗战初期，党组织通过有关同志的关系，派我去《庸报》社北平支社采访部任新闻记者，为党从事地下工作。

在1939年至1942年间，党要我主动去看周作人，做周作人的工作，了解他的思想和表现。因此，当时我和周作人经常来往，建立了较好的友谊。

为了使党能及时掌握周作人的思想情况，我经常到八道湾十一号，与周作人聊天，通过聊天，我对他更加熟悉，他对我也比较信任。当时他并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只知我是一名以《庸报》为掩护的进步记者。

他和我很谈得来。在敌伪统治下，不但物价飞涨，连口粮都没有保证。周作人很关心我的生活。他当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后，就对我说："你到教育总署来挂个名，当个挂名秘书，不要上班，怎么样？"

我说："考虑考虑再说。"

周作人表示，在教育总署挂名，对工作对生活都方便。我为了要请示组织，就说过几天再决定。

组织上同意我在教育总署兼个挂名秘书。

我当时用郭健夫本名。周作人用毛笔写了我的名字"郭健夫"。这三个字我制成锌板。保存至今。

后我考虑到在两个单位用同一名字不好，在教育总署便改名为"郭行健"。周作人同意了。于是，我每月由教署发工资六十余元及面粉两袋。按组织决定，部分交了党费。

《庸报》要周作人写些文章。他便写了不少《药堂语录》，用以古喻今、借古讽今的方法，隐晦曲折地来上一两句。后来以《庸报》的名义，为《药堂语录》出了单行本。用磁青纸作封面，上面贴上周作人自己写的书名题签。这本书销路很好，一下就卖光了。

有一次，周作人与我聊天时，提到他与河北伪教育厅长孙今善比较熟悉。我向党组织汇报了此情况。组织上表示，我们可以介绍一人到保定二师去任教，并可设一联络点。我便向周谈，请他给孙今善厅长写封信，介绍师大毕业的许述尧（进步青年）去二师任教。许到保定二师后，任该校教务主任。他在该校对学生宣传进步思想，也建成了我们工作的联络点，对我们的工作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周作人平素与我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对日寇侵华不满。我借机和他谈一些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他一面听，一面表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钦佩。平素我经常听他说：“人民生活不安定，谈不到建设。”（指日寇叫嚷的什么“建设大东亚……”）

组织上曾要我向周作人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周经过思索，对我说：“可以考虑去。蓝公武去了，董鲁安（于力）也去了，我当然也愿意去。”

过了些天，他和我说；“很遗憾！我身上的负担太重了，一时使我无法行动。”

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向我表示了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是生活上的，他上有老母和大嫂，下有弟妹芳子她们的一家子。如果走了，很难安排；另一方面是，书籍文稿，更加难办。他说他保存着鲁迅先生的大批手稿抄本，保存着李大钊烈士的遗稿，保存着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许多书信和文物。他说：“如果我走了，这些东西势必要全部损失，万一损失了，这是无法弥补的。”

当时他拿出两本鲁迅先生的手抄本：一是《柳挥诗》；另一本是《傅肱

蟹谱》。郑重地赠送给我，表示对我一种“知己”之感的谢意。后来，我把周作人的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组织上表示，那就不要勉强了。

周作人送给我的两部鲁迅手抄本，我始终爱如生命。虽经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岁月，我一直妥为保存。自从我党和国家在北京建立了鲁迅博物馆后，由“鲁博”顾问常惠先生经手，将此两部鲁迅先生手抄稿本献给了鲁迅博物馆，永久珍藏！

深度阅读

《周作人自编文集》（1—36册），周作人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知堂书话》，周作人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知堂序跋》，周作人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谈读书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读书，这问题实在是谈不尽，而且这些年来我的见解也有些变迁，现在再就这问题谈一回，趁便把上次谈学问有未尽的话略加补充。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工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湮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里程碑。我们就现阶段的文化学术求前进，必定根据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做出发点。如果抹杀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我们说不定要把出发点移回到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纵然能前进，也还是开倒车落伍。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总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见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

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浮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任何一种学问的书籍现在都可装满一图书馆，其中真正绝对不可不读的基本著作往往不过数十部甚至于数部。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做学问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就成了“消耗战”。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譬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慌意乱，空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静读

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故步自封，以专门为借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的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目前我国一般青年学子动辄喜言专门，以至于许多专门学者对于极基本的学科毫无常识。这种风气也许是在国外大学做博士论文的先生们所酿成的。它影响到我们的大学课程，许多学系所设的科目“专”到不近情理，在外国大学研究院里也不一定有。这好像逼吃奶的小孩去嚼肉骨，岂不是误人子弟？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在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感兴味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我的朋友中有专门读冷僻书籍，对于正经正史从未过问的，他在文学上虽有造就，但不能算是专门学者。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

义的生活，不把读书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对于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干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一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

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地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做进一步高深研究的准备。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找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郎书曾谈到这个方法：

“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他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

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断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预备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记笔记做卡片的训练，宜于早下工夫。

大师简介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偶遇

◎张曼菱

节选自张曼菱著《世纪末的怀念》。

我不敢说："世事沧桑心事定"。对于这个世纪，其实我只参与了一半。

但，总有一些不用赶什么时辰的东西，透过浮生，穿越繁杂世界，络绎而来。于灯下茶前，或幽径低回之处，令人流连品味。有时竟能充满了整个人生。

那些片断和印象，时间不能把它消磨，它反倒能把时间消磨过去。或与相投的友人，一抒胸臆。其中有些事，还是值得告诉后代孺子的。它不应仅属于个人。

在北国，那蒙被岁月灰尘的群楼，学子捧书的湖畔，是这个世纪给我亮起的一盏盏明灯——我心目中的北大导师。不是每个学生和名师都有机会接触交往。他们的高风亮节，大义之言、大器之举，能使奋斗中的学子感到一种心底无私天高地阔的关怀。

清晨，未名湖上，总荡漾着微妙的雾气。我曾拜捧书于石上。晨风中，过来一位老者，他说："你在看什么书？"

我说："朱光潜的《美学》。"

他说："这书不值得看。他的东西，都是从国外的美学理论那儿来的。你直接看几本西方美学史就行了。"

我不由有些愤怒：从哪儿来的一个老头，竟敢如此低贬朱先生？我默默地站起来，合上书就走。

走不了几步，忽听见耳边有人招呼道：

“朱先生您好！”

回头一看，是几个挂红牌的研究生正恭恭敬敬地向刚才那老头行礼。

我冲上去问道：“您，就是朱先生？”

老者含笑颔首：“我告诉你，不要看他的书嘛！当年外国的美学还没有进来，大家看他的很稀奇，现在，那些书都介绍进来了，你可以直接看原著。最好是英语原著。翻译的有偏差。”

我面对朱先生，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中等身材，小四方脸，一双眼睛笑盈盈看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朱先生患有极重的眼疾，近乎失明。可是那天我眼里的他分明炯炯有神。

【深度阅读】

《谈美》，朱光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谈美书简》，朱光潜著，北京出版社，2004年

《诗论》，朱光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谈修养》，朱光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谈文学》，朱光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我与文学及其他》，朱光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美学》，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商务印书出版社，2004年

《无言之美》，朱光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文艺心理学》，朱光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天资与修养》，朱光潜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



【宗白华谈读书】

读书与自动地研究

我们的思想、见解、学识，可以从两个源泉中得来：一、从过去学者的遗籍；二、从社会、人生与自然的直接观察。第一种思想的源泉叫做“读书”，第二种思想的源泉叫做“自动地研究”，或“自动地思想”。这两种思想源泉孰优孰劣，是我今天所想讨论的问题。

读书，是把古人的思想重复思想一遍。这中间有几种好处，就是一、脑力经济：古人由无数直接经验和研究得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如科学中的种种律令，我们可以不费许多脑力，不费许多劳动就得着了。这不是很经济吗？二、时间经济：古人用毕生的时间得着的新发现，像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律令，我们可以在一点钟的时间内就领会了，这不是很经济的吗？所以“读书”确有很大的价值。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但是它也有很多的流弊，我们不可不知道，不可不预防。流弊中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读书读久了，安于读书，习于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渐渐地把自己“自动研究”、“自动思想”的能力消灭了。关于这一层我记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得极透彻。我就把他书中的话，暂时代表我的自动的研究贡献诸君。

叔本华说：读书是拿他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思想。读书读久了，当会使自己的思想，不能成一个有系统的自内的发展。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许多外来的思想，这种外来思想纷呈堆积，东一块，西一块，好像一堆乱石；

不比那由我们自己心中亲切体验发展出来的思想，可以自成一个有生气的、有机体的系统。我们既常常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以读书为唯一的思索的时间，离了书本，就茫然不能思索，得了书本，就犹鱼得水，这种脑筋是没有用了，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条理的藏书楼。所以，我们要直接地向大自然的大书中读那一切真理的符号，不要专在书房中，守着古人的几篇陈言。我们要晓得古人留下来的书籍，好比是他在一片沙岸上行走时留下来的足印。我们虽可以从他这足印中看出他所行走的道路与方向，但却不能知道他在道路所看见的是些什么景物，所发生的是些什么感想；我们果真要了解这书籍中的话，获得这书籍的益，还是要自己按着这书籍所指示的道路，亲自去行走一番，直接地看这路上有些什么景物，能发生些什么感想。（按：叔本华这个譬喻，同庄子的糟粕菁华的譬喻有点相似，且更觉亲切。）

所以叔本华并不是绝对的反对读书，——他自己读书之多，在欧洲学者中要算得很稀少的——不过他极力鼓吹自动的观察，自动的思想，他还有个譬喻说得好，他说书籍中的知识，譬如武士的盾甲，一个强有力的武士，运用沉重的盾甲，可以自卫，可以攻战；一个能力薄弱的人担负了一身沉重的盾甲，反而不能行动了。所以天才能多读书而不为书籍学问所拖累；普通人多读了书，反而减少了常识，对于社会、人生、自然失去了亲切的了解，只牢记了些书本中的死知识，不能运用，不能理解。

以上我引了叔本华书本中的几句死话。他这话对不对，还要我们亲自去看。不过人家要问我：我们不去专读死书，又怎么样呢？我们怎样去自动地研究，怎样去自动地思想呢？我必答道，我们自动地研究也要有方法，有途径。不是盲动的，乱动的，乃是有条理、有步骤的活泼有趣的动作。这种动作是什么？这种动作就是科学方法的活动研究。这种活动就是走到大自然中，自动地观察，自动地归纳。从这种自由动作中得来的思想，才是创造的思想，才是真实的学问，才是亲切的知识。这是一切学术进步的途径，这是一切天才成功的秘诀。这个途径不唯近代大科学家如是，就是古代天才的思

想家也是如此。就看中国周秦时的庄子，我们从他的书中，可以知道他每天并不是坐在家中读死书，他是常常走到自然中观察一切，思想一切，到处可以触动他的灵机，发挥他的妙想。他书中引用自然问现象作譬喻的非常之多。以他那种爱在自然中活动，又富于伟大的理解能力，若生于现在，知道了许多科学实验的方法与器具，不也是一个大科学家吗？但是他所得的结果也已经不小了。以我所知道的中国哲学家看来，创造的思想之丰富，恐怕要推庄子第一。

庄子是中国学术史上最与自然接近的人，最富于自动的观察的人，所以也是个最富于创造地思想的人。我们模仿他的学者人格，再具有精密的科学方法，抱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向着大自然间，做自动的研究，发挥自动的思想，恐怕这神秘万方的自然，也要悄悄地告诉我们几件未曾公开的秘密呢！

【大师简介】

宗白华（1897—1986），江苏常熟虞山镇人。哲学家、美学家、诗人。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美学等课程。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

时髦的创作与古董的做派

◎谢孟

节选自谢孟著《宗白华讲课：一个“通”字》，标题为编者所加。

下课铃响了。从教室窗外忽然刮来的一股劲风，把讲台桌上的讲稿撒落一地。好心的同学要去帮助老师收拾残局，可老师执意不肯。只见他倏地躬下身来几乎跪到讲台上，躲着风把一张张讲稿按序拾了起来，掸了土，码齐了放进一个手工制的蓝布口袋里。他就是宗白华先生。那时他教我们《中国美学史专题讲座》课，每次上课总提着那个宝贝口袋，放在讲台的桌上，慢慢掏出讲稿来。但讲课时几乎不看——偶尔一瞥的仅是用一张纸写的提纲。他在滔滔不绝的讲授中，有时注视着天花板凝思，更多的则是转过敦实的身子，在黑板上既写且画。

今天他讲《易经》中离卦的美学蕴涵，说离者丽也，离卦首先具有附丽的意思。古人以附着在器皿上的花纹为美。既是附着，自然就可以分开和脱离，这正如德语里的“扬弃”一词，兼有“扬”与“弃”的意思。但它本身又包含有华丽之美、雕饰之美。它是附丽与美丽之统一。有趣的是，它却与平凡朴素的窗子发生了关系。先生在黑板上离卦卦符的阴爻中间加画了一个圆圈问道：“你们看它像不像一扇窗子？！”先生接着说，人与外界接触要穿过窗户，又相通又有距离（“隔”）便是窗户的功效，而既有遮拦又相通则是中国建筑的基本特点，“隔而不隔”的审美观念或许源于古代的窗户。先生似乎意犹未尽，在讲离卦还具有“明”的意思时再对窗户情结作了美学阐释。他一笔一画逐个儿描出古代十个形状各异的“明”字，几乎占了半面黑板。然后认真分析道：为什么古人写“明”字多为窗形？因为只有把墙壁掏通才能得到明朗；“明”还与“月”相联，字形中一边是月，一边是窗，

乃因夜晚上从窗户里望月光格外显得明亮。中国人喜欢明亮，喜欢与外部广大世界沟通，所以古代建筑里便以雕空的窗门来体现有隔有通的思想，这与埃及金字塔和希腊神庙等的封闭式团块造型截然不同。先生最后总结道：有隔有通就是实中有虚，因而可以说离卦的美学就是虚实相生的美学，就是内外相通的美学。先生的"窗子说"乃见他人之未见，这建立在严密推理下的合理想象不仅极具启发性，而且充满诗情画意——如此深奥的古代美学精髓，经先生这么一点化，蓦地变得亲近起来。

……

据同学们回忆，宗先生的讲稿都用毛笔把标题写得十分醒目——之所以观察得如此仔细，乃因大家一下课便喜欢围上去观看先生带来的各种图片。先生爱写新体小诗，诗集《流云》曾蜚声于五四诗坛。其作多探索宇宙、人生，并抒写对艺术境界的理性体验，感情浓郁且极富想象力，可大家却说先生总是"把感情踩在脚下"——这一戏语，源于未名湖边经常留下先生散步的身影，许是先生在酝酿感情……此刻的他仍不忘挎着那个自制的蓝布口袋，其中还装着一个随手可取的小水壶——很时髦的创作与很古董的做派竟能如此协调在一起，难怪先生被好逗笑的同学昵称为"行吟诗人"。

深度阅读

《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艺境》，宗白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美从何处寻》，宗白华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中国哲学史提纲》，宗白华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宗白华讲稿》，宗白华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西方美学名著译稿》，宗白华编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西洋哲学史》，宗白华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附录



胡适

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胡适开列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后来根据它修订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著
《九种纪事本末》
《老子》老子著
《墨子闲诂》孙诒让著
《元曲选一百种》臧懋循著
《缀白裘》玩花主人著
《西游记》吴承恩著
《淮南鸿烈集解》刘安著
《中国人名大辞典》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著
《四书韩非子》韩非著
《周礼》
《佛遗教经》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译
《阿弥陀经》
《宋元学案》黄宗羲著
《王临川集》王安石著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著
《章实斋年谱》胡适著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著
《诗集传》
《左传》左丘明著
《乐府诗集》郭茂倩著
《宋诗钞》吴之振 吕留良 吴自牧编
《论衡》王充著
《法华经》鸠摩罗什译
《坛经》惠能著
《明儒学案》黄宗羲著
《朱子年谱》王懋竑著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
《崔东壁遗书》崔述著
《文选》萧统著
《全唐诗》彭定求等著
《宋六十家词》毛晋著
《宋元戏曲考》王国维著
《水浒传》施耐庵著
《儒林外史》吴敬梓著
《红楼梦》曹雪芹著
《荀子集注》王先谦著



梁启超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拟就“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约160种。后来他又为“校课既繁、所治专门”的青年学生精简此书目，开列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四书》
《书经》（即《尚书》）
《礼记》戴圣著
《老子》老子著
《易经》
《诗经》
《庄子》庄子著
《韩非子》韩非著
《史记》司马迁著
《后汉书》范晔著
《荀子》荀子著
《战国策》
《左传》左丘明著
《墨子》墨子著
《汉书》班固著
《三国志》陈寿著
《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
《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楚辞》
《李太白全集》李白著
《韩昌黎集》韩愈著
《白香山集》白居易著
《文选》萧统编
《杜工部集》杜甫著
《柳河东集》柳宗元著



顾颉刚

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

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1925年顾颉刚开列了一个包含有14种书的“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的目录。

《山海经》
《世说新语》刘义庆著
《大唐西域记》玄奘著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著
《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马可·波罗著
《徐霞客游记》徐宏祖著
《西秦旅行记》
《梁武石室画像》
《洛阳伽蓝记》杨炫之著
《唐人说荟》
《元秘史》（即《蒙古秘史》）
《陶庵梦忆》张岱著
《桃花扇》孔尚任著
《南洋旅行记》



朱自清

经典常谈（书目）

本书初版于1940年代，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国重要典籍，以求能启发读者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其中辞赋、诗、文三篇因作品繁多，只叙其源流。

《说文解字》
《周易》
《尚书》
《诗经》
《三礼》
《春秋三传（国语附）》
《四书》
《战国策》
《史记汉书》
《诸子》
《辞赋》
《诗》
《文》



汪辟疆

十部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

汪辟疆在1942年为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开列了一个包含10种图书的“最切要”的“源头书”，并间或予以评注，颇多精要。

《说文解字》许慎著
《毛诗正义》孔颖达著
《礼记正义》孔颖达著
《荀子》荀子著
《庄子》庄子著
《汉书》班固著
《资治通鉴》司马光著
《楚辞》
《文选》萧统编
《杜诗》



鲁迅

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

1930年，鲁迅为许世瑛开列了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列书12种。

《唐诗纪事》计有功著
《唐才子传》辛文房著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著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著
《历代名人年谱》汪镇著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著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阮元著
《世说新语》刘义庆著
《唐摭言》王定保著
《抱朴子外篇》葛洪著
《论衡》王充著
《今世说》王晫著



钱穆

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论语》
《孟子》孟子著
《老子》老子著
《庄子》庄子著
《六祖坛经》惠能著
《近思录》朱熹著 吕祖谦辑
《传习录》王守仁著



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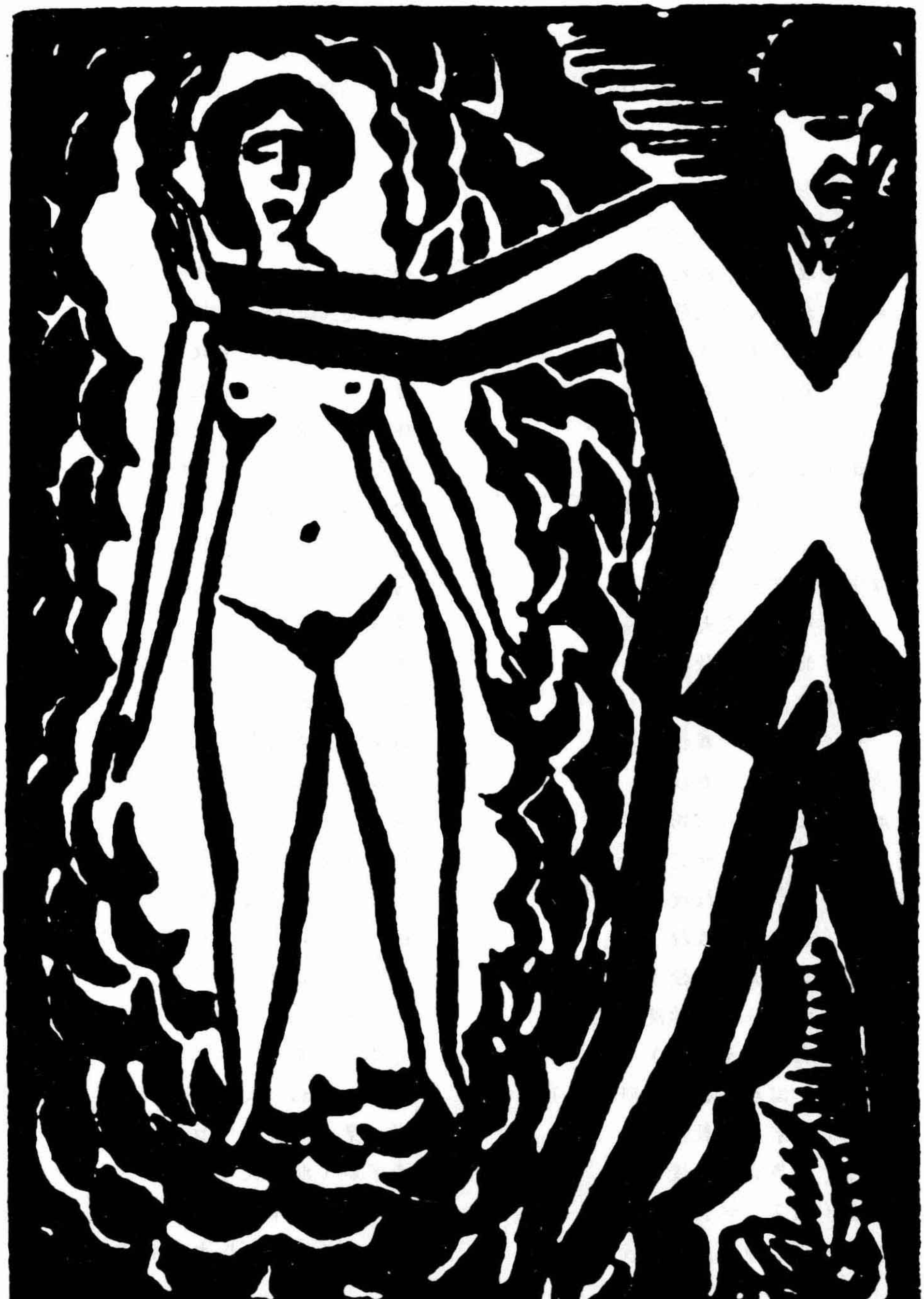
人文部分

张岂之 徐葆耕主编

清华大学教务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编印，1997年9月。本书参考清华大学校内外专家的意见，提出供清华大学本科生试用的80种书目，其中含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类，每类20种。

《论语》
《墨子》墨子著
《孙子兵法》孙子著
《孟子》孟子著
《老子》老子著
《庄子》庄子著
《荀子》荀子著
《易传·系辞》
《史记选》司马迁著；王伯祥选编或来新夏选编
《论衡》王充著
《不真空论》僧肇著
《物不迁论》僧肇著
《神灭论》范缜著
《坛经》惠能著
《张载集》张载著
《四书集注》朱熹著
《传习录》王守仁著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著
《读通鉴论》王夫之著
《严复集》严复著
《仁学》谭嗣同著
《孙中山选集》孙中山著
《诗经选》余冠英选注
《楚辞选》马茂元选注
《魏晋南北朝诗卷》丁夏选注
《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
《唐诗三百首》孙洙著
《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
《宋诗三百首》金性尧选
《唐宋词选释》俞平伯著
《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著
《古文观止》吴楚材 吴调侯编
《三国演义》罗贯中著
《水浒传》施耐庵著
《红楼梦》曹雪芹著
《鲁迅选集》鲁迅著

《女神》郭沫若著
《子夜》茅盾著
《家》巴金著
《骆驼祥子》老舍著
《围城》钱钟书著
《曹禺选集》曹禺著
《青春之歌》杨沫著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著
《艾青诗选》艾青著
《理想国》柏拉图著
《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著
《忏悔录》圣·奥古斯丁著
《思想录》帕斯卡著
《新工具》培根著
《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著
《社会契约论》卢梭著
《伦理学》斯宾诺莎著
《西方哲学史》罗素著
《科学史》丹皮尔著
《哲学史讲演录·导言》黑格尔著
《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
《悲剧的诞生》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精神分析引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李凯尔特著
《人论》卡西尔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
《中国科学思想史》李约瑟著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著
《从混沌到有序》普里戈金著
《伊利亚特》荷马著
《奥德修记》荷马著
《神曲》但丁著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著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著
《浮士德》歌德著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著
《红与黑》司汤达著
《悲惨世界》雨果著
《高老头》巴尔扎克著
《汤姆大伯的小屋》斯托夫人著
《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著
《玩偶之家》易卜生著
《母亲》高尔基著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卡夫卡著
《泰戈尔诗选》泰戈尔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雪国》川端康成著
《老人与海》海明威著
《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北京大学学生应读、选读书目由北京大学校内外50多位著名教授推荐，他们是：

丁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丰子义（北京大学教授）
王太庆（北京大学教授）
王永兴（北京大学教授）
王守常（北京大学教授）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
王思斌（北京大学教授）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邓广铭（北京大学教授）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
石　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叶　朗（北京大学教授）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
朱　伯（北京大学教授）
朱德生（北京大学教授）
任继愈（北京图书馆馆长）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
孙小礼（北京大学教授）
阴法鲁（北京大学教授）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家浩（北京大学教授）
李慎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杨　辛（北京大学教授）
吴良镛（清华大学教授）
何九盈（北京大学教授）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何芳川（北京大学教授）
余敦康（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张世英（北京大学教授）
张岱年（北京大学教授）
陈启伟（北京大学教授）
林　庚（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
金克木（北京大学教授）
周一良（北京大学教授）
周民强（北京大学教授）
周辅成（北京大学教授）
庞　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赵宝煦（北京大学教授）
赵家祥（北京大学教授）
赵敦华（北京大学教授）
侯仁之（北京大学教授）
费振纲（北京大学教授）
袁行霈（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唐有祺（北京大学教授）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黄楠森（北京大学教授）
宿　白（北京大学教授）
谢　冕（北京大学教授）
楼宇烈（北京大学教授）
裘锡圭（北京大学教授）
戴　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学生应读\选读书目

本书目是1998年为北大百年校庆而作。包括推荐应读书目30种，推荐选读书目30种（摘自《名著的选择》）。

应读书目

《周易》
《诗经》
《老子》老子著
《论语》
《孙子兵法》孙子著
《孟子》孟子著
《庄子》庄子著
《史记》司马迁著
《坛经》惠能著
《古文观止》吴楚材 吴调侯编
《唐诗三百首》孙洙编
《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笺注
《红楼梦》曹雪芹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
《鲁迅选集》鲁迅著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 涂又光译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
《理想国》柏拉图著 吴献书译
《神曲》但丁著 王维克译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著 曹未风译
《思想录》帕斯卡尔著 何兆武译
《社会契约论》卢梭著 何兆武译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著 何兆武译
《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科学史》丹皮尔著 李衍译
《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著 张仲实译
《毛泽东选集》
《邓小平文选》

选读书目

《礼记》戴圣著
《荀子》荀子著
《左传》左丘明著
《韩非子》韩非著
《论衡》王充著
《三国志》陈寿著
《世说新语》刘义庆著
《文心雕龙》刘勰著
《李太白集》李白著
《资治通鉴》司马光著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著
《儒林外史》吴敬梓著
《人间词话》王国维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
《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著
《国史大纲》钱穆著
《圣经》
《国富论》亚当·斯密著
《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著
《复活》列夫·托尔斯泰著
《物种起源》达尔文著
《城堡》卡夫卡著
《飞鸟集》泰戈尔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著
《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著
《西方哲学史》罗素著
《历史研究》汤因比著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著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著
《哲学笔记》列宁著

声明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大多数作者及著作权益人的支持，在此深表感谢！由于各种原因，仍有部分文章的作者或著作权益人未能联系上，在此恳请相关权益人与本书编者联系，以便支付稿酬及寄送样书。

联系办法
E-mail：zhaofeng1998@yahoo.com
电　话：13366360381（北京）

——编者




FINI

阅读的危险

大师的读书经验

慢慢看，细细品。诸多大师的读书心得，隔了大半个世纪，还是非常有启发和感悟，好像在当面聆听大师的教诲，远离了世俗的幻想和虚伪。

——网友 Juzhen

从这本书里受益良多，有相逢恨晚的感觉！

——网友 Chacha85

这本书我看了很多次，讲得很详细，非常适合那些不知道如何阅读的人。

——网友 胡杨少

书中有许多地方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读书方法都不同。我想编者之所以要编这本书，目的是要我们从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或者是完善自己目前的方法。相信这本书能为我们以后的阅读带来方便！

——网友 Bing Hong

出 品 人：傅伟中 **策 划**：涂 华 **封面插图**：汉斯·希尔曼
组稿编辑：万 哲 **责任编辑**：万 哲 **特约编辑**：黍 离 **装帧设计**：了如指掌创意馆

投稿信箱：an@liaoruzhizhang.com
读者信箱：book@liaoruzhizhang.com
书目下载：www.liaoruzhizhang.com
咨询电话：010－58480099 / 56020689

上架建议：文化·阅
ISBN 978-7-5392-646
9 787539 264639 >

指掌 教育馆

定价：39.80元